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为政府企事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主编：武茜　徐梦瑶　樊静文　　设计：李封乾　　校对：冯帅章　卢晶亮　张晓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19 年第 1 季度（总第十期）

暨南大學 JINAN UNIVERSITY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19 年 4-6 月

- 我院举办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教授来访我院
- 我院与芝加哥大学四度携手 举办 HCEO 暑期学校
- 我院成立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
- 我院成立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
- 我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
- 冯帅章教授受邀成为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共同主编 (editor)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IESR）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同时，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团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业声誉，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为政府企事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我院成立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02
我院成立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04
携手国际顶尖智库 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政策论坛重磅来袭……05
我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08

02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12
科研动态……12

03 学术活动
大师暨南行……14
学术会议……20
名师讲堂……30
SEMINAR……35

04 思想聚焦
暨济一堂……44
观点评论……50
媒体聚焦……89

05 数据调查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97
广东千村调查……101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106

06 人物专访
名师零距离……111
IESR 人物……108

07 学生天地
招生要闻……125
夏令营 & HCEO 暑期课堂……130
学子风采……134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136
EDP 项目……137

08 对外交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一行访问我院……140

09 图说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志愿者风采……141

学院 要闻

我院成立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

我院成立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

携手国际顶尖智库 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政策论坛重磅来袭

冯帅章教授受邀成为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共同主编（edi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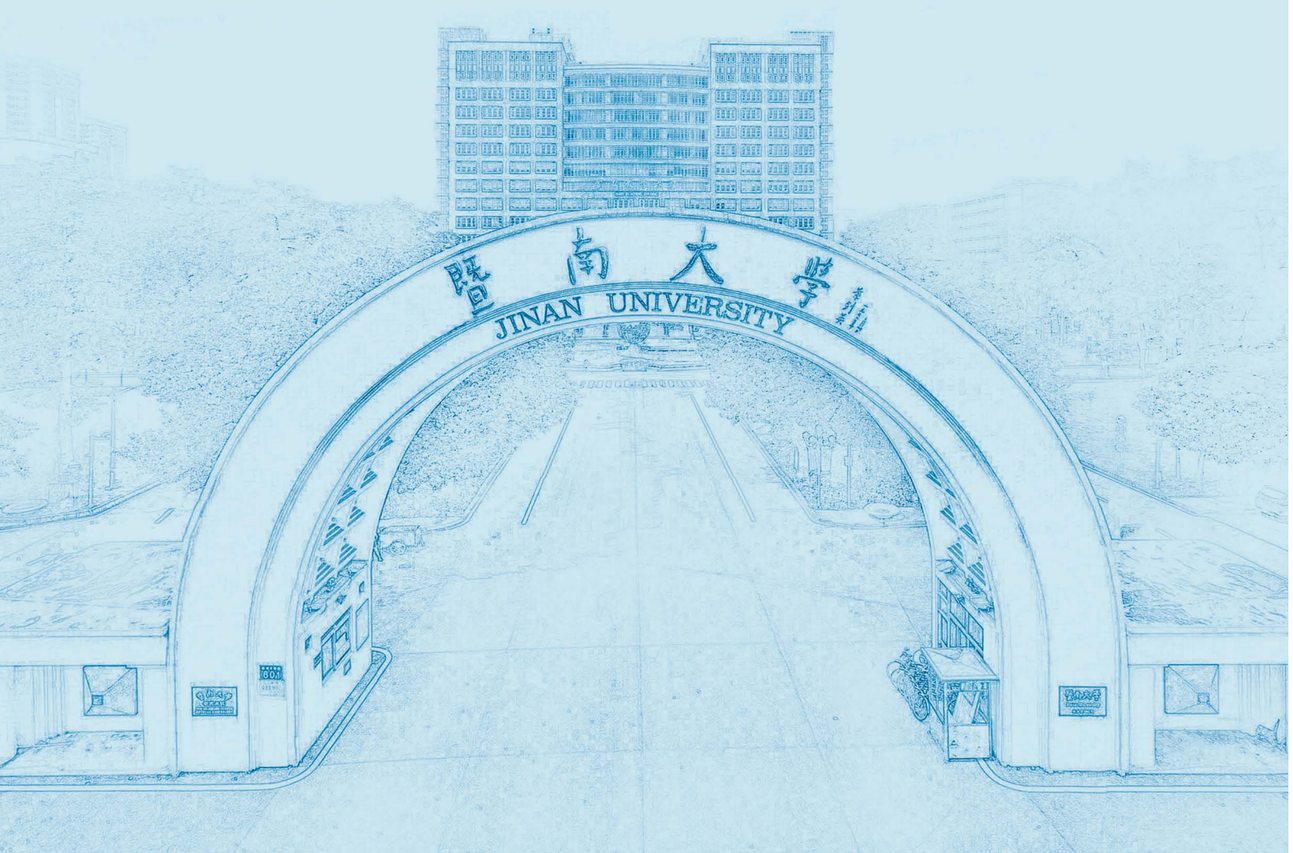
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绩效评价工作组前来我院进行现场调研

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四届决策咨询专家

我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

冯帅章院长受邀出席2019年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合同工管理先进单位表彰



我院成立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

成立仪式合影

2019 年 4 月 11 日上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成立，中心敦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为中心特聘主任。这是继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成立的第四个以海外知名教授担纲的研究中心。出席仪式的嘉宾有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及 IESR 全体教师。

冯帅章院长

成立及敦聘仪式由冯帅章院长主持，他表示环境经济学是一个在中国国内发展迅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学科。IESR 自成立之初，就着手布局环境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学科建设，招聘了多位以环境经济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教师。他相信在学校强有力的支持下，在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成立之后，环境经济学这一重大研究方向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宋献中校长

接下来，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教授为成立仪式致辞。宋献中首先对赵金华教授的加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暨南大学商科具有百年的悠久历史，发展至今，它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尤其是 IESR 成立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冯帅章院长的

带领下，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引进了大量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大大增强了学术力量。

宋献中提到，环境问题是当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建设文明、富强、繁荣、和谐、美好的中国这一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暨南大学近几年也持续发力，对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给予巨大支持，在理工科领域组建了多支十分强大的团队，如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研究院及暨南大学质谱仪器与大气环境研究所，涉及到水、土、气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及实际应用，尤其是对 PM2.5 的检测等，在软硬件的设施上都具备较高水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下设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成立广州区域低碳经济研究基地。此外，学校还参与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实验室，这一实验室不仅仅只关注环境研究的技术问题，还将纳入环境评估、环境管理等一系列与环境领域密切相关的内容。

宋献中表示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特别是有赵金华教授的加盟，能够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推动环境经济学及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最后，宋献中对中心未来的前景充满期待，中心不仅仅要在学术方面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要将研究成果融入社会实践，解决中国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将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相信在赵金华教授地带领下，在 IESR 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

随后，宋献中校长为赵金华教授颁发聘书。

宋献中校长（右）与赵金华教授（左）

敦聘仪式过后，赵金华教授发表致辞。他表示正如宋献中校长所言，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并且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想解决世界的环境问题，肯定首先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中心所进行的研究，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社会实践价值，应该具有国际性的特殊意义。环境经济学领域最顶级的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收到的投稿有近 30% 与中国问题相关，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环境问题在学术界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理环境问题，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比如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成本有效性及社会效益等等。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学校强有力的支持下，具有很多的发展机遇，中心未来将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丰富资源，积极开展环境经济学及跨学科的交流合作。赵金华教授表示非常期待接下来与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扩大研究队伍，产出国际前沿的学术成果，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环境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未来，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将在赵金华教授的带领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学术交流等方面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并重点推进与校内相关领域团队的实质性合作，以期在环境与经济交叉学科方向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暨南大学“双一流”高校建设以及广东省高水平建设添砖加瓦，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应有的一份力量。

我院成立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

IESR院长冯帅章(右)为邓永恒教授（左）颁发聘书

2019 年 6 月 18 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Regional Economics, 以下简称“房地产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聘请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商学院教授邓永恒担任海外特聘主任，这是 IESR 继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之后成立的第五大研究中心。

成立仪式由 IESR 副院长张思思主持。IESR 院长冯帅章在致辞中表示，研究院计划将区域经济学领域作为未来重点发展领域，目前，学院在该领域已招募多位全职科研骨干，皆毕业于海外知名高校，接受过扎实、规范的学术训练，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并且在区域经济学顶尖期刊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等发表过多篇文章。未来，邓永恒教授将作为房地产中心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学术交流等重要工作，并同业界联手，探索社会和业界关心的房地产、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的研究，如住房政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房地产金融、城市更新与改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邓永恒教授发表了受聘仪式致辞，他表示非常荣幸接受 IESR 的邀请担任房地产中心海外特聘主任。他认为，区域经济的变化、住房的可支付性、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大数据的发展、智能城市的崛起、环境的可持续性变革都会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多个领域。房地产中心旨在充分发挥暨南大学国际化办学特色，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培育和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房地产研究人才和成果，将房地产研究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紧密结合，联系政府、企业，积极发挥智库作用助力房地产转型发展，打造中国和东南亚领先的房地产研究智库，为业界和政府提供探索行业发展和攻克社会难题的务实的研究中心。未来，中心将定期组织高水准的国内外学术活动、政策活动，积极与学术界、政府、企业等跨界交流、深度合作，同时引进大批国外资深学者担任中心海外特聘教授，助力中心人才培养，加强与国家及广东省相关部门如住建部等部门的联系，助力智库成果转化，开展系列有关区域经济、房地产、家庭金融领域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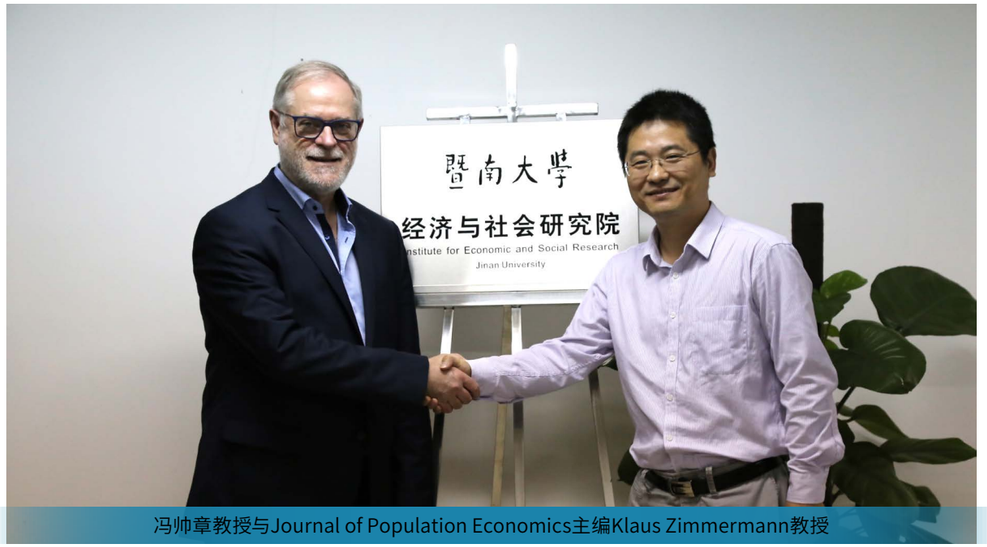
携手国际顶尖智库
布鲁金斯 - 暨南 中国微观经济学政策论坛重磅来袭

近日，我院宣布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开展合作，双方计划将于 2019 年起召开每年度“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政策论坛，旨在开展应用微观经济学各领域的智库交流与合作，并召集相关领域优秀学者开展深度讨论，以期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制定提供基础与参考。首届论坛将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 -12 日在暨南大学举办。

BROOKINGS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 1927 年，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凭借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

冯帅章教授受邀成为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共同主编（editor）



冯帅章教授与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主编Klaus Zimmermann教授

近日，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成为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共同主编(edito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人口经济学期刊》）创办于 1988 年，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期刊，主要发表人口经济学各领域内理论与应用类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文章，关注个人、家庭、家庭行为、人口政策、储蓄与退休金、社会保障、住房与卫生保健等方面问题。该期刊由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发展与劳动经济学中心（Centre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conomics，POP at UNU-MERIT），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GLO）和欧洲人口经济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Population Economics，ESPE）联合主办。该期刊设立 Kuznets Prize 最佳论文奖，每三年颁发一次，奖给一篇最近三年期间在此期刊上发表的最优论文。今年年初，Kuznets Prize 最佳论文奖在我院 2019 年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ASSA Annual Meeting 2019）招待会上颁发。

Klaus Zimmermann教授为最佳论文奖颁奖

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绩效评价工作组前来我院进行现场调研

评估组副组长李铁（右一）参观我院教师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5 日下午，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绩效评价工作组副组长李铁，组员高璇、张焕蕾前来我院进行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现场调研，陪同人员包括暨南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杜金岷、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丁友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处长王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副处长魏霞、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薪酬结算科科长黄敏、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人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熊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副教授谷一桢、卢晶亮、史炜、唐立鑫，助理教授薄诗雨、朱宏佳。

绩效评价工作组参观了我院“111”基地办公室与青年教师办公室，并与我院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首先由冯帅章院长对我院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情况做简要介绍，之后李铁副组长就“双一流”建设“引导专项”资金使用、“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等问题与我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我院教师进行了深入探讨。

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四届决策咨询专家

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于近日公布了《关于聘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四届决策咨询专家的通知》（穗府研字〔2019〕2号）。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宏观经济和战略发展决策咨询组决策咨询专家。

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成立于 2005 年，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高层次决策咨询专家队伍，为市领导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专家库分为五组，由各高校、科研单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师职称、关心广州发展、愿意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活动的专家组成。

聘　书

聘字第031号

兹聘请 冯帅章 为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四届决策咨询专家。聘任期 2019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

广州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2 月 4 日

我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

4 月 27 日，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新时代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座谈会。座谈会于湖南大学召开，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如何深化新时代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副主任付长良、湖南省民政厅厅长唐白玉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宣布《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确定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的通知》，确定暨南大学等 23 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为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为暨南大学基地负责人将重点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政策理论研究工作。未来，基地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为重点，充分发挥在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

The Policy and Theory Research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二〇一九年一月

冯帅章院长受邀出席 2019 年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4 月 25 日，我院院长冯帅章受邀出席 2019 年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并做主题演讲，参会嘉宾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孙群、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阮芳等。该论坛由《哈佛商业评论》联合智联招聘共同举办。

会上，嘉宾们就中国人力资本管理趋势、人力资本发展新格局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冯帅章院长以“新时代的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挑战与机遇”为题，从历史、挑战、机遇三个角度为大家进行分析。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合同工管理先进单位表彰

冯帅章院长接受先进单位表彰（第一排右三）

2019 年 4 月 30 日，暨南大学召开 2016-2018 年度合同工管理先进单位、优秀合同工管理员和优秀合同工表彰大会，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校工会常务副主席侯宏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处长王兵及受到表彰的各单位与个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我院荣获合同工管理先进单位表彰，我院社会调查中心数据与质控部主管肖和荣获优秀合同工表彰。

肖和接受先进个人表彰（第一排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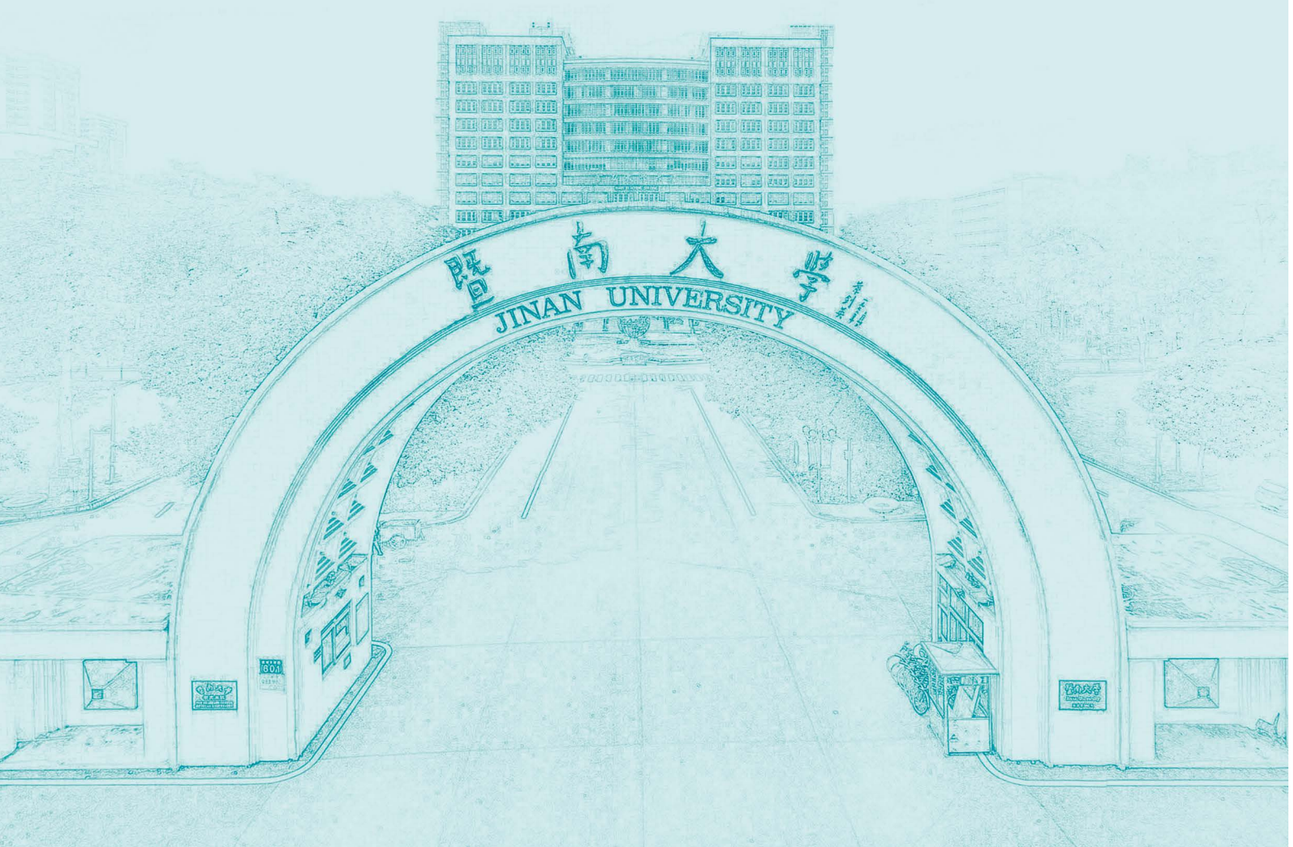
此外，冯帅章院长在会上作为合同工管理先进单位代表发言。他首先感谢学校和各级机关部处，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一直以来对我院工作的支持，接下来他从人员招聘、日常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分享了合同工管理的经验和体会。

冯帅章院长发言

科研 动态

论文发表

科研项目



论文发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 Jinseong Park 合作论文“Do In-Kind Grants Stick?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33 Program and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合作者：Donald J., Bruce, Celeste K. Carruthers, Matthew C. Harris, Matthew N. Murray）发表于城市经济学领域顶尖期刊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近日，我院冯帅章教授的合作论文“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s Urban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Evidence from Shanghai”（合作者：Yuanyuan, Chen）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邱筠的合作论文“The Impact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on Health Outcomes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合作者：Feng-an Yang, Wangyang Lai）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科研项目

近日，教育部、广州市社科规划办先后公布 2019 年度科研项目评审立项，我院共获得 3 项省部级人文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 1 项，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 2 项。立项情况如下: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

项目名称：有偏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机制与识别

助理教授李书娟（政策研究轨）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

项目名称：政府层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证：以广州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领导与协调作用为例

助理教授薄诗雨

项目名称：城乡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的决定因素与其影响——以消费与精神健康为例

助理教授薛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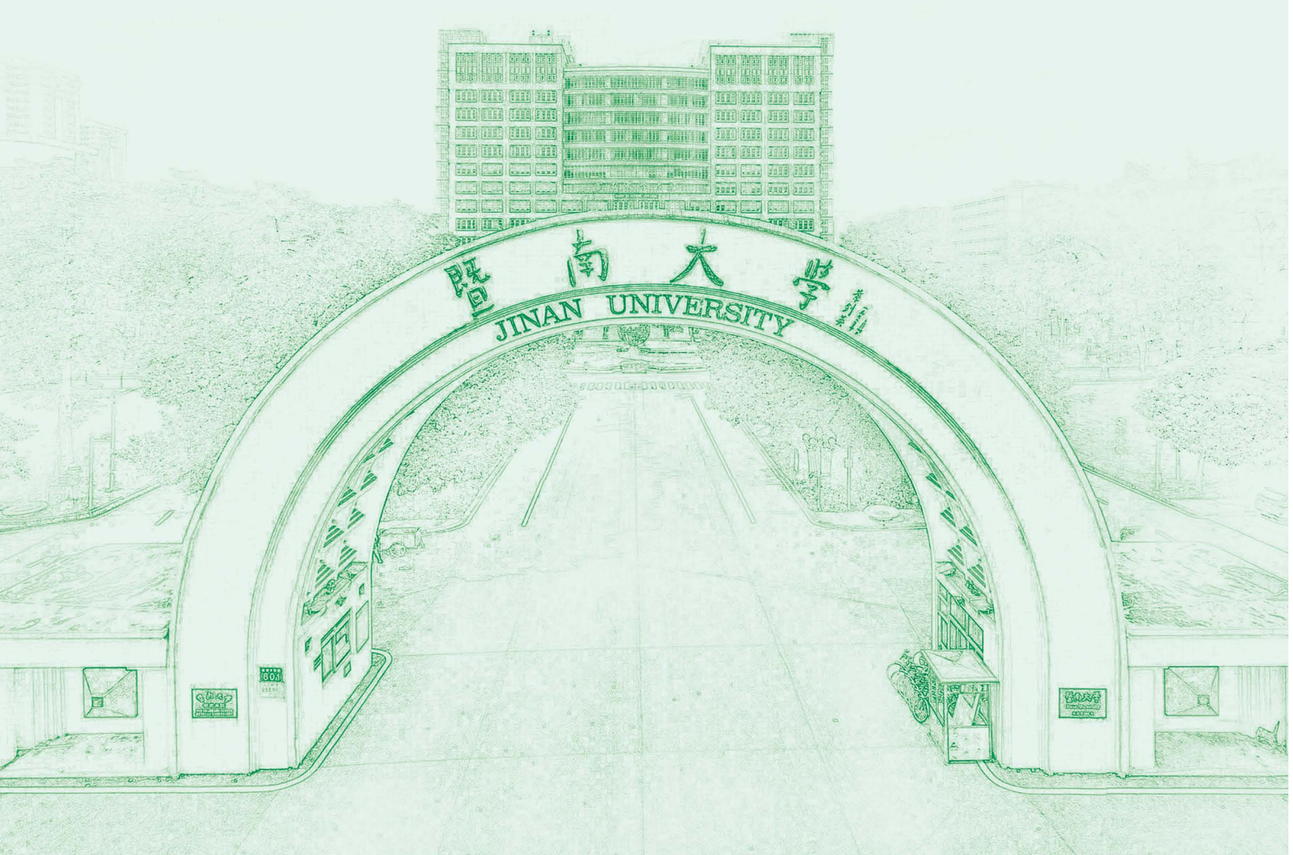
学术 活动

【大师暨南行】

【学术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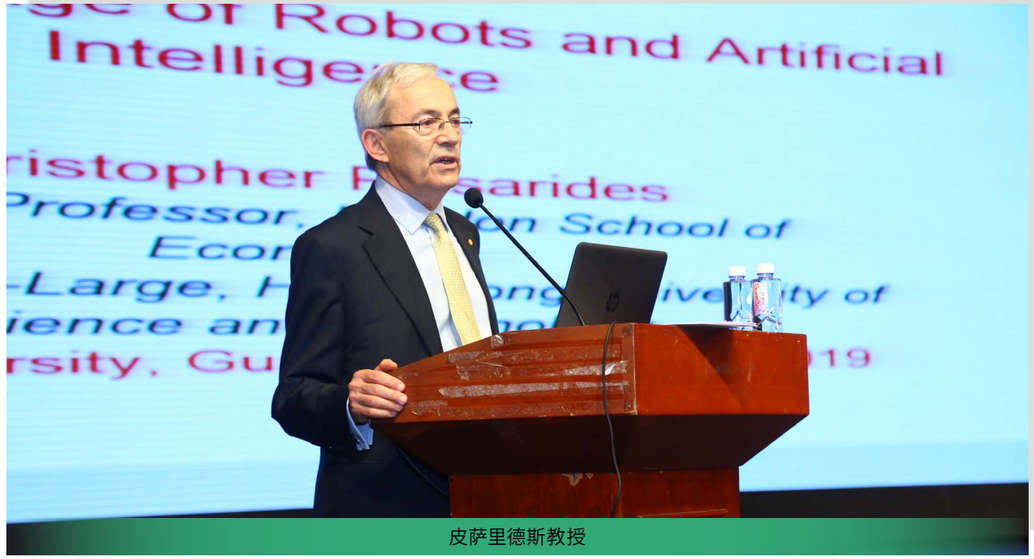
【名师讲堂】

【SEMINAR】



大师暨南行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教授谈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皮萨里德斯教授

2019 年 5 月 21 日，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塞浦路斯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来访暨南大学，并出席“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作题为“Work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题演讲。

本次活动由国家外国专家局、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承办，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

活动开始，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致辞，他首先代表暨南大学向皮萨里德斯教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及暨南大学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学校积极发挥经济学学科的优势，大力推动与国际学界交流，多次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交流，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其中，IESR“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同时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此次非常荣幸邀请到皮萨里德斯教授来访暨南大学，他的到来令暨南园熠熠生辉。他相信，通过本次交流活动，广大师生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也会推动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和政策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

现场观众认真聆听

皮萨里德斯教授首先感谢暨南大学对他的邀请，并作了题为“Work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题演讲。他的演讲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一是对于新技术的介绍即机器人人工智能（AI）技术，二是新技术如何渗透到各个行业，以及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介绍，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大量运用在了生产领域，这些技术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在中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研究发现，亚马逊或中国的阿里巴巴，机器人在劳动力当中的比重已经占到40%-50%。在生产领域当中，汽车行业机器人使用率最高，以日本为例，每 1 万名员工当中有约 1400 个机器人。中国制造 2025 规划想要实现，需要进一步扩大研发比率，加强产学研合作。

活动现场

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影响就是结构性转变，包括了新工作的创造和旧工作的淘汰，我们面临的挑战即是怎样实现从旧到新的转型。他预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未来人们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将会减少，同时诸如家庭生产服务、奢侈品服务、医疗健康、培训等行业将会扩大规模。他表示，人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富裕、快乐，但政府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帮助创造更多的工作。

在皮萨里德斯教授精彩的演讲过后，在场学生踊跃地提问，教授一一详细解答。

讲座结束后，皮萨里德斯教授分别与冯帅章院长以及 IESR 全体教师进行了交流。教授首先询问了学院教师的研究方向。在了解到学院教师的研究覆盖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微观理论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后，他对 IESR 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表示了赞赏。此后，学院教师结合皮萨里德斯教授在讲座中谈到的内容，与他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学院教师和皮萨里德斯教授有问有答。会上讨论的话题包括中国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和性别平等的影响，世界贸易秩序变化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影响等等。

皮萨里德斯教授与IESR教师交流

皮萨里德斯教授与IESR教师合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Joshua Angrist 谈本科计量经济学教育

Joshua Angrist教授主题演讲

2019 年 6 月 6 日，美国麻省理工 Joshua Angrist 教授受邀出席我院举办的“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作题为“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 Instruction: Through Our Classes, Darkly”的主题讲座。

讲座现场

Joshua Angrist 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曾担任多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劳动经济学杂志》的联合主编，并且是《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者指南》《功夫计量》的作者。

讲座开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辞，他首先向Angrist教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中国学生在学习应用计量经济学以及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几乎无不学习《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以及《功夫计量》两本书。他相信，通过本次讲座分享，广大师生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也会推动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和政策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冯帅章院长致辞

Angrist 教授首先感谢 IESR 的邀请，以及对 IESR 近几年所做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接下他来做了主题为“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 Instruction: Through Our Classes, Darkly”的演讲。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济学研究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第二部分探讨了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现状。

经济学研究发展趋势

Angrist 教授认为在这几十年来，经济学变得更实证了，也变得更“重要”了。他和他的团队通过机器学习分领域将现有经济学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类（理论 / 实证 / 计量方法），发现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研究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更加趋于实证，尤其是在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实证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在研究每篇文章通过影响因子加权后的引用率发现，实证经济学研究的引用率也在逐渐提高，说明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学科中的整体重要性在提升。他进一步收集了每个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引用数据，发现其他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对经济学研究的引用率相比过往都有显著的上升，这说明经济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提高。

本科计量经济学教育

接下来 Angrist 教授话锋一转，开始讨论在经济学研究如此的发展大势之下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出现的脱节和停滞。他认为当前的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相比几十年前并没有出现大的变革，仍然将教学重心过多放在数学推导和定理证明中，不重视和实证问题的结合和对因果推断的强调。因此，本科生学习的大部分计量知识对于培养他们分析现实问题的逻辑能力裨益不大。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列举了目前市面上常用的一些本科计量经济学教材并总结各部分内容的比例，其中大部分都花了很大篇幅用于介绍“修正假设”、“异方差性”、“联立方程组”、“函数形式”等次要问题上，而对“因果推断”这样的最主要实证环节提及的篇幅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涉及。除此之外，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教材中对实证案例的讨论篇幅较少，有的案例也和现实研究脱节较严重。有趣的是，他还提到一本计量经济学教材，其中使用的所有“实证”数据都是由作者虚构出来的。

最后他为自己打了个小广告，谈到了他和 Steve Pischke 教授合著的两本计量经济学教材《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和《功夫计量》中引用了诸多经典的实证研究，基于实证案例来教授计量方法的运用，强调因果推断，更符合现在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主流思路。

在 Angrist 教授精彩的讲座之后，在场的师生踊跃地提问，教授一一详细解答。此次讲座深入浅出，案例丰富，赢得师生们一片好评，更为教师们如何进行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问答环节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谈如何衡量贫困

Robert Moffitt教授

6 月上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来访我院。Moffitt 教授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 Krieger-Eisenhower 教授，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与微观计量经济学。他担任北美劳动经济学会主席，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国家科学院国家协会院士，曾任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编，北美人口经济学会主席。在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近 200 篇文章。

来访期间，Moffitt 教授为暨大师生作了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的讲座，围绕贫困的定义、不同国家的贫困率、反贫困计划是否引起了贫困陷阱三个话题展开论述。Moffitt 教授认为，“基本需求”在各国的定义有可能存在差异，这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实施反贫困计划时应注意对象，避免“贫困陷阱”，即反贫困计划应针对贫困人群而不是家庭。Moffitt 教授的观点引起了在场师生们的强烈关注，大家在讲座结束后仍在不断讨论此话题。

此外，Moffitt 教授还参与了 IESR 组织的 Labor Workshop，中国人民大学赵忠教授及 IESR 多位青年教师也参与了此次会议。会上，Moffitt 教授以“Estimating 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s: An Application to U.S. Welfare Programs and Labor Supply”为题，探讨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和劳动力供应问题。其他参会者也围绕雇佣结构、家庭收入等多方话题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在场学者们不断进行思想碰撞，促进了相关方面的学术交流。

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赵忠教授分享了题为“Employment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5: Demograph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的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赵忠教授

IESR 副教授张思思分享了题为“Rising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的论文。

IESR副教授张思思

IESR 副教授蔡澍报告了题为 “Microfinance Can Raise Inco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China”的论文。

IESR副教授蔡澍

IESR 助理教授 Yunho Cho 分享了题为“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and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Income Shocks”的论文。

IESR助理教授Yunho Cho

IESR 助理教授 Jinseong Park 分享了题为“Expenditure Cascades: Evidence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ax Reforms”的论文。

IESR助理教授Jinseong Park

最后，Moffitt 教授还与我院冯帅章院长就低收入人口及贫困问题，人口问题、低生育问题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在了解我院的发展情况后，Moffitt 教授高度赞赏了 IESR 的国际交流模式，并建议我院教师多多增加与国际学者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Moffitt教授与冯帅章院长

学术会议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会议现场

6 月 18 日 -20 日，2019 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2019 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大会由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

作为本年度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大会邀请了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张俊森，美国范德堡大学 Gertrude Conaway Vanderbilt 教授李彤，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陈晓红，货币金融研究中心（CEMFI）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主席 Enrique Sentana，麻省理工经济学 Ford 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Whitney Newey，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欧洲劳工经济学家协会（EALE）现任主席 Christian Dustmann，纽约大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前主编 Jess Benhabib，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苗建军，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Ariel Pakes，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Samuel Kortum 等 11 位重量级嘉宾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开幕仪式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开幕仪式。

冯帅章院长

会议首先由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教授发表致辞，他表示“暨南大学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这次会议，也十分欢迎海内外嘉宾们的到来。此次会议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充分交流的平台。相信通过本次交流活动，广大参会者定能有所收获，也会推动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和政策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接下来，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主席 Enrique Sentana 代表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发表致辞。他认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作为全球性科研组织，有责任推动科研和社会相关领域的发展。本次在亚洲的系列会议也突显了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主席Enrique Sentana

主题演讲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 James Heckman 发表了题为“A Dynamic Model of Health, Addiction, Education, and Wealth”的主题演讲。

James Heckman教授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张俊森进行了题为“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Gender Composition on Filial Piety and Old-age Support”的主题演讲。

张俊森教授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李彤进行了题为“Efficacy of A Bidder Training Program in Procurement Auctions with Selection and Entry”的主题演讲。

李彤教授

耶鲁大学 Malcolm K. Brachman 经济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陈晓红发表题为“Identification-Robust Quasi Likelihood-Ratio Inferences on Functionals of Increasing Dimensional Structural Models”的主题演讲。

陈晓红教授

麻省理工经济学 Ford 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Whitney Newey 发表题为“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of Treatment and Structural Regression Effects”的主题演讲。

Whitney Newey教授

货币金融研究中心（CEMFI）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行政副主席 Enrique Sentana 发表题为“Hypothesis tests with a repeatedly singular information matrix”的主题演讲。

Enrique Sentana教授

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移民研究和分析中心创始主任 Christian Dustmann 发表题为“The Impact on Regions and Workers”的主题演讲。

Christian Dustmann教授

纽约大学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Jess Benhabib 发表题为“Optimal Positive Capital Taxes at Interior Steady States”的主题演讲。

Jess Benhabib教授

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教授苗建军表题为“Multivariate LQG Control under Rational Inattention in Continuous Time”的主题演讲。

苗建军教授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Ariel Pakes 发表题为“Experience Based Equilibria & Information Sharring in Auctions”的主题演讲。

Ariel Pakes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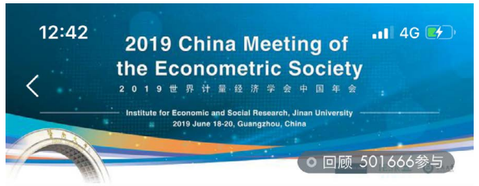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Samuel Kortum 发表题为“In Search of Trade Frictions”的主题演讲。

Samuel Kortum教授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余位参会人员，还有 50 万人次观众通过网络直播观看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开幕式，一睹诺奖大师风采。

James Heckman 教授在直播演讲中提到，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好的健康习惯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能够提高人们收入，改善健康状况，延长终身福祉。对于教育和健康的投资能相互影响，且两者具有互补性，能够解释健康、教育和财富三者之间良好的正面积极关系。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一般发生在青少年和青年阶段，主要受到父母性格特征、经济来源和天生的能力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文献绝大部分将这些因素分开研究，忽略了各类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James Heckman 教授认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改变了人们的决策视野，从而产生了教育、健康、成瘾和财富间的相互作用。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们有更长远的打算，因而有更大动力去投资健康，减少不良习惯和成瘾，积累更多的健康财富，因为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这些投资中获得回报。另外，人口健康改善促进了教育回报率提升，因为教育成本多发生于人生较早阶段，而回报一般发生在较晚阶段中；同时，更健康的身体状况也能引发更好的习惯。



网络直播页面

除 11 场重量级嘉宾的主题演讲外，本次会议就微观经济数据与研究、劳动经济学、中国企业研究、住房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拍卖与采购的实证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研究、金融学等议题分 65 个平行会场进行研讨，会场气氛热烈，嘉宾交流充分。会议分享的近 300 篇研究报告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涉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方面面，如劳动力市场、住房政策、人力资本等，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常务副主席、货币金融研究中心（CEMFI）教授 Enrique Sentana 对本次会议高度评价，“会议组织得非常顺利，参会者得到非常专业的安排，而且会议的受邀报告质量非常高，平行会议等参加的人数也很多。我与许多参会者交谈过，他们都非常享受这次的会议。”

会议的成功举办在承办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的学科发展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成立不到 4 年的年轻学院，能够承办如此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实属有幸。未来，IESR 还将继续打造国际化交流平台，全面开展多样化的学术活动，积极寻求与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合作，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以此提升 IESR 在国际学术界的对话能力和学术地位，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最强音。

第三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19 年 5 月 28 日 -29 日，由我院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徐熠，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助理教授白洁共同领衔组织的第三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来自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共同探讨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问题，交流讨论不同国家的企业微观数据及现状。

自 2017 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已成为 IESR 富有特色的年度学术会议之一，会议力求加强学者在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发展经济学领域间的互动，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下面来回顾本次会议精彩瞬间吧！

Hugo Hopenhayn（UCLA）分享了题为“From Population Growth to Firm Demographics: Implications for Concent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Labor Share”的报告。

Lauren Bergquist（University of Michigan）分享了题为“Scaling Up Agricultural Policy Intervent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ganda?”的报告。

Yuhei Miyauchi（Boston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Matching Frictions in Firm-to-Firm Trade: A Field Experiment”的报告。

Mike Dickstein（New York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What do Exporters Know”的报告。

Kevin Lim（University of Toronto） 分享了题为“Accounting for Chinese Exports”的报告。

Bee-Yan Roberts（Penn State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The Importance of Consumer Taste in Trade”的报告。

Kevin Donovan（Yale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Brining Data to the Model: Quantitative Implications of an Equilibrium Diffusion Model”的报告。

Daniel Bjorkegren（Brown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Competition in Network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in Rwanda”的报告。

Mitsuru Igami（Yale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Privat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的报告。

会场交流

此外，在 Data Benchmarking 环节，Kevin Lim, Daniel Bjorkegren, Yuhei Miyauch 还分别为大家分享了中国及卢旺达的数据情况。

至此，第三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分享环节圆满结束。在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数据讨论外，与会学者还关注研讨会举办地——广州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现状。

研讨会之前，与会嘉宾实地调研了 2019 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广州茶博会”）、广州流花服装批发市场、红棉国际时装城等城市一角，聆听城市声音，细看城市真貌。

恰逢广州茶博会展期，25 日上午，与会嘉宾一行人漫步茶展，于茶香袅袅中感受羊城风貌。学者们不时低身观察茶饼，或询问摊位主人茶的培育和销售、口感特点和冲泡等事宜，遇到二三热情的摊主还会受邀入席品一盏茶，聊一聊茶背后的故事与来历。慢斟细酌中，对茶商和羊城更添了几分了解。

茶博会一角

25 日下午，嘉宾团调研了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几个服装批发市场。作为市场的商厦每层都被分割成无数“凹”字形小房间，各种衣衫有序排列，偶有摊位兼顾外国客人，还会特地用白纸写一个“have stock”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学者们就着摊位的产品与自己的淘宝经历比对，平添了几分调研趣味。在看到一些跟外贸关联较大的摊位时，嘉宾们还会跟摊主聊上几句，询问一下货源、市场、与淘宝的联系等问题。

琳琅满目的服装摊位

29 日下午，嘉宾团受邀参观了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下称“广汽丰田”）的生产基地。公司由广汽和丰田按照 1：1 的股比投资成立，自 2004 年至今，已走过 15 个年头，收获颇多美誉。企业讲解员带领嘉宾团依次参观了生产线的微型沙盘、组装车间和检测车间等，在参观的过程中就员工培养、流程优化和检修情况进行了详致的讲解。

于广汽大堂合影

观看企业文化宣传片

参观生产线沙盘

观后讨论场景

本次会议加强了中外相关学者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嘉宾们对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与会人员合影

2019 年 4 月 18-19 日，我院于四川省绵竹市举办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绵竹市教育局共同主办，邀请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会，共商流动人口子女发展大计。

4 月 18 日的会议包含了四大主题发言和政策论坛。上午的研讨会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会议之初，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文珍以及绵竹市副市长管理致辞，他们期待此次会议能够推动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子女及困境儿童的关注和帮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文珍

绵竹市副市长管理

四大主题发言

「王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会影响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王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谦发表题为“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主题演讲。王谦表示，总体来看，中国 70%-80% 的人口流动都属于从农村迁入城市。据调查，有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进城的目的是让子女在城市上学，如果他们的教育遇到困境，会引发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彭波：困境学生的绵竹解决方案」

绵竹市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彭波

绵竹市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彭波分享了困境学生的绵竹解决方案，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积极建设健全和落实相关部门责任和联动机制。据彭波介绍，目前，绵竹市共资助约 4 万名困境学生，资助金额约 6700 万元。

「史耀疆：从行动研究到政策倡导」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发表了“从行动研究到政策倡导”的主题演讲。从 2008 年起，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展了“营养、健康与教育”的随机干预实验。结果显示，在短期内，被提供营养包的样本儿童显著提升了认知能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纯的营养作用越来越小，需要在养育上进行干预。他表示目前，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仍旧存在五个缺口：认识、政策、人才、证据、方法。

「宋映泉：留守状态影响非认知能力的形成」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发表了题为“农村留守儿童的非认知技能与学业表现——以两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小学生为例”的主题演讲。他介绍，在 1987 年 -2016 年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寄宿制学校以及在校生逐渐增加，这些学生面临学业发展、心

理健康、校园霸凌以及身体发育的挑战……最终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技能状况令人担忧，留守状态影响他们非认知能力的形成，从而影响学业发展。

政策论坛

在下午的政策论坛中，诸位专家就流动人口相关研究领域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讨论。

政策论坛现场

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梳理了政策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变化，透视了政府和社会对流动人口及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愈发重视。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介绍，上海政府在财政预算上和政策上对流动儿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上海本地儿童学前教育学位都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应如何保障需要进一步探索。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认为，由于政府财政支持和有效的管理，民办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帮助十分有效，但是在人口控制的压力下，流动儿童回流以后，当地学校对回流儿童实行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对他们的成长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报告了近来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整体教育经历因制度因素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建议政府部门更加重视在学前教育阶段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吕利丹介绍了近来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持续缩小，留守问题逐渐转移到城镇，城镇幼儿留守增多，低龄留守儿童占比在增加。她呼吁政府关注和重视城镇留守儿童，增加托幼机构供给，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项目主任刘蓓在其讲话中建议卫生和健康部门作为主管单位，应提供0-3岁儿童早期发展全覆盖服务，其中尤为推广普及家访模式、早教入户，同时优化资金的支出结构，重点补贴村医，建立全程监测跟踪系统及大数据管理机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王学男在其讲话中建议构建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寄托”并重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教育体系，包括加强法制建设与村规民约的有机结合，建立三方共识的制度约束，推进寄宿制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寄宿制学校应有的教育功能和补偿性功能，创新联动机制，形成政府兜底、学校主体、家长主责、社会参与的联动体系建设。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根据2008年的研究发现，撤点并校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的成绩，同时寄宿制对农村学生早期身体发育与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他提出，同伴关系与师生关系对农村寄宿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应重点关注。

名师讲堂

感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Joshua Angrist 教授的计量经济学超燃课堂

Angrist教授与学员在课堂上互动

6月3日-5日，经济学圈内的“顶级流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Joshua Angrist 教授在暨南大学进行短期授课，圈粉无数。参与本次讲座课程的有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芝加哥大学、宾州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高校的学员近200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读博士和高校老师。群英荟萃于烈日炎炎下的暨南园，共同聆听来自大师的教诲。

开场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助理教授谢斌作为此次活动的负责人，向学员简单介绍并欢迎 Angrist 教授的到来。

授课现场

助理教授谢斌

他介绍到，Angrist 教授著有《功夫计量经济学》（Mastering'Metrics: The Path from Cause to Effect）与《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教授本人在经济学及广泛的社会领域都受到喜爱与追捧，更是被中国经济学界的粉丝们尊称为“安神”。

Joshua Angrist教授

在三天的 8 堂课中，授课教室座无虚席。Angrist 教授以中国功夫开场，为大家带来了一期别开生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他依次围绕计量经济学中的几个重要话题展开讨论，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工具变量、断点回归设计等。

Angrist 教授在计量理论的教学中非常重视与现实研究问题的结合，讲解了诸多劳动经济学中的经典论文，包括他关于美国公民参军对其今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研究以及他和 Alan Krueger 关于教育回报的研究等。在教授诙谐幽默的课堂氛围中，他充分显示了对课堂内容的超强掌控能力，也充分调动了学员们的积极性，原本稍显艰深复杂的研究内容在他不间断的调侃和逗趣里，显得更有趣易懂了一些。

不止是授课方式十分有趣，Angrist 教授本人也极具个人魅力。课程伊始，他便向大家征集“俳句”稿件，在最后一堂课评选出了此次最佳俳句的获奖者，分发了纪念礼物；上课前教授要求大家都尽量坐在前排，有来迟的学员出现时，他还会为其指出前排的空位要求入座；课间休息时，找他请教问题或求签名求合影的学员排成了长龙，虽然讲课已经非常辛苦，但 Angrist 教授从未拒绝过……

“俳句”获奖者与教授合影

为更好地促进学员和教授之间的交流，IESR 在课程午餐期间安排了几位学员讲解自己的论文，由 Angrist 教授和所有听众进行点评建议。虽然三天紧锣密鼓的课程安排让所有参与者都感到了较高的强度，但学员们的参与热情依然十分高涨，Angrist 教授也同样严谨认真，这让大家非常触动，平添了几分敬意。

课后的走访中，笔者询问了学员们的听课感受和学习心得，大家给予了既相似又不同的回答。相似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他讲述的内容书本上都有，但本尊来进行知识点分解还是能得到更多新知，因此大有收获。

崔潇濛（IESR教师）：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请到这样级别的专家来讲课，虽然我已经毕业而且有些东西也都学过，但重新听一遍还是感觉收获很大。他的讲课方式和课堂内容管理也很值得老师们学习，流畅的讲解背后是他对课堂的精心设计，能够让不同理解程度的学生都有所收获。

王傲(西交利物浦大学硕士&IESR珠江经济学俱乐部会员)：

自己看书没有来听课收获大，老师风趣幽默，课程干货满满，讲课易理解吸收，课后对于看相关的论文也很有帮助。本次作为 IESR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也能够享受到学院的诸多学术福利，非常感谢 IESR 的老师们。

王一初（清华大学博士）：

内容模块对博士生还是很有用的，国内的经济学教育主要在计量理论方面，应用计量和基于面板数据的因果推断课程不多，国内这方面老师也不多，因此能听到这样一个大咖来讲课很难得。

方胜（中山大学博士后）：

近距离接触 Angrist 教授的实证课程，非常受用。我在研究中使用微观计量方法时常常会有一些困惑，但听 Josh 讲解实证方法，让我意识到自己对方法认识的不足，今后还要不断结合具体问题加深对实证方法的理论学习。

丘卓瑜（IESR学生）：

很多问题他在书上讲过，但本尊来把书本上看不懂的东西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讲出来，就很容易被我们吸收。

胡雨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一方面对于工具变量还有回归方法的理解更加深入和透彻。另一方面是我也参与了 labor lunch presentation，在讲自己的初步研究时收获了老师们包括 Angrist 教授的一些非常有益的评价，有很大收获。

在评价课程之外，学员们也对 IESR 的组织和服务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机会参与此类的课程培训。

师于长者，化入本心，如此学员们才能日进增益。感谢 Joshua Angrist 不远万里赴穗倾情传授，也感谢学员们的认真聆听和积极配合，IESR 将总结经验继续完善，为大家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Joshua Angrist教授与参与课程的学子们合影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姚文雄：
Rencent Topics in Household Finance

姚文雄副教授

7 月 2 日 -4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名师讲堂”第 9 期课程顺利开讲。本期课程邀请到我院特聘教授、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姚文雄为暨大师生带来主题为 "Recent Topics in Household Finance" 的课程，吸引了大批师生学习交流。

本系列课程的第一天，姚老师系统地介绍了家庭金融的研究领域和概况。首先，姚老师以常见的 GDP 指标为切入点，指出家庭金融与我们生活各方面息息相关，以美国为例，消费和投资约占 GDP 的 80%。此外，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都涉及到家庭部门的参与，例如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住房市场等。同时，家庭金融也可以研究各种类型的家庭资产，包括现金、权益资产、投资、房地产、交通工具等。其中，Campbell（2006）是家庭金融领域的经典文献，提供了一个概览。姚老师指出，家庭金融的研究最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人们怎么做决策，以及他们所作的决策是否正确或最优。

紧接着，姚老师讲解了近几年家庭金融领域中关于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代表性文献，让大家对家庭金融的热点问题有更加具体的认识。第一篇是 Beshears et al.（2018），作者剖析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行为和其背后的动机。第二篇是 DellaVigna & Malmendier（2019），作者对比了购买不同期限健身套餐的消费者的行为差异，发现购买年卡和月卡的消费者存在明显的过度自信。第三篇文献是 Agarwal et al.（2017），该文章是姚老师和 Sumit Agarwal、Itzhak Ben-David 的合作论文，他们研究了美国消费者选择房贷积分（Mortgage points）的行为差异（购买房贷积分可以抵扣一部分房贷利率），指出贷款者通常高估了他们偿还该笔房贷的期限，对这部分人群，购买房贷积分并不是其最优选择。

课程第二天，姚老师介绍了研究“同伴效应”（Peer Effect）的前沿文献。同伴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例如同学、同事、家人、老乡等，也存在于资产与资产、公司与公司之间。“同伴效应”是指人们的决策或境况会受其同伴的影响。中国的孟母三迁，就很好地说明了邻居的影响。Hong et al.（2004、2005）、Kuhn et al. (2011) 等学者发现，邻居的资产配置选择、购房行为、中彩票事件等，会影响我们的决策。Maturana & Nickerson（2017）的研究表明，老师的经济状况变差会对学生的表现造成负向影响。Chetty et al. (2016) 的研究结果显示，搬去更富裕的地区居住，对儿童（低于 13 岁）有显著正向影响，包括增加他们大学入学率和收入、降低单亲家庭比率（文中指女性成为单亲妈妈的比率）。Harding et al. (2008) 是姚老师和 John P. Harding、Eric Rosenblatt 的合作论文，他们发现法拍房产（Foreclosed Properties）对周围房屋的价格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姚老师还强调，研究同伴效应需要有严谨的实验设置，以获取干净的数据（Clean data），尽量减少内生性的影响。其中，Manski（1993）提出研究群体行为对该群体中个人的影响，需要研究人员具有对照组组成的先验信息。通常，人口迁移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实验环境。例如，Imberman. et al. (2012) 使用休斯顿独立学区（HISD）和路易斯安那州教育部的行政数据，研究了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造成的学生流入，对休斯顿地区学校的学业成绩，出勤率和纪律产生的影响。

课程第三天，姚老师展示了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前沿文献。课程伊始，姚老师从生命周期切入话题，他指出人的一生可以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衡量，比如将未来的预期收入和支出的现金流进行折现，可以计算得到当前时点的现值。投资，包括债券、股票、教育、住房等，都会相应地对现金流造成影响，从而影响现值。Mondragon et al. (2017) 注意到在 2007-2010 年期间，美国学生贷款总量增加了 50%，针对该问题展开研究，作者发现由于房价下降，家庭资产的流动性降低，家庭通过申请学生贷款获得更多流动性。姚老师和 Marco Di Maggio、Ankit Kalda 的合作论文“Second Chance: Life Without Student Debt”中，他们采用收集的诉讼文件和相匹配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研究，发现减免贷款的政策提高了学生的地理流动性和收入。“Fintech Borrowers: Lax-Screening or Cream-Skimming?”是姚老师和 Marco Di Maggio 的另一篇合作论文，他们发现从金融科技公司借款的年轻人具有一些特征，他们通常赚的更多、住在高收入社区、更年轻，然而他们也更容易违约和背负更多的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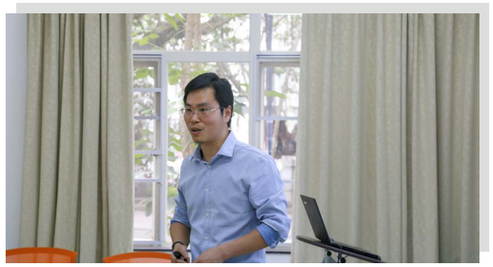
在课程的最后，姚老师还介绍了美国的一些数据库和数据特征，也邀请我院谷一桢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国内关于教育、就业、交通等方面的可得数据。此外，姚老师也积极地与大家分享他做研究的个人经验，他提到做研究需要有创造力和韧性，一项研究可能做十年都未必有很好的结果，但通过不断地展示和交流把这项研究变得越来越成熟。大家需要摆正心态，以平常心待之。

SEMINAR

【SEMINAR135】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瑾：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SEMINAR136】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徐扬：
Trade, Technology, Siz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SEMINAR137】
南京审计大学助理教授郭焕修：
High-Speed Rail Network,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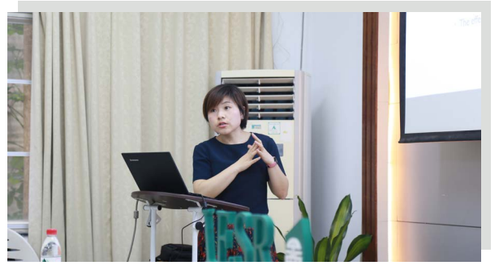


【SEMINAR138】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何国俊：
Influence Activities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SEMINAR139】
四川大学副教授赵绍阳：
全民医保的“最后一公里”：新生儿未参保原因及其影响

【SEMINAR140】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常晋源：
A New Scope of Penalized Empirical Likelihood with High-Dimensional Estimating Equations

【SEMINAR141】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郭萌萌：
Migrant Divers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EMINAR142】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 Slesh Anand Shrestha：
Countering Clientelism: 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s on Elected Local Politicians in India

【SEMINAR143】
韩国西江大学助理教授 Taehyun Ahn：
Employment and Health Among Older People: Self-Employment vs. Wage Employment

【SEMINAR144】
香港大学副教授马驰骋：
The Jesuits and Chinese Science

【SEMINAR145】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Alberto Salvo：
Local Pollution Drives Global Pollution: Emissions Feedback via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Usage

【SEMINAR146】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杨凯：
Estimation and Diagnostic Test of Dynamic Panel Spati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SEMINAR14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鲲鹏：
Threshold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EMINAR148】
首尔大学经济系教授 Jungmin Le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Closing: Evidence from Employer-Employee Matched Panel Data

【SEMINAR149】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杜金钊：
Convenience vs. Pleasance: Two-Dimensional Matching and The Information Design on Peer-to-Peer Platfo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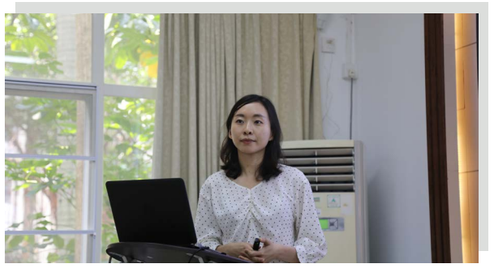
【SEMINAR15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李红军：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Weight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SEMINAR151】
英属哥伦比大学副教授 Tsur Somervill：
Not in my neighbour's back yard? Laneway homes and neighbours' property values

【SEMINAR152】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陈超然：
Health, Health Insur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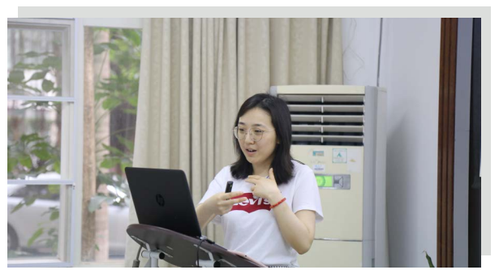
【SEMINAR153】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陈劼：
The Long Run Impact of Education on Non-cognitive Outcomes

【SEMINAR154】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郭乃嘉：
Do elite colleges matter? Its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cision and dyna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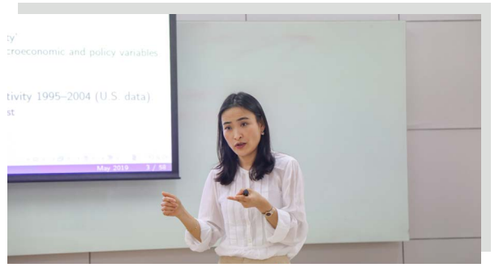


【SEMINAR155】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助理教授袁海山：
Formality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Notches in China's Value-Added Taxes

【SEMINAR156】
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朱雪宁：
Portal Nodes Screening for Large Scale Social Networks



【SEMINAR157】
伦敦政治副教授 Liwa Rachel Ngai：
The Decision to Move House and Aggregate Housing-Market Dynamics



【SEMINAR158】
厦门大学教授陈海强：
A New Approach to Test Predictability in Quantile Regressions with Persistent Predictor

【SEMINAR159】
武汉大学特聘副研究员郭汝飞：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ndowment: Evidence from a Social Experiment on Tw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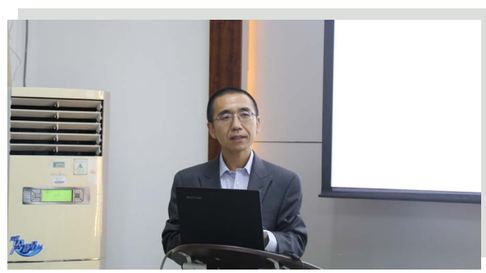
【SEMINAR160】
上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徐剑锋：
Handwriting Quality and Grader Bias

【SEMINAR161】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陈晓光：
量化温度对中国农业总产出的影响

【SEMIANR162】
清华大学副教授曹静：
Carbon market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Carbon Market Pilots

【SEMINAR163】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助理教授宫晴：
Physician Learning and Treatment Choices: Evidence from Brain Aneurysms

【SEMINAR164】
华盛顿州立大学副教授白金辉：
The Welfare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iscal Volatility: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EMINAR165】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洪圣杰：
Inference in Partially Identified Panel Data Models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SEMINAR166】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祁涵：
Global Sourcing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Expo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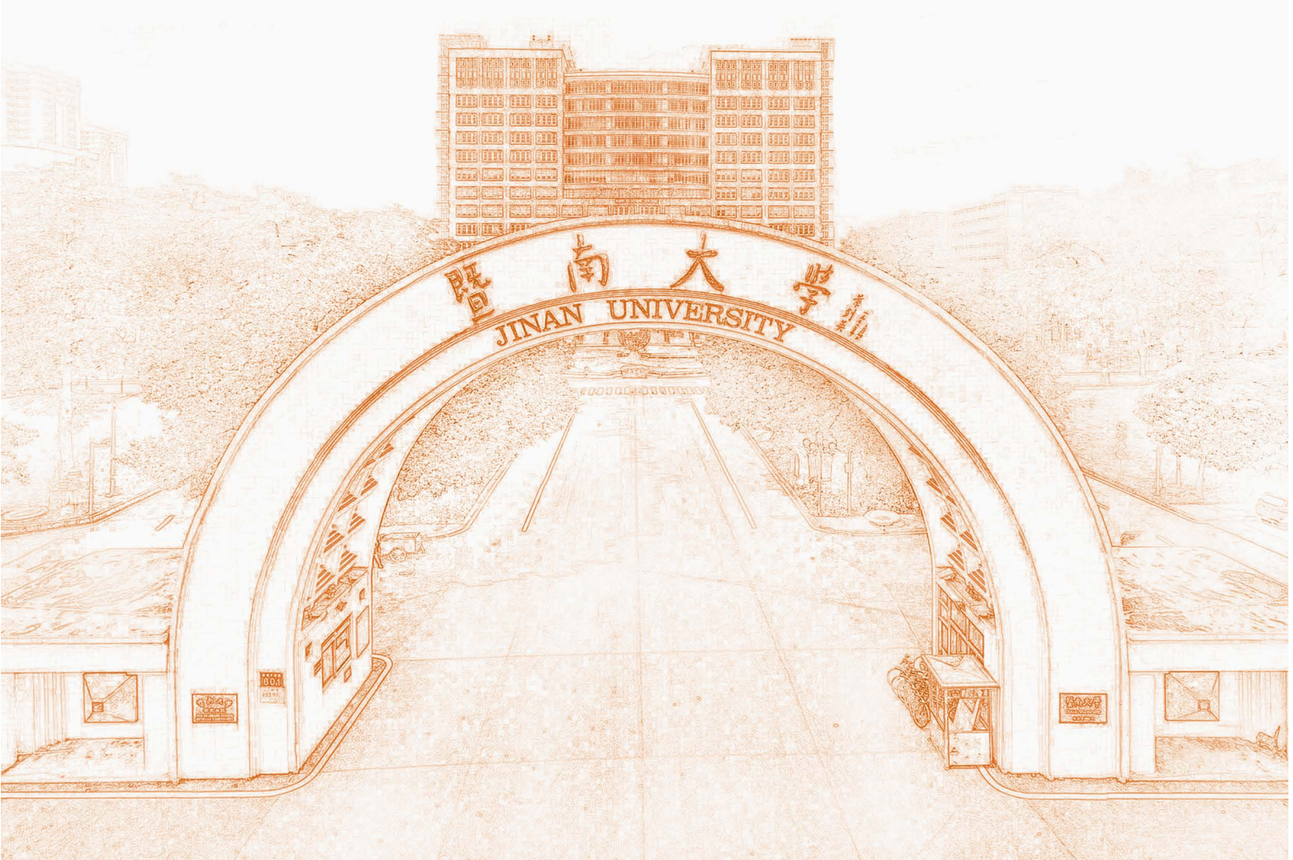
思想 聚焦

【暨济一堂】

【观点评论】

高考热点专题、家庭经济专题、乡村振兴专题、流动人口专题、其他热点专题

【媒体聚焦】



暨济一堂

随迁子女入学、教育、营养……
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政策论坛观点集萃

4月18-19日，我院于四川绵竹顺利举办了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政策论坛中，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嘉宾共济一堂，讨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教育、营养等方面的制度、政策问题。本文梳理了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吕利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项目主任刘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王学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史耀疆的精彩观点和政策建议。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会影响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代际延续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摘编

2019 年 4 月 18-19 日，在我院举办的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专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徙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史耀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各位嘉宾学者通过大量的前沿数据、丰富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与会人员对流动人口问题的视野，加深了对流动人口的认识。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精彩内容回顾

圆桌论坛现场

2019 年 6 月 18 日，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在暨南大学举办，本次年会特设“中国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与挑战”圆桌论坛，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商学院教授邓永恒、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汉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秦虹、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晓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与住区研究所所长卢华翔、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德思勤集团董事长龙固新分别发表了精彩演讲。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齐晔：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齐晔教授

2019 年 4 月 11 日，IESR“问政暨南”系列第九讲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教授。齐晔教授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政策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为师生分享了当前中国能源转型及其治理变革现状问题。

齐晔教授指出，当前中国能源转型现状反映了七大趋势：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煤炭消费达峰、能源强度下降、电气化趋势、天然气的比重提高、能源体系的低碳化，以及碳排放的可能达峰。

简而言之，当前中国能源系统正处于重大转型中，其趋势表现为去碳化进程与煤炭消费的达峰。国内能源现状稳定趋向实现《巴黎协定》上的拟定目标。这一能源范式的变革，背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政治施政理念与政策实践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新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

2019 年 5 月 21 日，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塞浦路斯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塞浦路斯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来访暨南大学，出席“大师暨南行”系列活动，发表了题为“Work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题演讲。

皮萨里德斯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新技术对于劳动力市场与职业变化的影响。在讲座中，他与我们分享了今天新技术的发展与影响。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在经济增长当中处于落后的地位？经济增长怎么样才能让所有的人获益？如何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带着这些问题，皮萨里德斯教授从五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研究。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Robert Moffitt 谈如何衡量贫困

Robert Moffitt教授

如何定义贫困？世界各国如何界定贫困？反贫困计划是否引起了贫困陷阱？

6 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艾森豪威尔经济学教授 Robert Moffitt 来访 IESR，并作了题为“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does anti-poverty programs create poverty traps?)”的讲座。 Moffitt 教授认为，反贫困项目的设计需要考虑许多原则，并权衡多方问题，通过分析美国的经验，希望可以为国际上的反贫困项目提供参考。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观点评论 - 高考热点专题

【财经网】薄诗雨：平行志愿减少 6% 的错配，出分报考减少 18% 的错配

高考（网络图片）

作者：薄诗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最近，在一篇精彩的知乎帖子里，经济学被戏谑的称为“最近二十年唯一的现实贡献是换肾”。这大概是只有专业人士才会会心一笑的梗，因为即使是经济学与换肾的关系也未必能被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熟悉。事实上，正是经济学中的“匹配”理论，为换肾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是纽约大学的罗斯（Alvin Roth）教授，他对以换肾问题为代表的市场设计和匹配理论的贡献使他荣膺 2012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换肾这个例子也许离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我们生活中可以遇到许多类似的问题。婚姻市场和学校招生制度也大量运用到了“匹配”理论。大学招生和换肾问题类似，同样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大学教育）分配。而出于教育公平的原因，“价高者得”在这里同样无法起到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作用。更复杂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对多”的分配，每个大学可以录取多个学生，而非换肾中的“一对一”匹配。高考招生对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影响十几亿人的问题，每个参加高考的考生都会有填报志愿的机会，而最终高校和考生之间将根据考生的分数和志愿，基于某种录取规则形成最终的匹配。这里的录取规则，核心就是采用何种算法对考生和高校进行匹配。

在本世纪之前，我国高考一直采取的是顺序志愿的录取规则。这个规则非常简单明确，每个考生都会填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等数个偏好的高校。每个高校则首先考虑将其列为第一志愿的考生，并按他们的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如果没有录满，则考虑将其列为第二志愿且还没有在第一志愿被录取的考生，并按他们的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依此类推第三甚至第四志愿。这一规则简单明确，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学资源是稀缺资源，高校招生名额有限，大多数高校往往在第一志愿的考生里就招满了所有名额，不

会再推及将其列为第二志愿的学生。这样，每个考生的第一志愿几乎决定了命运，一旦出现考生的第一志愿扎堆以及所谓的“大小年”的情况，很容易出现高分考生直接落榜的情况。例如，假设一个省共有 100 个清华北大的招生名额，但前 101 名考生都选择了清华或者北大的第一志愿，那么第 101 名的考生就会因此落空第一志愿，如果他的第二甚至第三志愿填报的高校在各自的第一志愿档已经录满（对于优秀的考生而言，第二第三志愿往往也可能是热门高校），他将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因此，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往往采取策略性的操作，隐藏自己的真实偏好，最终将会形成数万考生间复杂的博弈，就会看到有很多高分考生上了一所完全不匹配他分数的一所学校，要么复读一年，要么就委曲求全，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数。其实，这种简单明了的顺序志愿规则不仅在我国的高考存在，同时也存在于很多其他的学校录取制度中，例如波士顿、夏洛特、西雅图等地的公立学校的入学制度也是如此，这种规则也被称为波士顿机制（Boston mechanism）。

盖尔与夏普利两位数学家提出了“延迟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的解决方案。主要思想是，在高校考虑将其列为第一志愿的考生并择优录取时，只是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匹配；接下来，高校继续考虑将其列为第二志愿的考生，如果当中有考生要比第一轮中临时达成匹配的考生更优秀，他们将可以取而代之达成又一轮临时性的匹配；依此类推第三、第四以及接下来的志愿档次。也就是说，高校会多选几轮，而非机械地只选择将其视为第一志愿的学生。当把每一个志愿档次的学生都依次考虑完后形成的匹配才是最终的录取结果。顾名思义，这种规则之所以称之为延迟接受就是因为每一轮的匹配都是临时的而非最终的结果，到下一轮总会进行更新。直观看来，延迟接受算法相对于波士顿机制来说，注重保护高分考生，即使他们的第一志愿没有被满足，他们接下来也同样会在第二第三志愿中获得相对于低分考生的优势。理论上来说，延迟接受算法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具有防策略性，能让考生和学校都真实的透露自己的偏好，同时也能实现稳定匹配，也就是不会出现比自己低分的考生去了自己更想去的学校这样的情况，让最优秀的学生考上的学校配得上他的分数。当然，这个理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想情况下，例如每个学生提交对每个学校的志愿顺序等等。因此，应用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一定的修改。

同样在我国，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者们也发展出了一套与延迟接受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更适合国情的录取制度，即平行志愿机制。这一机制从本世纪之初在湖南省开始实验推行，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基本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平行志愿与理想的延迟接受算法的理念很接近，区别在于，考生只有对少数的学校（通常是三到六个）排列自己志愿的机会。字面上看来，平行的含义是这几所学校对考生的志愿顺序是一视同仁的，只要考生分数够高，即使落到第二第三志愿也同样比低分考生有优势，而非像顺序志愿那样对排在前面的志愿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制度的实质其实仍然是延迟接受算法，只是因为高考的现实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所有考生针对所有学校的志愿排序因而做出了较大的简化。密歇根大学的陈岩（Yan Chen）教授的一篇最新的研究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延迟接受统一起来，证明了现行的平行志愿会是比顺序志愿更好的机制，而且平行的可选校数越多则均衡越稳定，并利用实验的方法肯定了这些理论上的结果。

顺着陈岩教授的理论逻辑，笔者和同事宋彦、徐吉良以及布朗大学的刘璟、北京大学的周森等合作者一起搜集了历年以来各省高考录取制度的背景细节以及 2005-2011 年的高考录取数据以验证平行志愿是否真的更加理想。结果发现，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将减少 6% 的错配（主要是“高分低就”）现象。而且正如陈岩教授的文章所预见的，这一效果将随着平行的可选院校数量增大而增大每增加一个平行选项，错配就可以减少将近 1%。这一改革的效果主要集中在非一本院校、文科考生与录取指标相对较少的省份。

我们同时还检验了另一项相关的政策，即填报志愿的时间段带来的影响。除了现在最普遍的考后出分之后报志愿以外，曾经还有两种不同的填报志愿的时间安排，一是考前报志愿，二是考后出分之前报志愿。由于不同的时间段考生以及家长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所以填报志愿的时间毫无疑问会对匹配的精确度产生影响。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现在最普遍的考后出分之后报志愿最有利于提高匹配质量，平均可降低大约 18% 的错配发生概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匹配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匹配质量。

纵观当下各个省的高考录取制度，考后出分 + 平行志愿的模式已成为主流，而这恰恰是我们研究所发现的最有利于匹配质量的方式，也最符合许多经济学家、数学家的理论预测。可以说，在这场事关几亿青年前途未来的考试中，政策制定者在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规律，和学者的研究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增加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本文首发于财经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 11 日文章。

【腾讯今日话题】宋彦：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择校（网络图片）

作者：宋彦（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这两日，各省高考成绩纷纷出炉，填报志愿在即。目前考生们最关心的话题莫过于，自己的分数能不能上 XX 大学？填报志愿时是要 " 冲一冲 "，还是”稳一稳“？怎么判断哪所学校稳了？传说中的考得好不如报的好是真的么？

考生们的焦虑来源于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考生对学校的偏好，填报志愿的策略和各地所用的录取制度共同决定了这种不确定程度的高低。在平行志愿越来越占据主流的今天，这种不确定性已经相对降低了，但是哪些人在改为平行志愿后受益，哪些人失去了在梯度志愿下的优势呢？这些问题有深入了解的必要。

志愿填报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

录取制度包括了梯度志愿和平行志愿，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优先志愿，后者优先分数。

举个例子来说，在使用梯度志愿的省份里，学生 A 的两个志愿顺序是“燕京大学”和“双鸭山大学”。如果 A 在第一轮录取中没有被燕京大学录取，那么就要进入第二轮录取。但是如果双鸭山大学在第一轮录取已经招满，即使录取的考生分数不如 A，A 也无法被双鸭山录取。

相反，如果 A 所在的省份是平行志愿，无论双鸭山在 A 的志愿上是第几位，A 都可以在第二轮录取中把分数比 TA 低的竞争者 PK 出去。因为在平行志愿里，高校在每一轮录取中只考虑学生的分数来决定是否录取。

不管是哪种录取制度，考生填志愿的时候都要同时考虑想要读的学校，和被他们录取的概率。比如说，虽然大家都很喜欢燕京大学，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那些最高分的人很大概率会第一志愿填报燕京大学，自己被燕京录取的概率很小，因此不太会把燕京大学放在自己的志愿上。由此可见，考生填报志愿时，既要考虑自己想上哪些高校，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学生的策略对自己录取概率的影响，属于典型的博弈问题。

和几种常见的博弈问题类似，例如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高考志愿填报的博弈的核心是根据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最优的应对方式。而高考志愿博弈的特点在于有着数量庞大的游戏参与者，例如安徽省 2018 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接近 50 万人，每个考生的策略的不同，和填志愿时所拥有的信息的不同使得分析博弈的结果变得非常困难。

也正是由于高考志愿博弈的参与人数巨大，博弈环境复杂，因此使用何种录取机制影响深远，给比较录取机制的研究带来了挑战。下面我们从分别考生的策略性和所掌握信息的准确性两方面来探讨录取机制对考生志愿填报策略，和高考录取结果的影响。

填志愿时你佛系了么

为了讲清楚策略和考生录取的关系，我们先简单的把考生分成两类：一类是会考虑自己被心仪的高校录取的概率，并且根据概率来填报志愿的考生，和不考虑录取概率，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志愿的考生。我们把这两种考生分别称作有精明的和佛系的考生。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三个学校 1，2 和 3 参与一个采用梯度志愿的省份的高考招生，而且每个学校各招一个人。三个考生 A,B 和 C，他们高考的分数排序是 A>C>B，而他们对三所学校的偏好完全一致，即最喜欢 1，其次 2，最后是 3。三个考生完全知道自己的分数，相对排名和所有人的偏好。考生 A 和 B 是精明的，而考生 C 是佛系的，那么三位学生最终会被哪所学校录取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 A 的策略。由于 A 是最高分，他可以不考虑其他学生的志愿，只考虑自己对学校的喜好，因此 A 会被高校 1 录取。

接下来，再来看 B 会如何填报志愿。B 的高考分数虽然不如 C，但是 B 的优势在于他很精明，会根据 C 的填报策略来判断如何最优的报考学校。B 能判断出 C 的志愿顺序是 123，并且 C 会被学校 1 拒绝（因为 1 的名额已经被学生 A 占了，学生 A 的成绩比 C 更好）。因此 B 只需要把高校 2 放在自己志愿的首位就会被 2 录取。虽然 C 的分数比 B 更高，但是由于 C 把学校 2 放在了第二志愿中，因此在梯度志愿里面，学校 2 是会优先录取把自己放在第一志愿的 B 学生。最终分配结果为 :A:1,B:2,C:3。尽管 C 比 B 考的分数要高，但是由于志愿策略的问题被挤出了自己本来应该可以上的好学校。

偏好	A(精明的)	B(精明的)	C(佛系的)	学校 1	学校 2	学校 3
	1	1	1	A	A	A
	2	2	2	C	C	C
	3	3	3	B	B	B
梯度志愿	**学校 1**	**学校 2**	**学校 3**			
(第一轮)	A,C	B				
(第二轮)			C			
最终结果	A	B	C			
平行志愿	**学校 1**	**学校 2**	**学校 3**			
(第一轮)	A,B,C					
(第二轮)		B,C				
(第三轮)			B			
最终结果	A	C	B			

那么平行志愿（可以填报的平行志愿数量为 3 或者以上时），录取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当平行志愿的数量超过学校数量时，学生填报志愿没有任何动机去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因此最终的录取结果将是 A:1,B:3 和 C:2。和梯度志愿进行对比，我们显然可以发现成绩更好的 C 从学校 3 去了更好的学校 2，而成绩较差的 B 则从 2 去了更差一点的学校 3。我们可以认为平行志愿帮助佛系的 C 讨回了在梯度志愿中损失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佛系的学生确实存在么？根据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Abdulkadiroglu 和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在梯度志愿的环境中，有接近 20% 的学生把热门学校放在了自己志愿的第二位。而如果学生都是完全理性的话，这种填报志愿的行为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被热门高校大部分在第一轮就已经完全招满了，在第二轮还有空位的概率很低。而研究人员发现确实有接近 27% 的这部分人最终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 (Abdulkadiroglu et al, 2006)。

正是根据上面的研究发现，美国开始对学校录取制度进行改革，从梯度志愿过度到平行志愿。例如，波士顿在 2006 年将使用了 5 年多的梯度志愿改为了平行志愿。中国各省份也在 2003 年逐步开始了类似的改革，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大部分省份都不再使用梯度志愿，而是采用了平行志愿，尽管各省允许的平行志愿的数量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但是最近几年，不管是学术界还是考生家长，都开始质疑仅仅根据平行志愿能够避免佛系学生的利益受损就弃用梯度志愿的论点。在一次关于录取制度的听证会上，一位美国家长表示教育机构取消梯度志愿，实质上剥夺了家长能够在教育体系中的仅有的话语权 (Abdulkadiroglu et al, 2011)。而最前沿的研究也证实了，当考虑了不同学生对高校的偏好的强烈程度不同时，梯度志愿能够比平行志愿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 (Abdulkadiroglu et al, 2011)，Calsamiglia et al, 2018)。因此，从策略性的角度来说，录取制度的优劣之争尚未有定论。

不完美的信息

上面的分析考虑的是每个考生都掌握了几乎完美的信息的情况，现实中，考生面临的几万同龄人的竞争，也很难准确判断自己能否被某些高校录取。那么如果我们考虑这种不完美信息的情况，哪种填报志愿的方式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Adam Kapor 和其合作者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在美国纽黑文市 (New Haven) 调查了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被几所指定的学校录取的概率，并且将这些概率和真实的概率进行对比。他们发现家长们都显得过于乐观，平均把被录取的概率高估了接近 30%，而且家长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容易在估计录取概率上犯错，错过被心仪高校录取的机会。

这种信息上的不平等在中国的高考中同样存在。高考结束后，生活在北上广的考生可以穿梭于当地各个高校的招生说明会，直接和高校负责招生的老师沟通，较为准确的估计自己被录取的概率。而其他地区的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根据往年的经验或者网上的信息来大概猜测自己被录取的机会。因此，城市的考生能够借助信息上的优势，更有针对性的填报志愿，在和农村的考生的竞争中获得先机。

因此，当考生不能准确的估计自己被录取的概率时，平行志愿能够减少一个错误填报的志愿给考生带来的损失，降低信息不平等带来的高考录取的不公平，提升社会总福利 (Kapor et al, 2019)。

总结

综上所述，到底是该使用梯度还是平行志愿取决于考生的类型和所掌握的信息。当很多考生不能够理解梯度志愿的运行方式，而按照真实偏好填报时，平行志愿能够帮助这部分考生避免被有策略性的考生抢占更好的高校资源。类似的，当社会地位较低的考生不能够准确预测自己被所填报志愿学校录取的概率时，平行志愿也能够帮助他们避免被有误差的信息所伤害。中国城乡差异较大，城市居民在掌握信息和填报志愿的策略性上都可能强于农村居民。因此，平行志愿可能比梯度志愿更加适合中国的高考制度。从 2003 年湖南省开始试点使用平行志愿以来，几乎全部省份都从梯度志愿改成了不同类型的平行志愿，和研究结论一致。

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未必不会有变化。特别是一些省份某些科目难度和区分度在不断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以考试结果为主来决定谁来读哪个学校，把考生的偏好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现状是否合理，是值得讨论的。

本文首发于腾讯网今日话题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 月 26 日文章

【羊城派】陈祎：“3+1+2”方案下，化学可能成为物理之后的遇冷科目

作者：陈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4 月 23 日，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新高考方案从 2018 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2021 年高考按新方案考试和录取。

新模式能否规避物理遇冷问题？

在谈这一问题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3+3”模式下物理遇冷背后的本质问题——应该赋予考生多大的科目选择权？

高考的根本目的是选拔具有高能力的人才，那么有哪些情况下会出现考生没有被与之水平相称的大学录取的情况呢？

除了考生临场发挥和志愿填报出现失误外，在现行高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则体现为考试科目选择的策略性。

在给定自身水平的前提下，如何通过科目选择，避开竞争激烈的科目，从而使自己脱颖而出，成为了广大考生目前密切关注的话题。

在先行启动的“3+3”模式下，考生需要在六门（浙江为七门）选考科目里选取三门进行等级考试，三门选考科目将进行标准化的等级赋分，也就是考生最终分数是由该科目成绩的百分位决定（以北京为例，前 1% 赋分 100，前 1%-3% 赋分 97）。

物理一般被认为是较难的，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复习；此外，由于排名较高的大学和专业很多会要求选择物理科目，因此更优秀的考生会更倾向于选择物理，导致物理科目的等级赋分竞争更为激烈，物理遇冷也不难理解。

浙江 2017 年新高考第一年，选考物理的学生大约 8.9 万人，占考生总量的 35%，在所有学科中位居第六位。

为了应对选择物理人数过少带来的恐慌，浙江甚至出台“兜底”政策：如果物理选考人数少于 6.5 万，以 6.5 万为基数来计算赋分。

由此可见，高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赋予考生过多的选择权可能是有问题的，在挑选人才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希望其中包含太多的策略成分。

在田忌赛马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齐威王的上、中、下马都快于田忌，但田忌通过孙膑提出的策略最终战胜了齐威王，但是高考的初衷却是希望选出本身跑得更快的“马”。

“3+1+2”模式相较于“3+3”对考生的选择权进行了一定的约束模式。

改革之后的“3+1+2”模式，科目组合数从“3+3”的 20 种下降到 12 种，并且提高了物理相对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理遇冷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考生选择自由度过大的情况。

尽管“3+1+2”模式下物理遇冷问题无疑将得到缓解，但目前已经有人开始担心化学会成为下一门遇冷的学科，这是科目选择和等级赋分共同作用下，考生的策略选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当然，科目设计也不宜走向另一极端——完全不给考生任何选择权。

因为人的才能是多维度的，也确实会有偏才和怪才的出现，而这些考生在完全统一的综合性考试中往往难以脱颖而出。

新高考改革前我国长期执行的文理分科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至于给予考生多少选择权是最优的还有待科学论证，我个人的判断是“3+3”模式给予考生的自由度是偏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3+1+2”模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走班制，广东准备好了吗？

走班制并不是一种新鲜的制度，美国的高中有很多采取走班制，而大学的教学也主要采取走班制。

在广东“3+1+2”的改革模式下，虽然科目组合从“3+3”的 20 多种下降到 12 种，但不同组合的选择人数必然有差异，因此按组合采取固定班制度对大多数中学而言依然不现实。

因此，走班制可以说是广东新高考模式下的一种必然趋势。

走班制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走班”本身，而在于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问题。

走班制不但对学校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自我管理提出了挑战。

因为在固定班级的情况下，同学与同学、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都较为稳定，这既有助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鼓励，也有利于老师对学生进行监督或针对性指导。

实行走班制后，“同学”和“老师”的概念更为流动，因此，学生的学习更依赖于自身，也更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这对中学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

走班制另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学校之间的不平等。

在已经实行“3+3”模式的省份大多数中学已经采取了走班制，在“3+3”模式和走班制的共同作用下，原先的冷门科目（例如地理）迅速升温，对相关教师的需求也快速提高。

当教师供给出现不足时，重点中学可以凭借其资源优势吸引优秀教师，满足其学生科目选择的需要；

而普通高中更可能面临某些科目教师不足的窘境，甚至因为无法开设某些科目而强迫学生改选其他科目。

当然，在“3+3”模式下也有不少高中不采取走班制，而依旧采取固定班制。

此时学校势必无法满足所有科目组合的需求，于是会要求学生在比较少的几种组合里选一种并编入固定班级。

这种方式尽管沿用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也避免了走班制带来的管理问题，但由学校出面限制学生的科目选择是否合适？是否有悖新高考的初衷？会不会出现学生因无法选择最擅长（或心仪）的科目而导致竞争力下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走班制虽然势在必行，但是走班制下如何分班、如何管理、课表如何制定等问题应从学生、家长、学校、教育局等多方意见进行收集，逐步完善走班制的实践机制，罗马并非一天建成，而广东高考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年多考，是否加重师生负担？

一年多考无疑能够降低考试临场发挥的随机性，并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业水平。

至于是否会加重师生负担，我的观点是既会也不会——降低的是心理负担，增加的是备考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许多考试也是可以考多次的（如：SAT、托福、GRE），但美国大学采取的是申请 - 录取的制度，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因此考生往往只有在预期能够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时才会考虑再考一次。

但在我国，高考分数目前依然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并且在考生人数众多而理想大学名额稀少的背景下，有“高考一分，压倒千人”的现象。

因此，只要有提升分数的可能，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尝试。

根据我在上海了解到的情况，英语实行一年两考后，绝大多数考生都选择考两次，只考一次的考生凤毛麟角。

尽管如此，一年多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下降无疑对考生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宽慰。

尽管当下高考已称不上“一考定终身”，但其对人生轨迹的重大影响依旧毋庸置疑，重压之下，难免部分考生会临场发挥欠佳。

因此，一年多考也有助于缓解考生压力，发挥出自身的正常水平。

广东省教育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治理“高考移民”工作的通知》开展治理“高考移民”专项行动，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

5 月 13 日，深圳市教育局对近日沸沸扬扬的富源学校高考移民事件做出回应，经查实，2019 年富源学校高考报名生中存在 32 名高考移民，取消其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格，并对富源学校予以行政处罚，核减该校 2019 年高中招生计划的 50%。那么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高考移民现象的产生需要从高考录取的配额说起，我国目前的高考录取采取分省配额制。每年，教育部会确定各高校在各省的招生配额，将同一省份的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根据学生志愿择优录取。因此，一个高考考生的录取几率取决于两方面：其所在省的配额，以及该考生在省内的排名。如果一个省的配额很多，即使排名有所降低，也可以上到好大学；另一方面，即使一个省的配额较少，但只要考生在该省高考中有更高的排名，就有机会被更好的大学录取。可以这么说，只要高校录取按地区划分配额，人们就会一直有高考移民的动力，因为重点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受政策照顾的边远地区（如：新疆、海南）录取率相对较高。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用脚投票”，这个概念也常出现在高考中用来看人们是否会因为某个省市高考容易而集中迁往此地。近些年来，全国多地严查“高考移民”现象，除了此次深圳富源学校事件，2014 年内蒙古就曾清退 1465 名“高考移民”，其中相当多的移民家长为河北省的公职人员。“高考移民”的频发印证了其背后的旺盛需求，以及所折射出的高考地区间的不平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高考移民”同样存在，某华侨教育机构的广告词就是“普通高考，压力山大，还要面对千万大军！华侨生联考，让孩子轻松上名校”。

多年来，应对高考移民的情况，国家采取的方式是收紧高考报名条件、加大治理非法的高考移民。从 2004 年开始，教育部就开始发文要求严肃查处非正常迁移户口投机高考的行为，各省教育厅也纷纷出台了户籍学籍双认定的高考报名规定。但是，完全杜绝高考移民对于人口流动频繁的我国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刨去不符合高考报名规定的非法移民，也确实有合规的高考移民存在（是不是“钻空子”另当别论）。近年，在我国逐步开放“异地高考”后，就更难界定究竟谁是高考移民。

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面对高考移民的现象，一方面，确实需要落实政策，严格审查高考考生的报名资格；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有关部门关注一下驱动高考移民的地区不平等问题。

对新高考的稳步推进有哪些建议？

首先，高考改革需要审慎，不宜过于频繁。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招生方案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从目前形势看来，眼下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高考重大改革。高考对于中国家庭的重要性无需多言，高考不但是考生自身的事，也是整个家庭多年奋斗的目标。从小学到高考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最终的一场考试，更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过程。高考作为指挥棒，影响深远，将高考政策比喻成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也不为过。资本投资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本亦是如此。事实上，2018 年多省宣布推迟一年启动改革，也说明了民众反响很大，政府需要拿出更为缜密的改革方案。

其次，高考的公平公正性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近几年多项加分项被取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比如饱受诟病的体育特长生加分），但仍有一些争议项目被保留，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少数民族加分。以贵州省为例，2018 年获少数民族政策加分的比例高达 45%，甚至出现了裸分状元因为没有享受加分而险与北大失之交臂的情况。另一个广受质疑的可能影响公平的政策就是之前提及的录取名额按省分配。对于这些加分和录取出现有选择性倾斜的情况，相关教育部门应该及时做好各方意见征集，对加分和录取的特殊情况做出充分调研和判断，在兼顾民族公平的同时考虑地区公平。

最后，高考改革不仅要考虑考试本身，还要基于整个教育流程进行通盘考虑。高考上承基础教育，下启大学学习。高考的改革，既会影响中小学的学习，也会影响考生进入大学后的表现。比如“3+3”模式下的物理遇冷，就引起了民众对未来可能缺失相关领域人才的担忧，这其实是在呼吁高考改革需要更多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支持，这里的研究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旗下 APP“羊城派”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21 日文章

观点评论 - 家庭经济热点专题

【澎湃】一石三鸟：加强婴幼儿照护正当其时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授）

2019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为此前基本上处于政策空白区的 0-3 岁照护服务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在此，笔者尝试对该意见提供一个初步解读。

首先，《意见》的发布体现了顶层设计的思路，其理念先进科学，符合国际潮流，切中现阶段现实国情。

《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疑体现了最高决策层对于婴幼儿照护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什么一个长期被政策面几乎完全忽略的问题，能够在当下成为政策热点呢？这其实和我们目前的国情和面临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

我认为《意见》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应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一是促进婴幼儿的人力资本发展。中国要建设人力资本强国，就必须要从娃娃抓起。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将得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国际权威专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赫克曼曲线指出，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最高，尤其是 0-3 岁阶段。目前的认知科学的最新发展和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这一论断。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学前教育的政府财政投入只占总的教育经费的 8% 左右，而 0-3 岁幼儿园前阶段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意见》的出台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有望从根本上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针对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少子化问题。中国预期将在 2030 年或更早进入人口总量减少阶段。由于中国目前总和生育率仅为 1.5-1.6 左右甚至更低，远低于 2.1 的世代可更替水平，未来人口总量将持续快速下降，从长期来看将威胁到民族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不可能如一些小国一样依靠国际移民解决问题，因此提高生育率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但养育孩子的高成本是导致很多家庭不敢生或不想生的重要因素。如果婴幼儿照护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无疑将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提高我国的总和生育率。

三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劳动力人口总量下降阶段，伴随人口总量减少的是老龄化程度的急剧上升，劳动力年龄阶段的人口问题已经凸显，并将继续恶化。因此，女性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缺乏的危机。但是，我国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过去三十年来持续下降，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水平也不断下降，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女性必须同时兼顾家庭和职场。女性因为照顾年幼的子女，可能不得不中断其职场生涯，这对于其长期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良好的社会化托育服务将有助于帮助女性解决后顾之忧，更好地投身于劳动力市场。

其次，《意见》的发布涵盖内容丰富全面，但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在下一步工作中厘清。

一是明确了婴幼儿照护的有关各方的角色定位。《意见》提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家庭对婴幼儿照护负主体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将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家庭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加强指导，通过入户指导、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等方式，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其目的在于增强家庭的科学育儿能力。对于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政府支持鼓励各类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发展，通过这些机构向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应该讲，当前的政策考量已经非常全面到位，但仍有一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家庭主体责任具体如何体现？如果家庭对于婴幼儿发展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政府是否可以，以及应该如何介入以保护婴幼儿安全和健康？又比如，对于各种形式的照护服务，政府财政将如何投入？家庭在婴幼儿托育服务中

多大程度上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这可能都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问题。

二是明确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百花齐放”的全面发展战略。《意见》鼓励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既包括营利性，又包括非营利性，既包括新建，又包括扩建、改建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设施。从性质上看，既包括公办民营，又包括民办公助等形式，甚至鼓励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些都真正体现了儿童优先的原则，显示了政府为保护婴幼儿安全和健康，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而乐于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发展理念。

国家的政策导向将很有可能带来早托行业的井喷式发展。政府应该尽快出台具体的政策，支持并监管不同类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允许不同方式的试点，从试点中总结经验，又要加强底线意识，切实保障婴幼儿及其家庭的权益不受侵犯。另外，关于婴幼儿发展的研究在国际上也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有必要大力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并在可靠的经验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一定的托育标准和规范，加强培训，提高婴幼儿发展照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三是明确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分工和具体职责。《意见》规定，“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协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群团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监督，强化行业自律，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健康发展。”这其中明确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规范，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婴幼儿照护卫生保健和婴幼儿早期发展的业务指导”。

由于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涉及的部门非常之多，在实际工作中，跨部门合作的效率如何，可能还有待于观察。地方政府有必要对于卫生健康部门的牵头工作给以坚强支持，确保不出现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等不良现象。

最后，《意见》所涉及到的内容应该是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应在其他方面协同努力，以达到最好的政策效果。

一是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的配套。《意见》提出要“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这些政策都需要和现有的有关劳动关系、职工培训方面的法律政策进行具体对接，以防流于空谈或产生意想不到的其他负面影响。另外，适当延长男性陪产假，考虑男性育儿假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政策选项。这不仅可以减低女性因为享受产假，育儿假而招致的歧视，也能使得男性更多参与家庭劳动和儿童看护，分担女性的家庭负担。这两者都有利于女性可以更多更好参与劳动力市场。

二是与其他家庭政策，特别是与生育相关的政策的配合。如前所述，《意见》出台的一个潜在目标是提高生育率，只有与其他政策手段同时发力，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比如，在税收政策方面，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仅包括学前教育，也就是年满 3 岁至小学入学前教育阶段，未来应该可以考虑将 0-3 岁的婴幼儿阶段也包括在内。另外，在教育方面，城市地区的入园难的问题日渐突出。如果不能解决好幼儿园供应不足的问题，单单着眼于 0-3 岁的托育服务，对于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将比较有限。

三是对特殊人群的婴幼儿托育需求专门进行考虑。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婴幼儿发育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地区，由于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居住更为分散，其托育需求与城市地区也非常不一样，应该加大投入，并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流动人口的婴幼儿托育需求也具有其独特性。《意见》提到“按照属地管理和分工负责的原则，地方政府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负主要责任”，但并没有明确提及户籍问题。按照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做法，流入地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同样负有主要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在具体操作中多大程度能够落实，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10 日文章

【财新】都挺好？看重男轻女如何影响父母时间分配

重男轻女（网络图片）

作者：薄诗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为了缓解性别不平等的世代循环，社会政策一方面需要干预劳动力市场、维护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另一方面还需要确保女性从童年时期就受到平等的对待，通过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女性得到健康的成长。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规范向来重男轻女。在小农经济时代，其原因无非有二：从文化意义上，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从功能意义上，儿子不仅需要挑起农业生产重任，还需要照顾老去的父母。因此，与“养儿防老”相比，外嫁的女儿更像是“泼出去的水”，她们肩负着丈夫家的生产与照顾工作。由于生男生女的效用并不一致，不少家庭在生育、养育等问题上采取了重男轻女的方式。例如，在近日一部讲述原生家庭对子女影响的电视剧《都挺好》中，苏家父母从小对两个儿子投入更多的情感关爱与物质资源，却对小女儿苏明玉不闻不问，甚至拒绝为其提供读大学的费用。苏家父母重男轻女的养育方式，不仅形塑了苏家子女不同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两代人间的家庭关系，造成家庭间深深的隔阂与漫长的和解过程。

《都挺好》里苏家的故事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热议，而在现实生活中，重男轻女的观念究竟会对家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发表于《Applied Economics》的论文“男孩偏好、子女性别与家庭父母的时间分配：来自中国的证据”（Son preference, children’s gender and parents’ tim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数据讨论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育儿偏好下，子女性别如何影响了父母在不同时间（工作时间、家务时间与休闲时间）上的分配。

一、研究背景

虽然重男轻女的家庭影响研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笔者的文章与以往相关研究的不同在于：

第一，现有与重男轻女相关的实证文献大多关注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和不同性别儿童生存率等家庭生育行为问题。笔者进一步考察了子女性别对家庭内部生活的影响后发现，男孩的出生增加了父亲在工作时间与收入上的投入及回报，并减少了母亲的工作时间。

第二，经验文献指出，子女会因其性别不同而受到短期或长期的家庭影响，例如男孩在童年时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并随后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而另一方面，子女的性别构成也影响了父母的行为，例如对家庭离婚率与储蓄率的影响。笔者综合了两方面的研究发现，当子女性别构成多为男孩时，父母双方在养育上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这意味着男孩在家庭养育上的收益更高。

第三，子女性别存在不可回避的内生性问题，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中，堕胎、溺婴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并导致婴儿性别本身就是选择下的结果，而非随机变量，直接作出因果推论会存在偏差。笔者采用了自然实验的策略，借助一项法律文件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子女性别的内生性问题。

最后，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问题上，笔者的文章关注了子女的性别构成如何影响了妇女的工作时间，从而与既往文献关注子女数量有所区别。

二、研究方法

在方法上，笔者的文章采用了家庭集体决策模型（Collective framework）作为分析框架，该模型在加里·贝克尔（Becker）1973 年提出的家庭决策模型（Unitary framework）上发展而成。与经典模型关注家庭的整体决策不同，集体决策模型强调了家庭内部不同成员在决策过程与资源分配上的差异性，尤其是不同子女性别对家庭各成员在时间资源分配上的影响。文章使用了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1 年至 2009 年 20 年间的数据，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调查自 1989 年至 2009 年开展了 8 轮追踪调查，并调查了 4400 个家庭，超过 19000 名个体样本。由于调查询问了女性的生育经历、不同类型时间分配等问题，因此可以为文章的实证提供数据支持。

处理子女性别的内生性问题上，笔者采用了一项法律文件作为工具变量。虽然重男轻女的文化规范一直存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倡导性别平等并取得很大的成绩，人口的性别比尤其趋向平衡。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孩化政策下部分家庭通过弃婴、溺婴来选择子女性别，B 型超声波检查（简称 B 超）应用普遍化，部分家庭更是用来在产前进行性别鉴定，并选择是否堕胎。因此，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婴儿性别出生比趋于不平衡。例如，有研究就发现，这一时期不正常的男孩出生率增长可以为 B 超技术使用所部分解释。当政府开始意识到性别鉴定可能会产生堕胎等社会问题，2002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文禁止了出于性别选择需要而使用 B 超技术进行性别鉴定的做法。随后，卫计委、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更是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了严格规范，出于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医生将被罚款并吊销执照。

三、研究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降低了子女性别为重男轻女文化下人为选择的可能性。通过研究实证数据，笔者发现，随着生育的男孩多于女孩，父亲花在工作与家务上的时间都增加了。而母亲会减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时间，并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这很可能表明她们在生男孩后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增强。安慰剂实验发现，在没有子女的家庭中，该法律对成年人劳动或家务时间实际没有影响。

上述结果凸显了家庭内部决策过程的重要性。当家庭更重视男孩时，父母在女儿身上投入的关爱与资源分配更少。由于成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表现往往与他们在童年时期获得的资源密切有关，女性长大后的职业成就低于男性。成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反过来影响了父母的判断，并继续花更多的时间照顾男孩而不是女孩，使得女性的终身价值进一步降低。因此，重男轻女文化影响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因素，反过来再生产出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形成一个性别不平等的循环命题。

为了缓解这种性别不平等的世代循环，笔者认为，社会政策一方面需要干预劳动力市场，维护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她们童年所受的教育，政府及各界人士还需要确保女性从童年时期就受到平等的对待，通过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女性得到健康的成长。

（研究助理余家庆亦对本文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财新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13 日文章

你知道吗？家庭地位和数学水平都影响了你的个税抵扣

作者：宋彦（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9 年初，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落地，无疑是给了中产阶层一个新年超级大礼包，在征税方面更有针对性同时也更加公平。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减税幅度不小，特别是对于已婚家庭来说，优惠政策涉及夫妻、子女关于教育、房贷、赡养、医疗等各方面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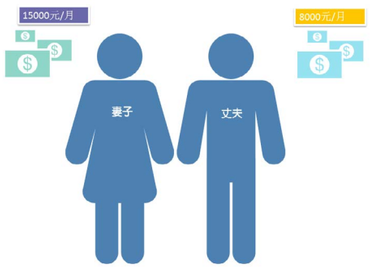
那具体来说，何为专项附加扣除？新个税法实施后，折算到月收入的个税计算方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 = 月度收入 -5000 元（起征点）- 专项扣除（三险一金等）- 专项附加扣除 -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目前首套房贷款可以提供 1，000 元的专项附加扣除，而租房，养育子女也都有相应额度的附加扣除。这些扣除项目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而申报时可以由丈夫或者妻子单独全额申报，也可以夫妻平均申报。怎样分配这些扣除额度可以享受到最大力度的减税福利呢？申报个税抵扣的决策背后有什么经济学理论呢？

个税申报有最优解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家庭里有夫妻两人，无子女，父母年龄不超过 60，有一套还贷款中的房屋可以提供每月 1，000 元的专项扣除。丈夫的工资为 8，000 元每月，妻子的工资为 15，000 元每月。



那么在以下几种选项中，哪种选项能够最大程度的享受到减税红利呢？

1. 丈夫全额申报

2. 妻子全额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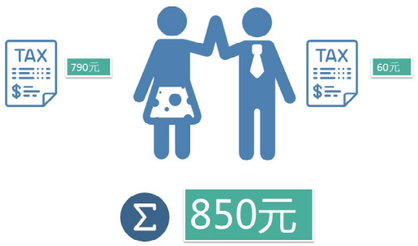
3. 夫妻平均各申报 500 元

下面我们一个个来计算下每种申报方式下所应当缴纳的税额。

丈夫全额申报

丈夫的工资为 8，000 元，如果他全额申报房贷的抵扣额度，则应纳税所得额为 =（8，000-5，000-1，000）=2，000 元。根据现行的个税税率，这部分应该纳税的税率为 3%，因此丈夫需要纳税 6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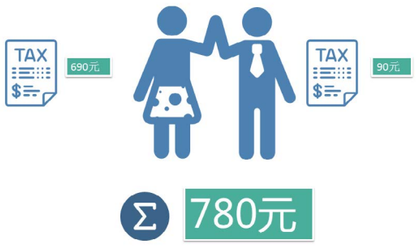
丈夫全额申报



妻子应纳税所得额为 =（15，000-5，000）=10，000 元，需要每月纳税（3，000*0.03+7000*0.10）=790 元。丈夫全额申报时家庭总纳税额为 850 元。

妻子全额申报

妻子全额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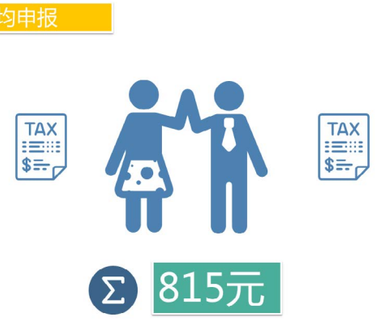


当妻子全额申报时，丈夫应纳税所得额为 =（8，000-5，000）=3，000 元，而根据现行的个税税率，这部分应该纳税的税率为 3%，因此丈夫需要纳税 90 元。

妻子应纳税所得额为 =（15，000-5，000-1，000）=9，000 元，而由于 9，000 元超过了个税规定的第一档 (3,000 元)，妻子的纳税金额由两部分税率来决定，即需要每月纳税（3，000*0.03+6000*0.10）=690 元。妻子全额申报家庭总纳税额为 780 元。

平均申报

平均申报



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当夫妻平均申报时，家庭总纳税额为 815 元。

小结

这么算下来，在上面的例子里，妻子全额申报要比丈夫全额申报和平均申报，每月各少交 70 和 35 元的税款。那么，读者们也是按照这里的最优策略来填报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去最大化减税的红利呢？下面，我们从家庭经济学的角度提供两种可能的解释。

个税申报中的家庭决策

核心家庭还是各自为政？

所谓的最优解，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来计算减税幅度。家庭经济学中一类经典的模型就是以家庭，而非家庭中的个体，为决策单位来研究家庭的消费需求。这类模型最重要的一个推测就是：收入汇总假设 (Income Pooling Hypothesis)，即只有家庭的总收入，不管收入来自于丈夫还是妻子，会影响家庭消费。

收入汇总假设描述的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的钱，都是为这个小家庭的集体消费服务的。然而，现实情况可能没这么理想。当丈夫到手工资多一点时，可能会多给自己买包烟，而妻子到手工资多一点时，可能多给自己买几件衣服。因此，夫妻间在商量谁去申报个税抵扣时，不一定是以整个家庭总纳税额最低来讨论的，而是想自己每月到手的收入能不能多一点。比如，妻子在家里地位高一些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要求把专项扣除放在自己的名下。

经济学家们当然也意识到上述模型的不足之处，并且做出了改进，提出了另一类模型来讨论家庭决策过程：合作模型。合作模型的改进之处在于，决策单位从家庭整体变成了家庭内部的每个人，因此，每个人的偏好，收入都会影响到消费决定。同时，合作模型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谈判能力 (Bargaining Power)。直观来说，当一个人的谈判能力越强时，他的偏好对最终家庭消费分配的影响力就越大。影响谈判能力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社会风俗习惯，法律规定，个人收入等。

合作模型的预测直接挑战了收入汇总假设 , 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为合作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例如利用英国和墨西哥的数据，研究人员们发现了，当政府把给儿童的福利直接发放给母亲，而不是父亲时，家庭中在食物，和儿童服饰上的开支明显增加 (Lundberg et al, 1997, Attanasio and Lechene,2002)。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家庭总收入不能完全决定家庭的消费支出，给合作模型提供了支持。

由此可见，个税专项抵扣的如何申报并不一定是由家庭最大化减税额度的决定，而有可能是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谈判过程。在这样的设定下，不管哪种申报方式都有可能是不同谈判能力下的谈判过程的最优解。

个税申报中的认知误差

另一个解释申报个税抵扣没有实现最优解的可能因素是由认知误差导致的申报失误。所谓认知误差，即由于我们在做决定时遇到了复杂的情况，无法做出最优决定。个税专项抵扣的申报过程并不复杂，但是由于个税税率并非线性，而是随着工资增加而出现梯度变化，因此计算哪种申报方式能够最大化减税并不是非常直观。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比如电商在双十一活动打折时的规则较为复杂，最终要付的价格是要计算领券，满减之后的价格，消费者并不一定能够准确计算最终的价格，从而做出最好的购物的决定。比如买一瓶洗发水，两个品质相同的品牌的促销分别是：“40 块钱一瓶，买一送一”，和 “45 块钱一瓶，买一送一”，那么显然选择第一个品牌更划算。但是如果两个品质相同的品牌的促销分别是：“40 块钱一瓶，买一送一”，和“44.5 块钱一瓶，现在六五折，消费满 100 减 20”。这显然就没那么容易比较两家的促销力度了。电商利用消费者面对复杂的规则时不能准确计算价格时使用的满减等促销模式在经济学里被称为价格混淆策略 (Chioveanu and Zhou, 2013)。

选择哪种商业医疗保险和选择个税抵扣方式也有类似之处：医疗保险的赔付方式通常也是根据医疗支付费用的梯度来保险的赔付金额。因此，如何在各式各样的商业医疗险中选择出医疗支出最低的保险也是相当困难的。例如，有研究人员发现，老年人在选择保险时会过分关注购买保险的费用而不是购买保险后对医疗支出的降低 , 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 (Abaluck and Gruber, 2011)。

总结：

此次个税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社会公众对六大专项附加扣除的认可度也很高，认为扣除范围、扣除标准超出预期。六个扣除项目同时推出，最大限度释放出减税红利，让社会更早更充分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个税申报通过手机 APP 进行，也相当的方便。由于个税专项扣除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且个税税率梯度变化，因此可能因为家庭内部分配或者认知误差等原因导致申报过程中没有选择最大化个税改革红利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 2 日文章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看看哪些行业加班多

作者：薛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何李芮（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

“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制俗称“996”。“996”工作制目前已被大规模运用于 IT 互联网企业。Github 上的“996ICU”列表显示，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已有 138 家 IT 互联网企业被曝光实行“996”工作制。这些企业中，不仅包括很多正在初创阶段的小公司，还包括了阿里、京东、拼多多等众多知名企业。日前，“996”工作制的执行已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众多讨论。

虽然媒体聚焦的“996”工作制集中于 IT 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但是其他行业是否也实行了“996”工作制却不得而知。我们利用 2017 年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中国家庭就业调查进行分析，以窥探“996”工作制在各行业的实行情况。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涉及全国 29 个省份，40011 家户的大型住户调查。我们在去除从事农业工作的被访者之后，利用 34734 个雇员数据，对全国范围的“996”现象进行分析。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定义“996”工作制为一个月工作 300 个小时（假设平均每月工作 25 天，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如果被访者平均每月工作 300 小时或以上，我们就认为该被访者从事“996”工作。

1.有多少雇员从事“996”工作?

自 1995 年 5 月 1 日以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规定职工每日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40 小时。然而，2017 年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显示全国雇员平均每月工作 217 小时，其中，每月工作超过 160 小时被访者达到 85%，而从事“996”工作的雇员更是达到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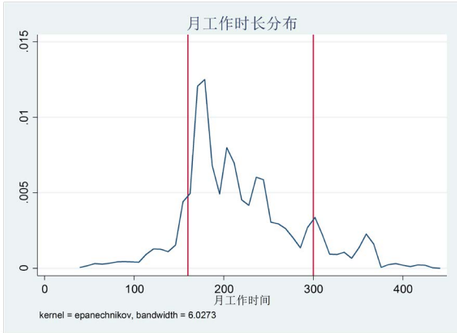


图1 雇员月平均工作时长统计

图二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996”现象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男性从事“996”工作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从事“996”工作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尤其在 45 岁之后。但女性从事“996”工作的比例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提高。这一区别有可能是由男女家庭分工不同而造成。年轻时，女性要负担更多的育儿工作，而随着孩子的长大，女性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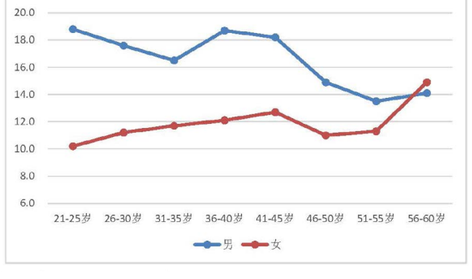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年龄段男女996工作比例

2.各种工作的“996”现象的多寡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询问了被访者工作的合同性质、工作行业与职业。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计算了各种工作的“996”比例。图三显示“996”比例与工作合同稳定性高度负相关，对于没有合同的员工，“996”比例高达 22.5%，而对于短期合同或者临时合同的员工，“996”比例也有 15.5%。分行业大类来看（见图四），“996”比例最高的是住宿与餐饮业，比例高达 31%。其他“996”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行业有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由于本调查中 IT 和互联网员工很少，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对 IT 和互联网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进行分析。分职业大类来看（见图五），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和军人是“996”的重要群体。当然，我们这里可能低估了军人“996”的比例，因为在为我们 24 小时执行任务、保卫边疆的军人是无法调查到的。在此，我们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虽然“996”工作制在 IT 和互联网企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图 3 到图 5 显示，我们还有很多从事基本生产制造和服务业的员工也在“996”。他们的生活福祉同样也值得我们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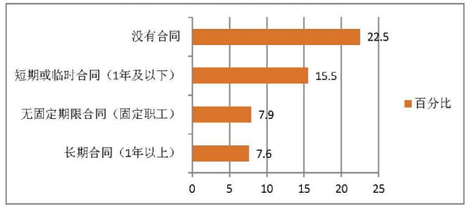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合同情况996工作制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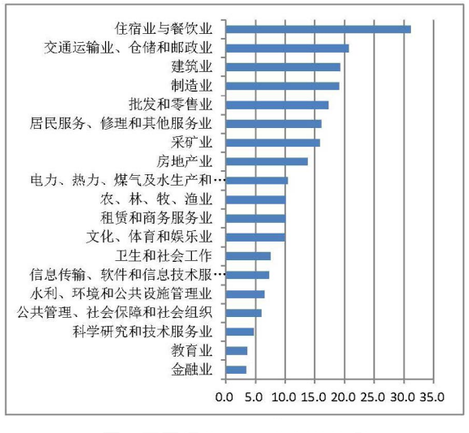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行业996工作制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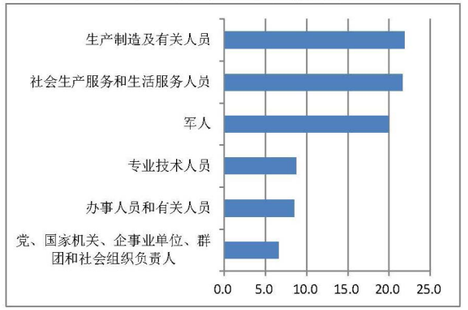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职业996工作制的比例

3.从家庭角度来看“996”

从家庭角度来看，是不是更多的家庭只有自己和配偶中的一人“996”？不不不！图 6 显示自己和配偶的工作时长高度正相关。表一显示，自己“996”，配偶也更可能“996”。也许“996”的人互相吸引，但“996”之后拿什么照顾老人和孩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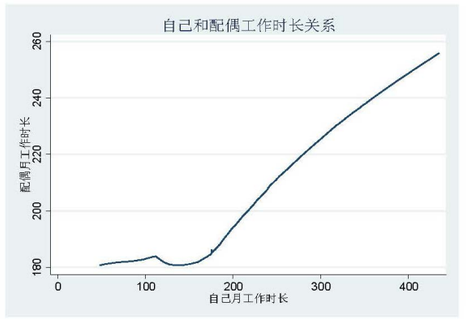


图6 自己和配偶工作时长关系

表一：配偶“996”的比例

	没孩子	有孩子
自己不“996”	9.20%	9.69%
自己“996”	39.15%	34.24%

4.“996”的影响

众所周知，工作的前几个小时往往最有干劲，但是工作越久干劲越低，越力不从心。在经济学里对应的概念是边际收益递减。也许“996”的最后几个小时仍然可以为雇主或企业创造产出，但是员工可以从其创造的财富中分得多少呢？由于“996”工作和行业、职业高度相关（见图四、图五），我们在剔除行业、职业以及工作省份造成的收入差别之后，发现“996”工作仅能使员工多挣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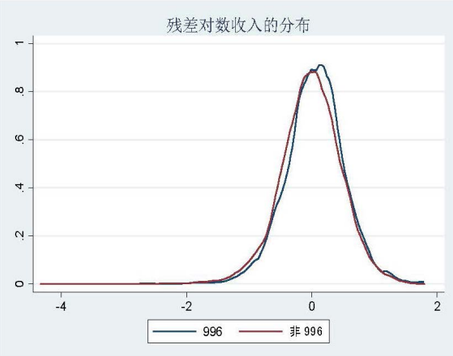


图7 996与非996工作制人员残差收入分布图

钱多挣不了多少，但身体是自己的。早在 2009 年，Paul Frijters、David Johnston 和 孟 昕（Xin Meng）教授就利用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样本发现超时工作和精神疾病显著正相关。我们用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发现，“996”员工感觉自己身体状况比同龄人好的比例少 8.6 个百分点。注意，由于大多数“996”员工正值壮年，也有着强大的意志力与忍耐力，“996”员工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的以上发现可能低估了“996”对身体的影响。身体是自己的，“996 ICU”之后，谁来照顾你？也许“996”企业给员工提供了社保，但是“996”企业是否比非“996”企业多交了一部分社保？如果没有的话，员工“996 ICU”之后，“996”企业是否加重了社保负担，并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非“996”企业身上？从经济学上来说，如果“996”企业没有把“996”的家庭、健康成本内部化，那么这些成本将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这对符合劳动法，没有实行“996”的企业是不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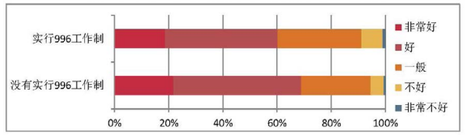


图8 996和非996工作制中不同身体状况人员的分布比例

也许情怀可以让少数人“996”，但是“996”作为文化或者规定是否应该推广却是应该深思的。也许“996”可以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是否可以弥补员工的健康成本，“996”的员工能否平衡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

周六中午 11 点完成本文。对着办公室外的阳光，向所有“996”工作的科研工作者致敬！

参考文献：

Frijters, Paul, Johnston, David 和 Xin Meng，The mental health cost of long working hours: the case of rural Chinese migrants.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 月 28 日文章

关注生育率，不如关注人口质量

人多的路口（网络图片）

作者：谷佳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伴随着人口控制计划，以及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总体出生率从 1960 年代的每个家庭 5-6 个孩子左右，降到了 2017 年的 1.6 个孩子左右（世界银行数据）。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或许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人口质量，以及人口质量的不平等问题。在这里，质量指人力资本，通常用跟受教育水平有关的指标来衡量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创造适合生育和养育的社会环境，但是从充分利用已有的人口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已经出生的小孩的教育问题。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 James Heckman 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小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应该越早越好。因此，相对于关心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小孩，我们或许更应该关心那些已经出生，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接受足够教育的小孩，使他们不被经济发展排除在外。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 月 10 日文章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互联网 + 教育如何在欠发达地区推广？

——基于英语教学应用在陕西省推广的实地调研分析

英语教育（网络图片）

作者：马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对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解决传统教学资源缺乏的新模式，因此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教育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教育信息化实现结对帮扶，通过网络课堂，联校网教等方式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分享给欠发达地区，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实现“扶贫必先扶智”的政策目标。信息化教学的主要优势包括：（1）标准化的教学内容。（2）提供针对性的学习内容。（3）信息化教学可以寓教于乐。信息化教学在欠发达地区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配套政策的缺失。（2）硬件设施的缺乏，尤其管理不善。（3）家长对于互联网 + 教育缺乏充分的了解。（4）教育信息化过度推广导致学生经济负担增加。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调整影响教育信息化产品使用的一系列制度阻碍，为学校使用信息化技术提供政策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主管部门还应当对于可能存在的过度使用问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控。限制教育信息化推广的瓶颈并不仅仅在于技术手段和硬件设施的缺乏。教育信息化实际上对于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 月 21 日文章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观点评论 - 乡村振兴专题

【经济日报】马祥：盘活资源促乡村产业发展

捧金币的手（网络图片）

作者 马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普遍的观点认为我国农业的小规模经营、涉农产业的高风险以及农民缺乏合适的抵押物是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要认识到农村产业的落后是农村金融市场欠发达的根本原因，需要从行动上挖掘和盘活乡村内部资源、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借贷是为了发展生产，产业发展产生信贷需求。没有可预期的产业发展，也就不会产生足够的信贷需求。没有足够的产业需求，不仅正规金融机构会选择撤出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也会选择撤出农村。

更重要的是，没有可预期的产业发展，连农户自身都不会选择把资金投向生产。1995 年由世界银行组织实施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调查显示，在私人间的零利率借贷中，按借款笔数计算，60.6% 的借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流动资金；2000 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农村贫困与发展”项目社会经济调查显示此比例降为 45.3%；而 2018 年的“广东千村调查”显示，按借款笔数计算，不到 10% 的从个人那里得到的借贷被用于生产性目的。

农村产业的衰落导致资本和人才单方面从农村向城市大量流出，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流出又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农村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要从行动上创造性地挖掘和整合利用乡村内部资源。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实现乡村振兴不能等靠要，不能只靠外部输血。目前我国乡村有很多资源躺在那里，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对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将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在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广东涉农金融机构将“两权”、林权等纳入抵押品范畴，盘活了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以前“死”的资本，降低了坏账风险，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人民银行清远中心支行推动成立的扶贫电商平台——清贫电商，在帮助农民有效打开市场、提高农产品售价的同时，让农户交易的流水信息通过现代电子商务和大数据手段发挥价值，成为评定农户信用和获得贷款的重要依据。

只要在思想上正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观念上认识到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行动上发挥创造性、整合利用乡村资源，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翻开一个新篇章。

本文首发于《经济日报》

为什么广东省东翼地区农地流转率低，租金高？

作者：李承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即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支持各地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三权分置”，促进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农地确权是关键。早在 2013 年广东省开始试点农地确权工作，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农地确权颁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那么，现阶段广东各地区农地流转的情况如何，地区差异是怎样的，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哪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规模微观调查。

一、广东省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农地确权和流转现状

基于暨南大学 2018 年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我们发现，广东农地流转发生率相对来说并不高（相当于浙江 2008 年的水平），受访的近 3000 个农户样本中，仅有 17% 左右的农户将自家的部分或全部耕地通过转包、转让和出租等方式转出，10% 左右的农户以各种方式转入了农地。以往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表明，相比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不仅农地流转率高（张丁和万蕾，2017；博思数据，2017），而且农地流转价格也高（申云等 2012）。然而，广东千村调查却发现有趣的现象，从省内分区域来看，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中下游的东翼地区（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农地流转价格却最高，农地流转率却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山区。广东省东翼地区的农户租出农地的均价为 1009 元 / 亩，农户租入农地的均价为 543 元 / 亩。而珠三角、西翼和山区的农户农地转出平均价格分别为 567 元／亩、953 元／亩和 165 元／亩，农户转入农地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221 元／亩、372 元／亩、247 元／亩。东翼地区农户转出农地的比率只有 36%，而珠三角、山区和西翼地区农户转出农地占比分别为 64%、62% 和 57%。

表1 广东省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农地确权和流转现状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确权土地面积（亩）	4.06	2.84	4.80	3.17
流出土地面积（亩）	2.60	1.02	2.75	1.95
转出农地占比（%）	64.04	35.92	57.29	61.51
流出土地租金（元 / 亩）	567.48	1008.74	953.22	164.50
流入土地面积（亩）	10.20	18.75	8.83	4.77
转入土地租金（元 / 亩）	221.03	543.26	372.24	246.87
农地经营面积（亩）	3.19	1.56	4.73	2.64

数据来源：广东千村调查数据（2018）

二、东翼地区农地租金相对较高而发生率相对较低的可能解释

为什么东翼地区农地租金相对较高而发生率却相对低呢？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可能的解释：

1、东翼地区农地生产率高

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农地租金与农地生产率密切相关。其他情况相似的条件下，生产率更高的农地（比如肥沃的土地）相比于贫瘠的农地，通常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通过对比广东省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等四个地区种植业单位面积产量（2000-2016 年），我们发现，东翼地区的粮食作物（417 千克 / 亩）、薯类（457 千克 / 亩）、糖蔗（5477 千克 / 亩）、蔬菜（2052 千克 / 亩）和瓜类（2009 千克 / 亩）亩产均位列四类地区之首，谷物和水果亩产位居第二，只有花生亩产位列第三。因此，从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量的角度看，广东省东翼地区农地生产率是最高的，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该农地租金价格比其它地区高。

表2 广东省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种植业单位面积产量（千克）

变量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粮食作物亩产	373	350	417	343	401
谷物亩产	394	365	413	366	437
薯类亩产	328	301	457	295	314
糖类亩产	4769	5414	5477	4556	3968
花生亩产	184	197	173	168	193
蔬菜亩产	1524	1511	2052	1311	1423
瓜类亩产	1629	1556	2009	1455	1709
水果亩产	734	747	783	815	662

数据来源：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00-2016）

2、东翼地区人地关系紧张

东翼地区农地自身的“稀缺性”可能推高了农地流转价格。长期以来，东翼地区农村人地关系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人多地少。2018 年广东千村调查结果显示，东翼地区农村户均农地面积（确权登记）仅为 2.84 亩，位于广东省内四大区域的末列（西翼地区户均 4.80 亩，珠三角户均 4.07 亩，山区户均 3.17 亩）。如果考虑到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5.9 人／户），东翼地区的人均农地面积相对更少。农地“稀缺性”本身可能造就了该地区农户存在“惜租”行为，造成了农地的低流转比例和高流转价格。

3、东翼地区农地流转市场供需结构失衡，交易成本高

东翼地区农地供需结构失衡，导致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高，可能是该地区农地流转发生率低和租金高的一个原因。从需求层面看，东翼地区流入农地的农户平均租入土地面积为 18.75 亩，远远高于广东其他三个地区（珠三角 10.20 亩，西翼 8.83 亩，山区 4.77 亩），因此该地区农户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意愿强烈、需求大。而从供给层面上看，东翼地区农村家庭户均租出土地面积仅为 1.02 亩，远远低于广东其他三个地区，由于可供流转的土地规模小，预期总租金收入不多，供给方动力不足。这一市场供需结构（很可能）意味着该地区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面临比较高的交易费用：农地在农户间自由流转的情况下，转入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必须寻找多个有租出土地意愿的农户，逐个地与他们进行谈判，签订租赁合约等，而且面对的是一群拥有较强（土地）禀赋效应“惜租”出租方，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可能导致尝试进行规模经营的农户难以实现最初设想，最终农地流转市场表现为高流转价格和低流转比率。

4、东翼地区外出务工比率低

东翼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口比例在四个地区中是最低的（18.90%）。这意味着不少该地区的农户可能采取本地兼业的工作方式，既在当地从事非农工作，同时又能够兼顾农业生产。尽管有一些研究表现，并非所有的兼业模式都会阻碍农地流转（廖洪乐，2012；）但东翼地区这一本地“非农就业 + 兼顾农业”的就业模式（离土不离乡）必然使得该地区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相对较低。事实上，兼业农户放弃农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要比外出务工的农户高很多（比如，山区的农户外出务工比例高（29.36%），农地转出率很高（62%），转出农地价格却很低（165 元／亩）），因此，外出务工比例偏低的东翼地区农地流转市场的最终表现为流转比例低，流转价格高。

表3 广东省各地区自然村人口及流动情况

指标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常住人口	694	427	1317	510	451
户籍人口	849	494	1635	615	562
流出人口	236	96	419	177	218
外出务工人口	188	116	309	147	165
流出人口比例	27.79	19.43	25.62	28.78	38.79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	22.14	23.48	18.90	23.90	29.36

资料来源：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

此外，对比农地转出和转入的价格差异还发现，东翼地区的农地转出价格远远高于转入价格。我们这一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承租对象的不同引起的。农户（承包户）既可以将农地转包给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将其出租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个人和公司。如果将农地出租给外人（或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农户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承租方可能会不遵守租赁合约，私自改变农地用途，这个风险实际上很大程度由承包方（农户）承担），必然会提高农地流转的心理价位，因此需要足够的溢价才会最终达成交易。东翼地区农户潮汕文化和观念也可能是农地转出和转入价差巨大的原因。东翼地区农户对本土潮汕文化高度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地流转呈现较强的地区封闭性特征，他们可能对于承租方的地域、方言和文化习俗等因素非常看重，农地转出给本地农户可能收取一个相对较低的租金，而农地转出给其他人或者公司则倾向于索要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三、政策启示

随着广东全省范围内农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农地流转市场必然发生新变化。确权完成后全省各地区农地流转发生率和农地流转价格是否会大幅上升，目前尚不清楚。针对广东农地流转现状，尤其是东翼地区农地流转发生率低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在保证农地自由流转的前提下，东翼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在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该地区户均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适度规模经营农户转入农地面临的交易成本高，当地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在农地流转信息发布、地块整合、转变农户观念、鼓励农户就业转型等多个方面多做工作，促进农地向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提升广东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户收入水平。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 4 日文章

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是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

电商（网络图片）

作者：王武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国承诺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宏观目标就要求将脱贫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过统筹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和合作来实现。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响应“精准扶贫”。 如何更好地开展电商扶贫？第一，建设好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让人员往来和农产品的运输过程变得更方便和快捷。第二，注重通讯网络的覆盖。不通互联网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进行电商扶贫的。第三，将数据当作一种资源，重视数据并重视对数据的处理和应用。最后，对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展开电商扶贫相关的职业培训和教育。

本文首发于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 10 日文章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全文。

观点评论 - 流动人口专题

【澎湃】张思思：中国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调查

作者：张思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从 1982 年的 657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的 2.4 亿人。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人，工作不固定，居住不固定，他们的居住是一件值得细看的大事。

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现状。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群体。调查数据涵盖全国流动人口迁入和迁出人数最多的 9 个省份 15 个城市，包括广州、东莞、深圳、郑州、洛阳、合肥、蚌埠、重庆、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武汉、成都，调查对象为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在城市中居住达到 3 个月的农业户口外来务工人员，共计 3817 户。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流动人口的住房来源中独立租赁住房占比为 41.03%、单位宿舍占比为 30.15%、自有房占比为 15.20%、与人合租住房占比为 10.11%、其他工作地点占比为 1.96%、建筑工地占比为 0.13%、其他住房来源为 1.41%，具体结果见图 1。

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赁，其中独立租赁是流动人口住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居住在单位宿舍以及与人合租。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不能负担高昂的购房费用，因此只有少数流动人口购买住房，流动人口在城市自有住房率仅为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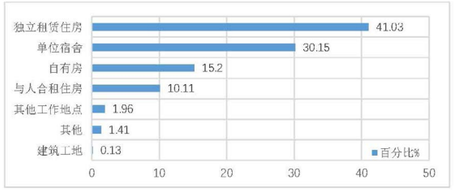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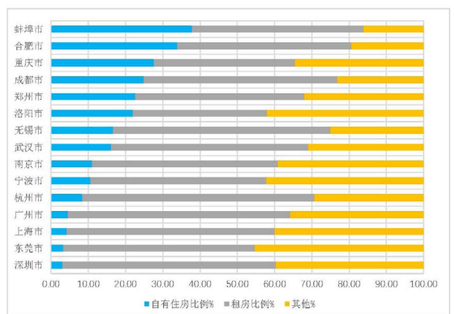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人口住房来源统计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住房自有率的不同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发现：从住房自有率来看，蚌埠市、合肥市以及重庆市住房自有率较高，分别达到 38%、34% 以及 28%；上海市、东莞市以及深圳市住房自有率较低，分别仅为 4%、3% 以及 3%；从租房比例来看，杭州市、广州市以及无锡市租房比例较高，分别达到 62%、60% 以及 58%，洛阳市、重庆市以及郑州市的租房比例较低分别为 36%、38% 以及 45%；从其他住房来源如单位宿舍、建筑工地等来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洛阳市其他住房来源比例较高，分别为 45%、42% 以及 42%，蚌埠市、合肥市以及成都市其他住房来源比例较低，分别为 16%、19% 以及 23%，具体结果见图 2。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更低，原因可能是其房价过高，流动人口购房压力大。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图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来源

流动人口老家住房

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在农村老家镇上（或县城）拥有住房比例，在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更高，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南京市分别达到 28%、21% 以及 18%，而洛阳市、蚌埠市以及成都市仅分别为 3%、3% 以及 4%，具体结果见图 3。由此，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房价，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下降，但是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使得他们在老家拥有住房的能力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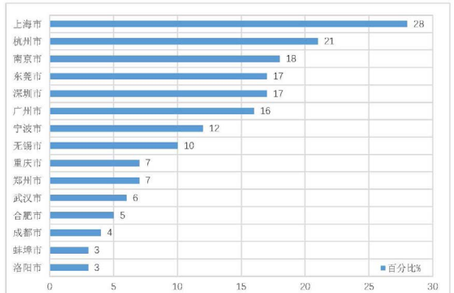


图3 分城市流动人口在老家拥有住房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租用公房比例低

从全国来看，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平均为 7.1%，租用私房比例达到 92.9%。对比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房比例，东莞市、宁波市以及重庆市租用公房比例最高，分别为 15.56%、14.47% 以及 14.29%；合肥市、广州市以及上海市租用公房比例最低，分别仅为 0.97%、1.17% 以及 1.75%，具体结果见表 1。不同城市对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准入标准不同。合肥市规定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除了需要劳动合同外，还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或住房公积金 18 个月（含）以上，同时与用人单位签署的劳务合同剩余期限需满 1 年。东莞市外来务工人申请公租房条件为在本市工作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逐月缴费累计满 5 年；在本市用人单位工作并签订 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该单位在本市为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申请人及其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未享受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人才住房及房屋修葺等优惠政策。总体来看，公租房申请的准入条件对流动人口而言过于严苛，导致他们可选的租赁来源局限于地段偏远的城市居民私房以及失地农民的自建房。

表1 分城市流动人口租用公租房比例

城市	公房	私房	总计	租用公房比例
广州市	2	169	171	1.17%
东莞市	21	114	135	15.56%
深圳市	17	143	160	10.63%
郑州市	13	139	152	8.55%
洛阳市	8	87	95	8.42%
合肥市	1	102	103	0.97%
蚌埠市	3	56	59	5.08%
重庆市	11	66	77	14.29%
上海市	3	168	171	1.75%
南京市	5	159	164	3.05%
无锡市	5	65	70	7.14%
杭州市	17	182	199	8.54%
宁波市	11	65	76	14.47%
武汉市	8	141	149	5.37%
成都市	14	162	176	7.95%
全国	139	1818	1957	7.10%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武汉的住房满意度高

对流动人口的住房满意度进行调查发现，拥有自有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 2.82%、“满意”占比 34.29%、“一般”占比为 50.79%；无自有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非常满意”占比为 1.09%、“满意”占比为 19.64%、“一般”占比为 52.47%，具体结果见图 4。其中，拥有自有房的家庭比没有自有房的家庭对住房“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高 1.73 个百分点和 14.75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拥有自有房的家庭较没有自有房的家庭住房满意度更高，也意味着提高流动人口自有房比例能够增强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以及生活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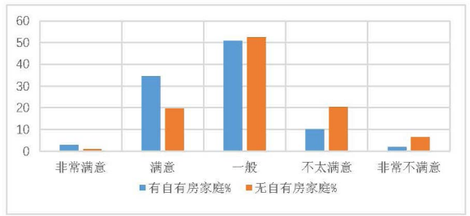


图4 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比较不同城市住房满意度发现，武汉拥有自有房以及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均最高，分别为 60.47% 和 29.02%，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9.15%，无锡市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最低为 15.00%。分析不同城市流动人口有无自有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无锡市有无住房家庭的住房满意度差别最大为 40%，其中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55%、没有自有房的住房满意度为 15%；其次为深圳市和武汉市，有无住房的满意度差别分别为 31.45% 和 30.28%；广州市和上海市的住房满意度差别较小，分别为 5.92% 和 8.11%，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蚌埠市拥有自有房的家庭住房满意度低于没有自有房的家庭，相差 1.9 个百分点，具体结果见表 2。

表2 分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满意度

住房满意度分城市	住房满意度（无房）	调查人数（无房）	住房满意度（有房）	调查人数（有房）
广州市	17.15%	274	23.08%	13
东莞市	23.37%	261	33.33%	9
深圳市	25.27%	277	55.56%	9
郑州市	15.57%	244	30.43%	69
洛阳市	17.62%	193	26.42%	53
合肥市	16.78%	149	36.49%	74
蚌埠市	21.05%	76	19.15%	47
重庆市	27.03%	148	46.43%	56
上海市	19.16%	287	27.27%	11
南京市	26.04%	288	36.11%	36
无锡市	15.00%	100	55.00%	20
杭州市	18.06%	288	40.74%	27
宁波市	17.48%	143	41.18%	17
武汉市	29.02%	224	60.47%	43
成都市	17.93%	251	38.10%	84
全国	20.44%	3203	37.98%	568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对比有自有房家庭以及无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发现，有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 29.88 平方米、中位数为 26.67 平方米；没有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16.07 平方米、中位数为 12 平方米，具体结果见图 5。从家庭住房面积分布来看，有自有房家庭中 39.11%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 ～ 30 平方米、19.29%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 ～ 20 平方米、18.75%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30 ～ 40 平方米；无自有房家庭中 36.85%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0 ～ 10 平方米、32.10%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10 ～ 20 平方米、16% 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30 ～ 40 平方米。对比发现，有自有房家庭的与无自有房家庭在人均居住面积为 0 ～ 10 平方米的差异最大，前者只占 1.07%，后者高达 36.85%。此外，有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所占比例为 79.64%，无自有房家庭所占比例仅为 31.05%。因此，有自有房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更宽敞，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拥有自有房价家庭的住房满意度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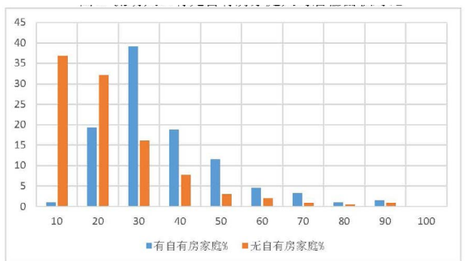


图5 流动人口有无自有房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对比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以及住房补贴情况

住房公积金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调查结果显示 85.84% 的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仅有 13.73% 的流动人口通过单位负担、自己购买、单位与自己共付以及其他方式拥有住房公积金，具体结果见图 6。因此，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覆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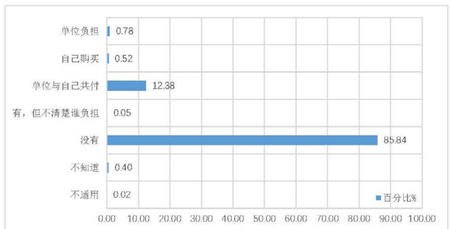


图6 流动人口住房公积金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分析单位对流动人口住宿以及补贴情况发现，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的流动人口比例为 43.23%，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34.27%，提供宿舍但不住、没有补贴的比例为 17.64%。值得注意的是，单位提供住宿补贴的比例非常低仅为 4.43%，具体结果见表 3。

表3 流动人口单位提供住宿以及补贴情况

单位提供住宿补贴	频率	比例
提供住宿并且住在宿舍	1201	43.23%
不提供住宿，但住宿费有补贴	77	2.77%
不提供住宿，也没有补贴	952	34.27%
提供住宿但不住，有补贴	46	1.66%
提供住宿但不住，无补贴	485	17.46%
其他	17	0.61%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流动人口住房负担重

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均值为 16.53%，其中深圳市、郑州市、合肥市、重庆市、上海市、杭州市、武汉市以及成都市房租收入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郑州市房租收入最高为 24.64%。对比发现东莞市房租收入比最低为 7.67%，同时联系上文发现东莞市流动人口公租房比例最高为 15.56%。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中位数为 12.92%，郑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高为 22.39%，东莞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5.77%。

全国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7，可知 33.30%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在 0 ～ 10% 之间，37.31%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 ～ 20% 之间，16.05% 的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 ～ 30% 之间，家庭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30% 以上的家庭合计占比为 13.34%。由此，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主要集中在 0 ～ 20% 之间，降低流动人口房租支出有助于有效提高其可支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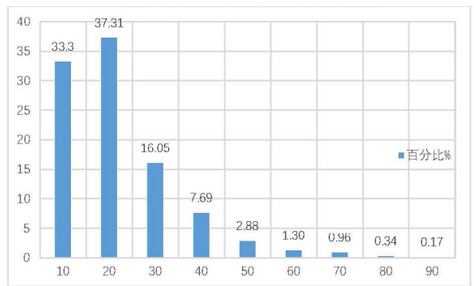


图7 流动人口房租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全国自有房月供比 的均值为 27.47%，其中东莞市、郑州市、蚌埠市、重庆市、南京市、无锡市、武汉市自有房月供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蚌埠市自有房月供比最高为 36.1%。对比发现深圳市自有房月供比最低为 8.15%，说明在深圳工作的流动人口每月偿还购房压力相对最小。全国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的中位数为 25.45%，蚌埠市流动人口自有房月供比中位数最高为 40%，深圳市流动人口房租收入比中位数最低为 8.15%。

全国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分布见图 8，可知 9.68%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在 0 ～ 10% 之间，28.11%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10% ～ 20% 之间，22.12%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20% ～ 30% 之间，18.43% 的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30% ～ 40% 之间，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在 40% 以上的家庭共有 21.66%。由此，目前流动人口家庭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还处于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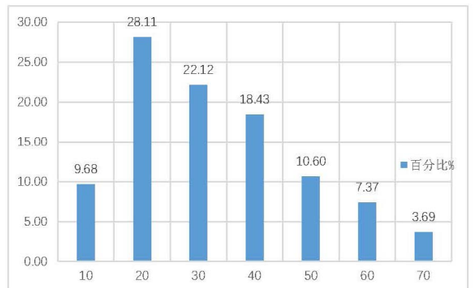


图8：流动人口月供支出占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总结与建议

总而言之，流动人口目前在城市主要住房来源为租房，自有房率低。比较不同城市流动人口自有房率发现，流动人口在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自有房率越低，随之在老家拥有住房的比例越高。比较有无自有房的流动人口满意度发现，拥有自有房的家庭具更好的住房满意度，同时人均住房面积跟宽敞。从住房公积金覆盖率来看，目前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住房公积金，同时单位提供住宿补贴比例低。从流动人口住房负担来看，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以及月供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均在较高水平，流动人口住房负担较重。

为使流动人口更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其住房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迫在眉睫。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其一是提高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以提高其支付能力，其二是进一步完善规划住房租赁市场提高流动人口住房来源，最后是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减轻农民工购房压力。

（一）提高农民工支付能力

a） 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2.86 亿农民工中 67.1% 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有 73.6% 未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因此，大部分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同时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较低的工资水平直接降低流动人口住房支付能力，使其生活水平下降。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不仅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同时能够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与培训学校合作，针对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的技能以及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进行专项培训。此外，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工作，通过免费或者缴纳少量费用的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培训，鼓励外来劳动人口不断提高其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其他方式鼓励企业对流动人口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如流动人口职业培训费用允许企业进行税收专项扣除等。

b） 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流动人口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以及社会融入度不高，使得他们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较少，市场就业信息传导不通畅直接导致其可选职业受限，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在就业网站发布就业信息，在流动人口聚集较多的街道以及居委会发布线下就业信息，定期组织面向流动人口的专项招聘会，促进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缩短流动人口搜寻工作机会的时间，提高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效率。

（二）进一步完善规范住房租赁市场

诚然，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拥有住房也是不现实的。有些流动人口工作不稳定，在城里购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进一步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丰富公共租赁住房类型，有效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建立公租房信息动态监测系统以及政策实施的监管机构也非常重要。

完善公租房保障制度的主要方式是：1、构建更加合理的货币补贴公租房租金体系，如根据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及居住成本，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住房补贴标准。2、依据不同公租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家庭情况，提供多层次公租房类型供流动人口选择，如对最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租房，对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社会化公寓以及经济住房，鼓励中等及以上收入的农民工群体购买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的自有房，同时提供一定优惠与补贴。总之，通过上述方式，政府一方面能拓展流动人口房屋租赁的来源，利用已有住房资源改善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激活民间房屋租赁市场来盘活房屋存量。借鉴发达国家解决流动人口住房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建立关于保障性住房以及租房租赁市场的强有力监督和管理机构，有助于统筹规划不同地区住房政策、有效跟进住房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保障住房政策的有效实施。

（三）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建立推进公积金制度改革，如降低公积金支付房租门槛，全面推进公积金异地购房制度。首先，针对流动人口群体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特点，建议降低提供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门槛，同时为公积金冲抵公租房租金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其次，针对流动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全国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在农民工与企业解决劳动关系后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的异地存取，减轻农民工购房压力。此外，针对农民工与企业在公积金谈判中谈判能力的不对等情况，通过提高企业违反公积金强制缴纳规定的惩罚力度，如采取停业整顿以及冻结资金等方式，促使企业及时缴纳公积金。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15 日文章

关注留守家庭，让孩子感受更多的温暖与爱

——专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授冯帅章

4 月 18-19 日，我院于四川绵竹市顺利举办第三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绵竹当地媒体《今日绵竹》特采访了活动的发起人、我院院长、教授冯帅章，他建议，我们不仅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关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培养，提高留守家庭教育质量，建立健全寄宿学校管理制度，加快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还更应强化父母的陪伴意识，让孩子感受更多的温暖与爱。

“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阶段，而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现象，正是当前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体现。由于长期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面临着比其他儿童更多的挑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表示，这次在绵竹召开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既契合了项目研究需要，也促使更多的领域专家关注绵竹，建言献策，助力绵竹解决困境儿童难题。

冯帅章说，一直以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并立足中国国情，关注本土问题，尤其是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儿童问题。作为绵竹人，他回到家乡发现，绵竹经历大地震后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加速城镇化过程中，绵竹也与其他地区一样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留守儿童、困境学生难题。此次论坛中，绵竹教育部门探索出的“政府主导、教育作为、学校行动、家长觉醒和社会跟进”的绵竹困境学生解决方案，成了论坛的一大亮点。

2016 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市教育局合作开展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对绵竹 6000 余名城乡儿童进行了两年的跟踪调研并取得初步成果。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着明显差异，尤其是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身心发展上存在劣势。

“要全面解决困境学生、留守儿童难题，绵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绵竹人，也促使我们未来要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调查和研究力量。”冯帅章表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带来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目前留守儿童研究还局限于身体、心理等表面现象。下一步，项目组还将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到医学领域，与行为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科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引进更多团队来绵竹合作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创新和研究成果。他建议，绵竹在以后的探索中，不仅要重视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关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培养，提高留守家庭教育质量，建立健全寄宿学校管理制度，加快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还更应强化父母的陪伴意识，让孩子感受更多的温暖与爱。

本文首发于《今日绵竹》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 月 25 日文章

观点评论 - 其他热点专题

【澎湃】严子中：网红经济的门道

网红直播（网络图片）

作者：严子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某网络娱乐直播平台的当红流量主播，有着姣好的外貌和甜美的声音，所在的平台显示每晚都有十多万的粉丝在线互动观看她的直播。随着满屏飞动的粉丝弹幕和乱花迷眼的虚拟礼物，她总会不失时机地向粉丝们播报：“如果觉得专柜的名牌鞋包和手表太贵，请加屏幕右下方的微信看看和购买。”

网络红人，简称网红，其实就是借助网络社交平台，通过自己鲜明而独特的性格和人格，获得大量的关注度和粉丝群体的人。伴随着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网络文化的丰富，网红的出现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正如 20 世纪美国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预言：“在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可能在 15 分钟内出名。”

网红经济的基本构成

相比传统的明星，成为网红的成本会低不少，借助网络直播、微博、短视频等方式，大量的草根通过短时间内获得极高的网络热度，得以迅速成名。

但是，成为网红并拥有庞大的粉丝往往只是第一步，网红们还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淘宝或者微商店铺对粉丝进行产品的营销，将个人的网红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变现，而这样的经济行为称之为网红经济。

近年来，网红经济的规模呈爆发式增长。艾瑞与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 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2018 年粉丝规模在 10 万人以上的网红数量较前一年增长 51%，截至 2018 年 4 月，粉丝数量同比增长 25%，达到 5.88 亿人。国内某知名直播平台网络红人大可（化名）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平台网络主播的数量已经从 2015 年他刚加入时的 10 万增长到 30 万。而整个行业，无论是粉丝、主播还是平台的数量几年来都翻了几番。

广州也成了中国的第一“网红城市”，数据显示每五个网红里面就有一个位于广州。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的大数据报告，在 2016 年时，网红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580 亿元人民币，而那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也就刚过 450 亿元。同时，网红通过电商交易变现、广告和直播收益的数据也十分抢眼，根据《2018 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2018 年网红在各领域收入占比中，广告收入占比为 19.6%，电商占比为 19.3%，直播分成收入占比为 17.2%，三类收入方式的占比超过了行业收入占比的一半。

网红经济的眼球经济学和高转换效应

网红的成名过程是一个传统的眼球经济学原理的外延，是在互联网上通过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经济活动。换言之，如何能维持、甚至增长公众的注意力和网络流量就是网红们的生命线。网红的本质是个人的 IP 的体现，比如网络主播们都会有自己的特长领域，比如音乐、脱口秀、电子竞技、美妆。

拥有超过 160 万粉丝数的国内某知名直播平台网络红人大可（化名）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他在 2015 年网络直播兴起时加入网络直播行业，如今仅仅他所在的平台网络主播的数量就已经从四年前的 10 万增长到 30 万；每一天，都会有上百名新主播加入；而整个行业，无论是粉丝、主播还是平台的数量几年来都翻了几番。

网红和传统的明星不一样，他们的才艺有一个固定的、细化的、和有自己共同语言的关注群体。粉丝关注网红，也是因为网红能够给他们带来共鸣。其内容的价值，其表演或演讲能给他们带来消费观、价值观的认同。长期活跃在互联网的网红，普遍会比传统明星更懂得如何与粉丝互动和相处，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的粉丝需求，成功的网红，往往都是非常懂得社交和粉丝运营的。

另外，在流量变现能力上网红会比传统明星更加精确市场化需要，加之网红构建的场景互动能力会拉近与粉丝的关系，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这就为以后的商业运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间接地提高了流量变现的效率。作为流量与运营的高手，当粉丝量累积到一定量之后，网红的商业模式就逐渐成型了。

网红以红人的品味和眼光为主导，进行选款和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和推广，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正如，同样一件衣服，可能放在天猫上销量很一般，但是如果被如 Papi 酱这样的大网红推荐过，其销量就会立马大增。像这样，就促成了从网红 IP 到变现的高转换效应。数据显示，网络主播的收入中，四成是来自广告和电商的营销。

网红的高转换效应何以实现？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中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角度来分析。微博的大数据统计显示，网红相比粉丝，在多个社会经济特征指标如受教育程度、收入、所在地域、年龄、职业训练都有着显著的优势。首先，网红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78% 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其中的 15% 有硕士和博士以上学历。其次，六成左右的网红年龄大于 29 岁，而受众的粉丝五成以上都是 90 后，网红年龄的增长体现出网红不再是年轻人才能接触到的名词，而是正在被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认知。

另外，从地域角度观察，四成的网红仍主要集中在我国一线城市，而隔着屏幕另一边的粉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的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和地区。因此，网红们相比粉丝拥有更具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不仅推动了直播内容制作水平的上升，使得在和粉丝的“信息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也由此更容易取得粉丝的追逐和崇拜。

网红的高转换效应还与其自身定位和营销方式有直接关系。首先，由于网红大多专注于某个领域深度挖掘用户，并非文体德艺处处开花，因此在吸引粉丝时有利于其提升粉丝的纯净度和忠诚度，这为精准满足粉丝需求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网红脱胎于互联网之中，为了生命力的延续从诞生的开始就在关注用户需要，体现出平民化的特征，产品营销往往定位合理，进一步强化了用户粘性。

最后，与明星代言等传统营销方式不同，网红营销往往采取“走心”分享或创意文案等方式，既为营销产品设计了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广告模式，又通过新颖的方式创造了用户需要。

网红“保质期”

虽然安迪·沃霍尔说过“每个人都可能在 15 分钟内出名”，但是他还预言：“每个人都只能出名 15 分钟”。随着网红经济的爆发，行业正在迎来更多的跟风者和资本，老网红们面临着来自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新网红们的竞争和挑战，面对的是稍纵即逝的网络热度和网红短暂的“保质期”。

网红主播大可表示，虽然主播多了不少，但是网络热度几乎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出名的大主播身上，大部分普通主播所获得的热度与大主播们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普通主播能做一天是一天，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这在电商网红领域也是如此。就像格里高利·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解释的“超级明星现象”一样，眼球经济的背后，是只有极少数高人气的网红能分得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大部分的普通网红都挣扎在如何守住自己仅有的一点热度，或者只能以此作为自己的一个副业和兼职。

因此，网红经济的模式注定是重运营而轻质量的。为了把握住随时会失去的网络热度，就会想尽办法“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由于缺少约束，不但很多网红自身的“保质期”短暂，连他们的电商产品“保质期”也很短暂。根据 AC 尼尔森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常规的女装电商退货率通常在 10%-15% 左右，而网红电商的退货率达 20% 以上，在促销季的退货率甚至高达 50% 以上。

关于这点，网红主播大可在采访时谈到：“对于大部分并不怎么红的网红来说，他们能挣一天是一天，自然就不可能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进行把关，滚动推送假货的广告，有的还以代购名义卖假货，严重的还有通过网络骗粉丝的钱物，或通过网络直播进行传销和线下性交易等犯罪的行为。”

网红“保质期”短暂、IP 急于变现所不断衍生出的违法犯罪问题也不容小觑。近些年，关于网红推广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红推送诈骗广告、传销、诈骗粉丝财物等的相关案例报道已屡见报端，并在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于受骗粉丝，通过网红推荐的电商联系方式所产生的交易，也属于私下行为，从而通常遇到投诉无果、维权难等问题。网红们即使被社交平台关停账号，很容易换个身份，摇身一变，另起炉灶。

“一些大网红通常会建立一条专业的电商产品产业链，自然也会越做越好、越做越久。”从业四年的网红主播大可表示，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出台来进行规范，对网络社交平台的健康发展也能推动。

当网红经济与传统经济“交锋”时，它的经济效率、稳定和增长都离不开政府及时的相关经济政策，对网红经济与个体的进行制度上有效规范。商务部于 2018 年 9 月颁发了《社交电商经营规范》，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对社交电商及网红经济作出了有力的法律约束。规定和引导网络直播需全程留记录，对网红电商和产品严格审查，对制假售假行为严厉惩处。同时，社交平台作为主体应承担责任，从而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网红经济若要健康发展，还需依靠网红自身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网红自身应在互联网中时刻注重主流价值观的引导，用法律和道德时刻约束自身行为，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同时，将传播正能量作为己任。而粉丝作为消费者，在政府和媒体的关于网红经济和电商的普法宣传下，伴随着自我维权和法律意识的觉醒，对网红经济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也会产生促进和推动。

（研究助理张亚楠、张玉美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6 日文章

【财新网】贸易战升级：中国产能会转移到东南亚吗

作者：殷立娟（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虽然迁移潮早已开始，但东南亚还没准备好，短期难以取代中国。如果将在中国的产能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巨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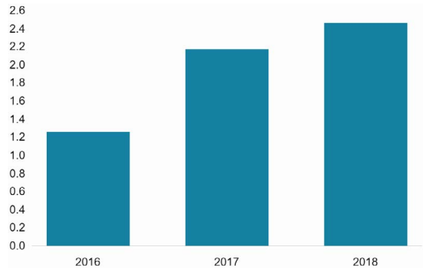
从去年 1 月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开始，到今年 5 月 10 日美国提升对中国 2000 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水平，特朗普一共挑起了七轮关税冲突。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外资企业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将面临巨额关税。在中国设厂的制造商是否会寻求将生产线转移到不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国家，比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临近的东南亚国家？

迁移潮早已开始

随着近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出台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国内许多工厂早已面对人工、成本上涨的问题。贸易战成为了一个触发点，促使它们尽早把生产线迁移，而中国亦有意把经济向高科技生产、服务及消费方向转移。

以越南为例，早在去年 9 月美国实施第一轮制裁之前，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就已在越南布局，目的就是利用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和有利的商业环境。对越南投资的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工资水平持续上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2019 年前四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已达到 2018 年全年投资额的 65%。

尽管行业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美国对中国商品日益严苛的关税制裁在进一步推动对越南的投资。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额（单位：十亿美元）

东南亚准备好了吗？

美中已互相加征了新一轮关税，进一步提高了在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成本。但事实上，如果将在中国的产能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企业将不得不面对东南亚国家的现状所带来的巨大障碍。

第一，东南亚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过去十年一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已经将部分工厂搬迁到东南亚国家，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却不尽如人意。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公路网铺设不足、铁路班次有限和港口拥挤的问题，这些落后的物流设施拉长了交货时间，进而推高了运输成本。

以越南为例，贸易的日益增长让越南的基础设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作为东南亚至美国海上贸易路线的最后一个装货港，在 2008 年至 2017 年期间，越南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从 440 万标准箱大幅增至 1230 万标准箱，但由于缺少深水港口设施，通常需要中小型货柜船在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等国家转货，再到达越南港口，之后再横跨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这就意味着越南出口商常常需要竞争稀缺的舱位。

物流堵塞导致交货周期延长，海上库存在逐步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寻求转移生产到东南亚等国，东南亚的物流设施预计很快会到达瓶颈。相反，中国拥有成熟有效的物流渠道和物流设施，紧密高效地把工厂、

供应商和全球客户联系在了一起。据世界银行 2017 年基建质素评级，泰国及越南分别排行 41 与 47，中国排行 20。因此，中国的制造业短期难以被取代。

第二，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效率和规模有限。

纵观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市场规模无法被取代。2017 年中国总人口为 13.8 亿，GDP 为 12.25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8827 美元。东南亚 10 国总人口为 6.01 亿，GDP 为 2.78 万亿美元，人均 GDP 为 4625 美元。东南亚固然有新加坡、文莱这样的发达国家，但都是小国，市场规模有限，而印尼、缅甸、越南等大国都是低收入国家。至少在目前，把东南亚和中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东南亚的 4 倍有余。

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在中国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投资生产，然而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已经给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压力。再以越南为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熟练技工的短缺，因为现有的公司已经把越南本土的技术熟练工人挑走了，这导致越南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长期来看，越南年轻劳动力的数量也远比不上中国。2018 年越南工业就业人口刚超过 1450 万人。相比之下，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仅广东省就有 1271 万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58%。同时，广东持续大量地吸收了流动人口。越南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甚至很难成为下一个广东。

第三，东南亚国家缺乏中国的规模经济。

中国经济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多样化和规模化。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般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大生产区域的集聚效应。所谓“集聚效应”即经济学中所说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使得市场扩大，也更加多样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大经济体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方面的边际成本相比于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更低，所以人口密集的大经济体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更低。规模经济的优势是东南亚各国目前无法媲美的。比如阿里巴巴这样的在线搜索引擎，绝大多数都是由中国供应商主导的，在阿里巴巴（Alibaba）上搜索“塑料袋”供应商，搜索结果显示潜在越南制造商仅为 485 家，而在中国搜索出的供应商高达 3850 家。

“越南制造”“印尼制造”的标签一定可以躲避美国关税吗？

对于为了躲避关税而将全部或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公司而言，美国一样有可能对这些国家采取制裁行动。事实上，东南亚国家被制裁的风险确实在增加。一些跨国公司采取“中国 +1”的方式——公司在中国保持生产，同时也在亚洲其他一个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生产运营。美国政府意识到，将生产运营向海外转移是中国企业规避制裁的一种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发表推文称，“许多被征税的公司将离开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因此中国才如此急于达成协议。”在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越南制造”这样的标签可能不足以让制造商躲避美国关税。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面临惩罚性关税，企业还可以找到方法减轻它对自身利润和消费者的伤害。但如果美国同时提高对世界很多地区的关税，那么企业策略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我们的研究（Global value chain and destructive creation）预计，低技术含量及低价值生产公司会更快迁移，但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例如资讯科技、交通运输等，短期内限于东南亚国家的设施和技术水平不足，则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因此中国核心的制造业模式不会被完全取代。比如中国精通的汽车制造业，其他国家难以完全取代中国，更多的是寻找“中国 +1”、“中国 +2”、“中国 +3”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只是把生产线多元化，而非完全放弃把生产核心放在中国。

同时，为了保持中国制造业核心优势，最重要的是加强市场主导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生产要素的流动。市场仍然是配置生产要素最有效率的手段，目前中国虽然在商品流通方面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但是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市场化流通仍然阻碍重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仍然面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仍旧无法成为农民的资产，从而实现自由流通，同时国家金融体系管控下的金融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其次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培养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 提高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本文首发于财新网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 月 14 日文章

【羊城派】“水果自由”背后的关注点不应只是简单的供需关系

网络图片

作者：张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水果太贵”、“吃不起水果”、“水果自由”成为了近日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 网友们纷纷抱怨水果价格走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吃到便宜的水果了。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3 月，鲜果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月分别上涨了 5.9%、4.8%、7.7%，4 月份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11.9%。众多媒体纷纷开始报道分析水果涨价的原因，天气原因导致减产与消费升级成为了此轮涨价的主因。以苹果为例，去年的极端天气导致了产量低，能满足在零售终端销售的商品果稀缺，加之新一季的苹果还没有上市，使得供给小于需求，因此推高了苹果的价格。极端天气导致供需关系的不平衡只是短期水果价格急升的主因之一，然而水果产业当中常年累积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得到解决，想要水果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依然面临挑战。

目前来看，整个水果产业链没有很大的变动，仍是从产地到一级、二级批发市场，再流向零售终端，最后到了消费者的肚子里。虽然此轮涨价的主因是供需关系，但其他原因也助推了水果价格的升高，如种植成本升高、中间商压价收购囤货再高价出售、非规模化种植、冷链运输成本高等。以上原因很大程度上都跟信息不对称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信息不对称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在 1970 年提出的，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买卖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大的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生产销售过程中，多个环节信息不对称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整个水果生产销售的过程中，包含了多个角色，除了生产端的果农与购买水果的消费者外，还包括了多级中间商、零售终端。整个生产销售过程按照角色划分为：果农 - 多级中间商 - 零售终端 - 消费者。果农与所有角色都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这些信息不对称长期来看依然影响水果定价。

1. 果农与中间商的信息不对称

果农经常说：“果子种的再好，也不如卖的好”。一到收果的季节，果农忙于收果，果农之间的信息沟通极少，既不了解周边其他果农的产量，也不了解出售时的市场价格。然而在水果产地收购水果的中间商往往进行过信息的“勾兑”，对收购价格的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在收购过程当中，果农在没有销售渠道的情况下，承担高额的存储费用以及水果腐烂的风险。水果入冷库存储势必增加成本，果农要保证自己的收益、提高销量的同时只能让果品快速出售变现，因此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将刚成熟的水果出售给中间商，在出售过程中他们普遍面临被具有信息优势的中间商联合起来压价收果的困境。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水果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卖到零售终端，消费者购买水果时遭遇的高价，并没有让果农受益。

2. 果农与零售终端信息不对称

近年来，零售终端对于商品果的“卖相”要求越来越高。从包装、大小、外观、口感都是有要求的，这是零售终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优品优价，大型零售终端很少会去非规模化种植的地区进行采购。因此，倒逼水果产业对于种植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部分果农与零售终端的信息不对称，依然进行“小农经济”的非规模化种植。部分大型的零售终端（如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去水果产地直接采购时，对于无法达到“商品果”要求的水果不予收购。部分果农想要进入市场只有改良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如引进优质品种培育、大棚种植或者提高种植标准达到绿色食品等），但前期的成本过高，许多果农没有抵押物，银行也担心偿还风险，无法提供有效的贷款资金支持。部分果农因此只能自担提升果品质量的全部花销，种植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如天气，虫害等不可抗因素）。非“商品果”没销路，“商品果”种植成本高也会导致水果售价走高。

3. 果农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

由于水果的食用性质，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当面选果，商家五花八门，价格高低均有。以苹果为例，光产地就包括山东、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苹果的品种也分红富士、冰糖心、青苹果等多个品种，从产地、品种到价格都参差不齐。这时候，果农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购买时往往对品种之间的差异不够了解，果农也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也不了解。结果就是，一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种供不应求价格升高，二是消费者熟悉的品种供大于求价格跳水。当然，部分消费者消费方式变化选择网购，然而网上销售消费者看不到水果实物，使得果农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好果卖不上好价，次果以次充好也时有发生。同时，大部分果农对于网上直接销售的经验十分有限，虽然近年线上水果销售额增长很快，但是线上水果销售的特殊性使得其依旧不能变成果农大量销售的主要渠道，不能线下零售终端形成有效竞争。

此外，国内类似的水果品种种植并不集中在一个省份，果农仍然处于千家万户分散种植与经营的状态，对于相关的农业生产信息的获取不及时，许多果农对于全国类似果品的种植面积、产量都缺乏认识，果农滞销减种、畅销跟种的现象依然存在，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因素，果农的收益无法保障。 部分果农当前的处境十分尴尬，销售渠道没打通，冷链存储运输成本高，想扩大生产提高种植技术没有资金，抗灾防害的能力也不强。面临以上诸多“风险”，果农只能想着旱涝保收，快速的将手中果品出售。种植水果一旦没有利润空间，果农的种植积极性受挫。

当前果农如何化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果农也采取各种措施化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首先，部分果农开始引进优良品种，提高种植技术，严格控制水果产出的质量，部分果农采用大棚种植技术，提高了水果的口感，错开了果品上市的高峰期，同时提高了抗灾防害的能力。其次，农村积极成立农村合作社，将水果种植往统一化、精细化种植的方向发展。然而所有化解“风险”的举措，都会提高优良果品的成本，而这种高投入势必都反映在水果销售的价格上。同时，部分年轻果农则选择放弃种植，跳出种植业外出打工，因此果农也呈现中龄化、老龄化的趋势，而这种情况直接引发部分地区优质品种的水果种植面积缩减，水果种植无法形成规模，水果种植技术无人接棒的难题。

销售、物流、规模化种植管理，信息披露还需配套

想要水果价格长期保持在合理区间，除了应对好极端天气以外，政府应当着重解决水果产业链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做既保护果农的种植积极性与利益，又满足消费者优品优价的需求。

1. 鼓励并支持果农进行精细化、规模化种植管理

分散式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消费者对于水果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果农也必须进行转型升级。政府需要帮助果农进行种植技术的升级，提供配套的技术支持。与此同时，还要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途径，解决农民搞规模种植资金不足的问题。例如，政府可以利用各部门的数据来对农民的信用进行评估，对于确实有需要扩大生产的果农予以贷款审批。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果品质量，又有利于提高果品产量，果品也符合零售终端对于“商品果”的要求。果农与零售终端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的调节下得以缓解。

2. 鼓励果农拓展销售渠道，建立农业合作社，建设配套冷链物流。

搭建合作社平台进行销售比个体销售更加容易。因此，政府要为果农创造更多的销售渠道，加大对水果产地的宣传，对于新兴的销售模式，政府可以提供培训与引导，发挥政府职能在水果产地引入物流企业，大力发展农作物的配套运输。水果的存贮成本被降低，果农便不急于出售，且获取更多市场信息，以解决与中间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冷链物流发展到位才可能为网上销售提供保障，减少中间商环节，使得水果出售价格透明化，且保持相对低位。

3. 推进水果产业信息化建设，及时公布市场信息。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是近年来多次被提到的问题，在“互联网 +”时代，农业信息的监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行度低，政府需要一定投入，收集与监测相关农业数据，保证相关农业信息可以高效畅通和真实地披露。解决果农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水果市场相关的信息进行披露。消费者对于水果的信息需求主要是产地、种植方式、成熟季节；果农对于水果信息需求主要是相关水果品种的面积、产量、果农之间的出售价格。政府采集这些数据及时披露，会对消费者与果农在购买决策与种植决策上起到引导作用，因而大大缓解水果价格的波动。

什么是真正的“水果自由”？消费者享受到优质优价的水果，果农的收益也提高的双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自由”。要达到“水果自由”这个目标，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只有简单的市场供需关系，更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合理的干预，解决相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旗下 APP“羊城派”以及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 月 29 日文章

媒体聚焦

【经济日报】乡村振兴期待金融活水

——广东农村金融市场状况调查

潮汕地区农村

阅读提示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农村金融市场的良好运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近日，记者就广东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等问题进行了调研。

现状：金融市场欠发达

——资金供给不足 信贷需求不旺

“我想在村里建个酿酒厂，酿造果酒和米酒，村民们喜欢家乡风味，销售有一定的市场。我还想把村里闲置的房子装修一下，搞成民宿。但做这些事都需要钱，在农村筹钱太难。”张伟雄说这话时很无奈，“我没有什么物品能满足银行的抵押条件，听说宅基地、承包地流转权可以抵押，希望我们这里也能早点推进。”

张伟雄是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六古村村民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前几年在珠三角打工，有了一些积蓄，是镇上“能人创业，回乡发展”的一个代表，但仅靠自己的积蓄远远不够。

“那有没有可能向民间金融机构借款呢？”记者问道。“我们这里多年来，已基本没有民间金融组织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生意，农民觉得利息高、不敢贷。一般的小额资金需求，就向亲戚朋友借钱。”张伟雄解释说。

57 岁的张锦文是六古村增脚自然村的贫困户。目前，他家已经享受到了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每年有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分红、小水电扶贫项目分红等收入，已接近脱贫。“但是，这类贫困户要巩固脱贫成果，增加‘造血’能力，还要想别的办法。”该村党支部驻村第一书记尹卫政说。

“我现在也想扩大养鸡规模，但资金不足，向银行借钱，担心发展不起来还不上，并且还要支付利息。”张锦文告诉记者，他现在买鸡苗、饲料，都还是先赊着经销点的钱。

“芋头是我们村的优势产品，这里是沙土地，加上山涧的水资源充足，山区昼夜温差大，使得长出的芋头格外的香甜。这两年价格也不错，去年我在网上卖了 1000 多斤芋头，每斤 3.6 元，比种水稻挣钱多了。”黎埠镇扶村塘冲自然村农民陈贵祥说。

“之前我也想去银行借钱扩大生产，但不知道该怎么借。听乡亲说贷款要担保、抵押之类的手续，比较麻烦，村里很少有人能从银行借到款。”陈贵祥告诉记者。

今年 1 月 10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布的《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广东农村正规金融发生率很低。该报告调查的 2977 户农户样本中，在 2017 年仅有 91 户尝试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仅占有效样本的 3.06%；最近 5 年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只有 83 户，占有效样本的 2.79%。

“广东千村调查”农村金融专题负责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博士说，抵押物是一种有效的借贷履约保障，但是在农村地区，农民往往缺乏合适的抵押物，加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法治观念滞后，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运转不顺畅，供给和需求无法达到均衡。

而“广东千村调查”报告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农户未尝试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除了觉得贷款手续麻烦等原因，很大一部分农户没有表现出对大额借款的需求。“事实上，农村经济活动不活跃、市场不发达，也是农村金融‘欠发达’的另一种原因。”马祥称。

“这里老百姓一般需要借的钱也不多，除了家里建房或娶媳妇，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上学等，没有很多人需要贷款。”张伟雄告诉记者，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培育需求，都是双向互动促进的，现在农村金融市场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在记者与清远邮储银行、农商行等部门负责同志的座谈中，他们都表达了相同观点。“由于缺乏合格的贷款主体，我们就是有钱也贷不出去。”邮储银行清远分行副行长刘帅称，同时，因为获取客户信息的成本太高，也没有有效地收集到农户的需求信息。

原因：乡村发展欠活力

——银行放贷少动力 产业发展乏支撑

“水往低处流，钱往高处走。”人民银行清远市中心支行行长陈元富告诉记者，不得不承认，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没有同步，这种失衡，造成天性趋利的资金大量涌向城市。

“与城市发展相比，农村发展活力不足，对利润的追求使得银行必然将资金从农村通过其上级银行到城市放贷；而涉农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涉农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前些年在农村吸纳的资金也大部分流出农村经济循环体系。”马祥分析说。

根据本报记者近年参与完成的《广东县域金融生态报告》显示：多年来，商业银行在农村只想着吸收存款，而不是放贷，导致县域资金外溢现象比较严重。

调研发现，以县域为主的农村金融市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工行、建行等几大银行都有支行，且有贷款审批权限。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对金融的需求激增，对农村（县域）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就连留守坚持的农行，在县域支行的贷款审批权限也被上收。

资料显示，2000 年前后的国有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的网点在收缩。广东各县（市），除农行外，工行、建行和中行等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从县域撤离了网点或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限，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开始大量缺位。以阳山县为例，据统计，2018 年底该县金融机构网点共有 40 个，其中：农发行 1 个、中行 1 个、农行 5 个、工行 2 个、建行 2 个、邮政储蓄银行 8 个、农商行 21 个，比上世纪 90 年代金融机构最多的时候减少 67 个。

当然，并不是所有资金都被抽走，以农行、农村信用社等为主力军的农村金融机构仍开展着大量的信贷工作。但是，因为农村信贷风险大，导致这些农村金融机构也会有一定的畏贷情绪，放贷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上一轮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关停或转型；而城市工业的勃然兴起，城市化发展加速，以青年劳力为主的农民工大军形成，造成广东农村的空心化、空壳化。随着生产经营的单一化，农村没有了金融发展的产业户比支撑，需求也随之减少，仅存一些零星的需求。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几年农村经济存在空心化的趋势，农村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减少，农村基层客户加速流失。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效益也增长不高，这些都导致了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位于粤西北山区，位置偏远、经济落后，可以说是广东省典型的农村乡镇。在这里，人口呈净流出状态，当地农民以到珠三角城市打工为主。

谈到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市场不够发达等制约因素时，黎埠镇扶村第一书记李志平说，“我们这里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就是大家常说的‘993861部队’。现在说是要发展一二三产业，像现在村里这种境况，一半的人都在外务工，又有谁来发展产业？从这个方面讲，农村农户贷款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同时，广大农村，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商品经济有待提高。“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从农户借贷资金的用途可以看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与工业生产发展的不足。农户从其他个人那里获得的借款主要用于盖房、娶媳妇，或医疗、上学等应急目的；仅有不到一成的借款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做小生意、投资办企业等。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官铭超认为，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相对较低，涉农产业抗风险能力弱，信贷风险较大。同时，农村小微企业及农户产业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技术手段不足，且受资信状况、抵押物缺失等因素制约，其贷款风险溢价较高，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成本较大。另外，农业贷款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从而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比较谨慎。

相关法律不健全，再加上农村市场对客户的管理、调查成本等居高不下，一个小客户的调查往往就需要两名信贷人员跑很远的路、花一天时间……客户分散且少量，获客成本无法与城市大客户比。阳山农商行、邮储银行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制约农村信贷投放的重要原因。

农村经济的“欠发达”、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金融机构萎缩与资金流失，其流失又加剧了农村经济的欠发达。

出路：优化金融生态

——唤醒“沉睡资本” 解决“畏贷情绪”

初夏的山塘尚未蓄满水，陈年的莲藕枯叶还没发出新芽，但紧邻着的一片农家乐餐厅里，生意已十分火爆。

“这是我们村社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整合了全社80 多户农户的责任田进行连片利用，一到节假日生意就特别好。”阳山县阳城镇五爱村白石脚自然村村民组长黄世情说。

黄世情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劳动力不多，不少田地都荒芜了。现在，全村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通过招商引资找到了华侨城的一个项目，在这边搞旅游开发，村里先期建设了东方红旅游集聚地，作为旅游配套，可以吃饭休息。而就在不远处，正在建设一个手袋加工厂。

“这个项目是我们行乡村振兴贷款支持的，由于村上没有资产抵押，我们运用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推出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流转易’，为当地农业企业和农户创业增收增加了一条确切可行的融资渠道。”阳山农商行行长许友华说。

阳山县大崀镇松林村的伍红花几年前从外地打工回家，开起了网店，准备专卖糖心番薯干、冰桶鸡等特色农产品。一开始，她购买番薯原材料就用尽了积蓄，再没有加工番薯的钱了。此时，在村里挂职的团干部向她推荐了“青春贷”青年创业贷款产品，伍红花顺利拿到了 8 万元贷款，购买了相关烘干设备，又直接从农户家里收购原料，目前店里的月利润达到 8000 元，也带动了不少贫困户一起致富。

记者了解到，伍红花获得的贷款是由阳山农商行和阳山县团委共同推出的“青春贷”，不需要抵押和担保，由阳山县青年创业小额担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贷款“兜底”。有了这笔风险基金，银行的信贷资金放大 10 倍，可授信 400 万元，专门向从事电商等行业的农村青年提供信贷支持，解决农村电商创业扶贫融资难题。

而与伍红花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创业大学生张皓昇。

“是农行‘红茶贷’给了我新希望，我才能有这片茶园。”看着眼前大片充满生机的茶园，广东省清远英德市的创业大学生张皓昇高兴地跟记者说。张皓昇说，农行英德支行的“红茶贷”刚推出不久，他就用承包的 272 亩茶树作抵押，申请到 200 万元贷款，一下就解决了资金难题。

农业银行清远分行副行长孔令贵说，“‘红茶贷’是农行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特点推出的新型信贷产品，以英德市政府的风险补偿基金作担保，向符合条件的茶农、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等发放贷款，有效解决了他们的贷款难题”。截至 2019 年 4 月末，该行累计提供信贷资金约 1 亿元支持英德红茶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通过持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督导作用，积极推动政银保贷款模式，引导广东辖内金融机构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全力做好农村金融服务。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广东省涉农贷款余额 1.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1%。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涉农金融机构将“两权”、林权、应收账款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开发出“流转易”“金土地”“绿色养殖贷”“乡旅贷”“民宿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体系，积极开展青年（妇女）创业贷款、红色党员创业贷款、扶贫小额信贷业务，不断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差异化融资需求。其中，广东农商行（农信社）系统开发的“支农支小”特色贷款产品共有 834 个，自产品推出以来累计投放贷款超 3000 亿元，惠及“三农”和小微客户超 45 万户。

调研中，多数银行与农村工作者都认为，需要扎实推进“两权”抵押贷款增量扩面，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唤醒农民“沉睡资本”。数据显示，广东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以来至 2018 年末，广东 9 个试点地区累计发放“两权”抵押贷款 3129 笔、金额 56.1 亿元；“两权”抵押贷款余额 40.1 亿元，同比增长 306.7%。

“通过金融机构的有益探索，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乡村振兴正迎来金融活水的灌溉。但对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诚信问题也需重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陈元富在接受采访时说。信息不对称、信用建设滞后，导致金融机构对于乡村庞大的农户信贷需求信息难以掌握。并且，农户现代金融知识匮乏，对良好信用记录的意识不强，需要对农户加大普及金融知识的力度，营造创业气氛。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征信管理处副调研员季刚表示，广东省通过对农户的信用信息采集、信用评分与信用培植相结合的方式，培育信用土壤和信用环境，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截至 2018 年末，广东省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已采集 570 万户农户信息，实现在全省县域 100% 覆盖，全省评定信用农户 417.5 万户，推动建成县级综合信用服务中心 94 个，创建信用村 1.3 万个，构建了覆盖全省农村的信用服务网。

【南方日报】张思思谈长租公寓：从四方面促进长租公寓市场健康发展

长租公寓

当前长租公寓市场可说是方兴未艾，蓬勃发展。近日，南方日报就长租公寓发展采访我院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她认为：广东省随着常住人口逐年增加，工资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住房的品质及数量的需求亦不断提高。长租公寓市场的发展，为增加住房供给及优化居住环境提供了值得推广的模式。

其本人主持的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课题“广州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研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对长租公寓市场的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以下为南方日报原文报道：

专家点评《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2018》，应尽快落实政策要求给企业实质扶持

“南方日报《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 2018》对长租公寓品牌企业及住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描述了长租公寓市场快速扩张、资本大量涌入、运营主体多元、运营模式不一的基本格局，同时反映了市场份额不足、分布分散、利润率较低、盈利模式单一难持续等问题，并从良性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治理建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张思思博士认为，该调研结果对长租公寓的发展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日前，南方日报社南方经济智库南方评估、广东省公寓管理协会联合发布《广东长租公寓发展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租购并举”以来，长租公寓成为风口式的热点。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洋博士亦指出，除了早已艰难生长出来的公寓企业之外，包括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在内的多股社会力量都纷纷涌入住房租赁领域。然而到了 2018 年，长租公寓的发展却似乎遭遇了“瓶颈”，先是公寓融资“暴雷”，然后是装修污染致癌风波，同时社会对租金上涨的质疑和讨论也不绝于耳。“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住房租赁的基础性制度还远未成熟。《报告》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建议。”

张思思：从四方面促进长租公寓市场健康发展

当前长租公寓市场可说是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张思思认为，广东省随着常住人口逐年增加，工资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住房的品质及数量的需求亦不断提高。长租公寓市场的发展，为增加住房供给及优化居住环境提供了值得推广的模式。其本人主持的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智库课题“广州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研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对长租公寓市场的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和“报告”中的主要发现及政策建议共通之处。具体包括：

一是要降低长租公寓市场运营成本，拓展市场盈利模式。长租公寓市场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这一运营压力最终转嫁到消费者之上。长租公寓的单位租金比普通租赁房屋高出不少，无形中限制了长租公寓的潜在消费受众与市场良性发展。参考国外不少大城市租金管制经验，于政府而言适当介入市场，控制租金增长可能是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同时应降低长租公寓在土地、资本、尤其是税收方面的负担，改善营商环境，最终降低长租公寓市场的运营成本。于企业而言，拓展以住户租金为主的单一盈利模式，有效结合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公寓生态链（如无人便利店、24 小时健身房、新零售等）为多元化收入来源。

二是要盘活存量做好增量，培育面向年轻人的品牌公寓。应该看到，在年轻人口持续流入、经济向好的珠三角地区，租赁市场需求只增不减。《报告》发现当前租赁市场供求关系存在错配，表现为低端市场供大于求，中高端市场则求大于供。政府应善借长租公寓市场这一风口，根据地方人口构成及趋势，适当对低端租赁市场如城中村、老旧社区进行城市更新、微改造，实现中短期内租房市场需求有效调节。长期来看，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做好长租公寓市场的增量供应。《报告》中调研显示九成的租客在 31 岁以下。可以着力培育面向年轻人的品牌公寓，使社区环境、居住设施等更能满足年轻人的用户体验。

三是要完善长租公寓行业标准制定与监督工作。当前长租公寓市场运营主体多元，运行模式不一，这一背景一方面有利于资本进入市场快速扩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恶性竞争、无序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新闻报道的“甲醛门”事件。因此完善管理措施，做好行业标准制定与监督工作，实现长租公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额外重要。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引导长租公寓市场转向规模化、正规化、机构化与产业化发展，并做好消费者权益维护工作。

四是要留意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可能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在当前长租公寓产业中，ABS、REITs 等资产证券化产品曾被认为是破解长租公寓模式盈利难的有效金融工具，能降低房地产金融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融资依赖，帮助长租企业沉淀资金、加快扩张速度。但另一方面，这一金融手段同时增加了资金杠杆，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过去一两年，不乏新闻媒体报道了长租公寓“租金贷”问题带来的问题隐患。因此在当前的长租公寓金融创新中，政府部门既要做好试点探索，从而推进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做好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

作者 南方日报记者 冯善书

多家权威媒体报道
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6 月 18 日 -20 日，2019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在暨南大学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由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作为 2019 年度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本次会议吸引了中国新闻网、央广网、新华网、羊城晚报等多家权威媒体关注和报道。

CNR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社会科学网 www.cssn.cn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CCTV.com 央视网

中新网 chinanews.com

CNR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www.news.cn 新华网 NEWS www.xinhuane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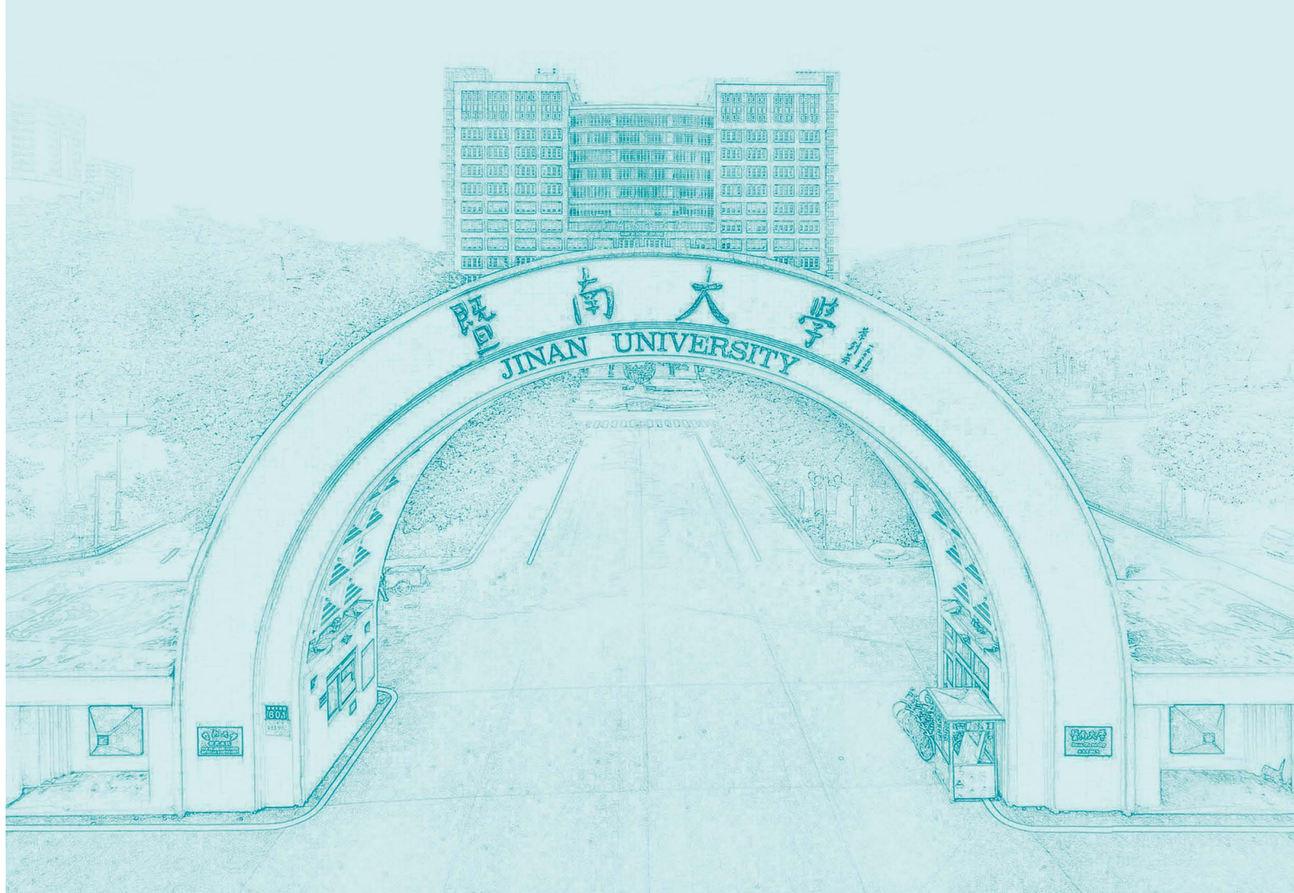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 YOUNG PAI

数据 调查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

广东千村调查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2018 数据成果报告于四川绵竹发布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与会人员合照

2019 年 4 月 18-19 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绵竹市教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四川省绵竹市顺利举行。会议邀请了国内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参会，共商流动人口子女发展大计。

会上，社会调查中心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2018 数据成果正式公布，引起了当地学校和学界的热切关注和讨论。

4 月 19 日当天三校调研结束后，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2018 数据成果报告发布会正式开始。发布会以绵竹项目的历程介绍短视频开篇，生动展现了绵竹项目的历史与意义、执行历程以及参与其中的调查员与受访家长的心声。

随即，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社会调查中心主任冯帅章教授发布了绵竹项目 2018 数据成果报告。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2018 年追踪调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对绵竹儿童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等进行重点画像，并由此出发，切实为相关政策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多角度地为绵竹儿童的长足发展提出建议。

在 2018 年的调查中，共有 6198 名受访学生，受访学校共 18 所，数据显示过半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其中父亲是外出主力，高年级、女性学生的留守比例相对更低，城镇学校学生留守比例相对更低。

报告发现：

认知能力

各学校学生认知能力差别不大，随年龄增长，认知能力得分有所提高，留守学生的认知能力得分相对更低，其中父母双方皆外出打工的留守学生表现相对更弱。

非认知能力

各学校学生非认知能力差别不大，随着年龄增长，某些特质如外倾性、宜人性、负情绪等得分会更高，留守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得分相对更低。

学生成绩

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远低于其他学生。

行为表现

留守儿童担任班干部的占比较少，留守儿童更容易与他人发生争端，纪律表现更差，更容易发生不诚信行为。

报告建议：

重视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关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培养；

强化外出务工父母陪伴意识，提高留守家庭教育质量；

关注男女学生性别差异，加强男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简历健全寄宿学校管理制度。

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现场

在报告发布会后，绵竹市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彭波宣读了《困境学生关爱行动绵竹宣言》，宣言呼吁各界关注困境学生，用良知唤醒行动，用责任推动行动。

绵竹市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彭波发言

随着为期两天的第三届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的圆满结束，绵竹项目 2018 年所有的努力也在成果发布后正式成为历史，成为项目又一里程碑。初心不改，2019 年，绵竹项目继续优化，探索新的调查方式，不断提升，以数据凝集关怀，以数据助力护蕾。

春和景明泛新绿

——绵竹项目第一轮预调查顺利开展

预调查小队与学校联络人合影留念

为探索新的调查方式，检验问卷设计以及进一步优化执行细节，2019 年四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简称“绵竹项目”）预调查小队一行四人来到了山水绵竹开展入校调查。

不同于秋冬时节的银杏金黄，树木萧条，春天的绵竹是绿意盎然的。从酒店开往小学的路上，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随着我们的车开过山间田畔，青绿青绿的麦苗，嫩黄嫩黄的油菜花，娇艳粉紫的玫瑰……纷纷呈现在我们眼前，让准备试行新型调查方式的预调查小队不禁对此行渐生期待。

到达绵竹市顶新小学后，在热情的学校联络人带领下，预调查小队简单地参观了学校，熟悉路线和班级位置，然后开始分拣相关的物资。

进班前，预调查小队先行与班主任进行沟通，并给班主任讲解问卷填写要求和项目 APP 的使用方法，通过电子问卷 APP 收集班主任的信息数据。

预调查小队为班主任讲解APP使用

正式入班，小朋友们一开始都非常地兴奋和激动，不时地交头接耳或出言询问，想一探我们的底细。经过简单地原因说明和问卷讲解后，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在问卷和答题卡上爆发自己的小宇宙，看看谁能又快又正确地填答完问卷。

从基本信息问卷、认知能力问卷、交友问卷到非认知能力问卷，被选中参加调查的、三个班级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引导和同伴的激励下都努力地完成了问卷。交卷后，小朋友拿到了预调查小队为他们准备的小礼物都开心地笑着研究了起来。

预调查小队引导学生填答问卷

学生们在认真填写问卷

中午简单地休息过后，预调查小队便迅速地布置好场地，静待学生家长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绵竹项目在原有的执行基础上尝试性地将监护人场次的问卷进行电子化，实现信息技术和大型社会调查有机结合，在数据质量提高和执行优化及成本压缩上进行大胆尝试。本次在顶新小学开展的调查便是为了测试绵竹项目问卷电子化的可行性和优缺点，为项目长远发展做好先锋工作。

在监护人场次的调查中，我们预调查小队明显地感受到电子问卷能够节省时间成本，家长更愿意在繁忙的时间中选择扫码填写电子问卷，在给予基本的讲解和提示之后能够很好地完成问卷。与此同时也预调查小队发现了一些 bug，以及一些值得优化的细节。个别读写需要帮助的家长仍延用纸质版问卷。总体来看，测试结果和调查结果喜人。

部分家长延用纸质问卷

在这一次预调查中除了完成了调查任务之外，我们预调查小队还结识了一群多才多艺、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热爱羽毛球，会画画、书法、剪纸，做小手工，奇思妙想……这些美好他们都跟我们一一分享，令我们也从他们身上收获了一份快乐。

绿是春日葳蕤，绿是少年校服，绿是盎然生机，绿是希望关怀……一抹新绿是绵竹项目与绵竹儿童友谊的萌芽，是预调查小队的美好回忆，荡涤着那时的风尘仆仆，催促着绵竹项目坚定前行。

广东千村调查

《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正式发布，2019 千村调查再启航！

出席嘉宾合照

6 月 13 日，《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新书发布会暨 2019 广东千村调查宣讲会在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本次活动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承办。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办公室秘书处胡朝良、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张高祥、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赵晓玲、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晏礼庆、暨南大学出版经济与管理事业部主任曾鑫华、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以及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各位老师受邀出席。

活动开始，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办公室秘书处胡朝良对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价值和意义做出肯定，并代表省委农办就《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的出版送上祝贺。胡朝良表示，该作品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更加关心、关注和投入乡村振兴事业。2019 千村调查项目再启航之际，省农办将积极为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提供必要协助，也希望广大学子能传承“千村人”精神为我省乡村振兴更添星火。

接着，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晏礼庆先生表示广东千村调查聚焦乡村振兴，立足广东本土文化，关注岭南经济社会发展，既为高校学术研究提供大量一手数据，为政府政策制定建言献策，也加深广大学子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今后出版社将对千村调查项目进行深入的跟踪报道，出版系列图书，以引起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为实现中央精准扶贫战略，解决好乡村治理、生态环境、教育发展、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城镇化等课题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

随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冯帅章院长对新书《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进行介绍。

冯院长表示，该书是 2018 广东千村调查的结晶，汇集了访问员、质控员和研究人员等参与者提供的多角度手稿和真实记录，凝聚了各个“千村人”的辛勤汗水和美好青春，目的在于记录历史，折射现实，为乡村提供更加真实的侧面写照。会上，冯帅章院长对大力支持广东千村调查的领导、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并号召同学们参与 2019 广东千村调查，踏往南粤炊烟，记录真实乡村，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新书捐赠仪式上，冯帅章院长代表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向暨南大学图书馆捐赠新书，暨南大学图书馆赵晓玲副馆长回赠赠书纪念卡，两人一同合影留念。

冯帅章院长向暨南大学图书馆捐赠新书

随着新书面世，2018 广东千村调查画上圆满的句号，2019 广东千村调查正式启航，项目组为对项目感兴趣的同学专门同场举办宣讲会，让同学们深入、系统地了解广东千村调查。

宣讲会上，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执行负责人花芯对 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调查样本、项目进展、后续工作安排及招募计划等相关事项作了详细介绍，并就同学们所关心的语言要求、调研地点、执行难度、交通食宿、费用报销等问题一一详细解答。

宣讲会上同学们认真聆听

为了给今年报名参加项目的同学提供更多感性细节，活动邀请了两位去年的老访员分享他们的调研感受。

2018 年广东千村调查的优秀队长之一徐艳姗分享了参与项目过程中所遇到的趣事和团建经验。她说“在千村遇到的人，比你想象中的要更宽广。”她表示在项目中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友谊和温暖。同时，因为感受到项目的意义重大，她与队员们都愿意用心、甚至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去完成高质量的访问。风趣幽默的分享引起现场阵阵欢笑。

访员庄培雄则分享了自己参加项目的原因和调查过程克服各种挑战的心路历程，他说“不去经历过很难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会艰辛很多，只有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才有可能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他号召同学们在项目中了解民生，锻炼自我，为农村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宣讲会的最后，冯帅章院长一一为在场的同学签赠新书。

新书签赠现场

今天，我们手捧新书，分享 2018 年千村人的喜悦与感受，在 2018 千村人的所见所感中细读乡村风貌。来日，我们一起以 2019 千村人的身份，心怀故土，肩负担当前往南粤千村，为乡村振兴更添星火。

集合完毕！ 2019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招募面试工作顺利完成

招募面试候场

2019 年 6 月 25 日，广东千村调招募面试划上句号，近两百五十名小黄人集合完毕。

自 5 月中旬 2019 广东千村调查招募令正式发布，到 6 月下旬报名截止，项目组报名系统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高校将近 600 份英雄帖，其中不乏黑龙江、山东、安徽、陕西、四川等省外的同学不远万里毅然报名。

为了高效推进项目面试工作，项目组将现场面试分两个场次进行。第一场面试于 6 月 15 日在暨南大学石牌校区富力教学大楼 905 举行。面试老师就同学们提交的简历、各方面素质分组进行考核。面试从早上 8：30 开始，持续至下午 18：00 结束，将近 130 名同学参加到场参加。第二场招募面试于 6 月 23 日同一地点举行，将近 120 名学生到场参加。

此外，对于两场面试都不方便到达现场参加的同学，项目组采用了电话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

“你为什么想来参加千村调查项目呢？”“如果在调查过程中遇到拒访要怎么解决呢？”“你觉得自己能吃苦吗？”……

面对老师们的提问，同学们依次进行回答，轻松自如，落落大方。从同学们的回答和表现中，项目组感受到了热诚和有备而来。截至 6 月 25 日，2019 广东千村调查招募面试基本结束。

通过现场面试和电话面试，项目组录用核查员、访问员、访问员队长合计近两百人，录用通知已经以短信方式发送。后续，项目组根据项目特定需求开展小范围的定向补招，补招范围主要为掌握特定方言的访问员、细心耐心的核查员等。

鲁迅先生曾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今日，我们心怀乡村振兴之志，聚集于此，如一团火，如一束光。明日，我们肩负乡村发展之担当，前往千村，如一粒星辰，如一颗萤火，心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

至此，招募面试工作如期完成，2019 广东千村即将迈入新征程。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2019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预四轮预调查圆满结束

预调查小队合照

澄夏逐春余，村野拾游光。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回归大型社会调查的舞台，4 月末，项目组和研究组根据 18 年的样本数据和执行结果，对问卷和和执行方案作了多次修改。

为检验修改后问卷的效度、实地执行方案的可行性、追访的难度等，项目组分别前往清远佛冈、潮州潮安、韶关南雄、广州花都开展多次预调查。

预调查小队合照

清远佛冈是广东千村调查预调查的第一站。本轮预调查的目的主要是检验问卷的修改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做好相关联络工作。在村委的积极配合和安排下，预调查小队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了村问卷和家户问卷，并且测试了学校问卷的可行性，为后续的问卷修改提供经验参考。

两周后，预调查小队出发前往潮州潮安，在实地调查中检验方言对于问卷调查和样本联络的影响及是否会构成主要阻碍。

方言障碍，是广东千村调查难以克服又必须克服的一道鸿沟。因此本次预调查特地选择广东地区里面最难听得懂的方言之一——潮汕话作为预调查的挑战目标。有了去年被潮汕话血虐的经验，预调查小队有备而来，由项目执行督导李步清和四位熟悉潮汕话的实习生一同前往，历时两天，走访两个行政村，顺利完成了问卷调查任务。

预调查队员开展访问

第三轮预调查，项目组将重心放到问卷 APP 与电子设备的匹配调试上，同时消化前两轮的调查反馈。六月下旬，APP 成功与 i 字头设备匹配，预调查小组带着新设备马不停蹄地前往韶关南雄。令人意外的是，南雄当地普通话普及率十分高，几乎每位村民们都能够用普通话与我们的组员进行无障碍甚至顺畅的交谈，这让预调查小队十分惊喜。在访问过程中，预调查小队有条不紊地执行调查方案，在测试新设备和修改后的 APP 过程中，根据使用中遇到的小问题、小疏漏，同步联系项目 IT 组进行修改。此程收获满满。

从预期效果检测，到方言条件可行性检测，再到电子设备检测，每一轮预调查之后，项目组的执行组、质控组、IT 组同心协力，齐心奋战换来 APP 的一步一步优化。六月末，预调查在广州花都迎来了第四轮预调查。

最后一轮预调查中，由于问卷 APP 已经克服设备适配性的问题，预调查小队将重心放在了检测问卷效度及追踪调查难度上，并测试了绘图方案的可行性。

预调查队员开展访问

行是知之所始，知是行之所成。两个月以来，项目组跨越多个城市村落，在实践中检验计划，也在实际中总结经验；既完善了问卷 APP，也加紧了项目组与样本村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将为 2019 千村项目的实地执行注入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四轮预调查中，我们不仅收获了宝贵的调查经验，还在佛冈看到了满目葱郁的乡村风光，在潮安品尝到了正宗的功夫茶，在南雄收获绚烂的漫天晚霞，在花都感受到了与老受访者再会的温暖。这些收获都将被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成员收存于心，并携着大家对千村的期待与支持迈入新的征程。

预调查途中邂逅的风景

伴随着热浪中的声声蝉鸣，2019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7 月，我们会站在预调查积累总结的经验之上，对访问员开展培训。在那之后，2019 千村人将身着黄衣，踏向南粤大地，奔向广东千村，继续扬起乡村振兴中属于青年人的大旗。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

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普查绘图员培训会顺利举行

GMS普查员培训会师生合照

2019 年 4 月 20-21 日，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Guangdong Migration Survey, GMS）普查绘图员培训会在中惠楼 106 室顺利举行。参加本次培训会的师生有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老师、副主任薛森老师、GMS 项目组主管和督导以及项目招募的近 30 位普查绘图员和核查员。

为期两天的培训会第一天以理论培训为主，旨在让普查绘图员和核查员系统地了解项目，认识绘图工作，为项目的后续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天以实操培训为主，以实践检验绘图员和核查员的学习成果，理顺执行流程，强化团队建设。

培训伊始，李凤槐老师首先通过播放短视频介绍调查中心和培训流程，随后，薛森老师讲述了广东流动人口现状调查项目的缘起，指出该项目的意义在于更好地了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紧接着，何李芮老师讲解了抽样设计的相关内容，并向同学们展示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城中村的绘图结果，并嘱咐即将参与绘图工作的同学们：学会沟通、勿惧拒访、仔细观察、注意安全。

稍作休息后，培训正式开始。关于项目的执行流程及执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由袁静怡老师向大家展开详细的介绍。李凤槐老师则传授了执行过程中的联络沟通技巧，阐明宣传素材收集工作等相关内容。同学们认真听讲，仔细翻阅培训手册，并做好笔记。

GMS普查员培训会现场

下午，骆毓菁老师向同学们讲解电子绘图软件的操作方法，组织同学们模拟操作电子软件，并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答疑。而肖和老师负责对绘图结果的质控工作进行说明以及对核图员进行培训。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培训内容，培养好问、严谨的学习态度，项目组的各位老师们专门在培训的最后引导同学们积极提问，并进行相应的解答。

老师带领绘图员进行绘图实操

培训第二天，简要地回顾前一天的培训内容后，刘一冰老师公布当天实操的分组安排，并讲解了当日的实操流程。接下来，三组师生在暨大社区开始走边界，进行绘图实操。项目组老师带领同学们深入真实社区，手把手教授绘图技巧，引导让同学们大胆尝试，规范绘图。师生同心同行，积极探索。

最后，老师们总结实操结果，与同学们深入交流，重申要点，并对学生的实操表现进行评价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当天同学们纷纷表示虽然课程有些辛苦，但是受益匪浅。

理论和实操并进，为期两天的培训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圆满结束，绘图工作即将开始，让我们一同期待 GMS 的足迹将会出现在哪里吧！

跟访手记丨在行走中绘出城市的另一面

绘图一景

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寸土寸金……说起广州，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数不清的花样形容词，以及每晚准时亮起的地标性建筑小蛮腰。

但广州并不仅有繁华的一面。 2019 年五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项目组绘图员开展社区绘图工作，跟访绘图员走访海珠区抽样社区的一天，让我看到了广州的另一面。

一、从没有想过有这样的角落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广州。

破旧的围墙、生锈的铁窗、杂乱堆放的废弃钢筋静静遥望着远方嵌着玻璃窗的大厦。被住宅围成 T 形的天空，让人倍感压抑却又有种别样的美感。

旧楼房前围闭起来的电梯加装施工现场，时时传来刺耳的是电焊切割声，仿佛旧楼房们在宣示“我将迎来新的春天”。

走在社区狭窄的道路边，用眼睛记录着，用心聆听着，我似乎感受到广州城在匀称呼吸的频率。

二、万步足迹绘出广州的真实模样

相比我这用眼睛记录的广州，绘图员们更加精准，讲求“数”说真实广州。眼前的百尺高楼？一层一层地爬！行程图上社区遍布？一步一步地走！

“不是在绘图，就是在去绘图的路上”是对绘图员每日工作的真实写照。她们用微信步数排行榜实力示范了何为“广州那么大，我要来看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的足迹将遍布广州各个社区，从天河东，走到荔湾西，从海珠沙溪，跨到黄埔长洲。

三、我单纯地喜欢着行走

初夏的广州，异常闷热。太阳在雨水冲刷过后的天空更加肆无忌惮地烤着，此时此刻，那种对 26°C空调和加冰冷饮的渴求到了极致。

不知不觉，“自动搜索开放冷气的便利店、饭店”成为了大家的一种潜意识。幸而，对社区边界的绘测有社区居委会的带领而开展得更加顺利。在这里感谢他们的帮助！

在结束了一天的绘图工作之后，绘图员们卸下了坚决的意志，在麦当劳小憩。翻看跟访路上的照片，我的脑海开始抛开对暑热的抗拒，细细回味今天的所遇所感。

跟访中，我问绘图员 X，为什么选择参加这个项目，她说：“并不是为了什么，我单纯地喜欢着行走。”

我想，正是因为行走，我们有幸能目睹广州的“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因为行走，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在广州，有匆忙熙攘的人潮，也有打着呼噜仰着肚皮惬意午睡的猫咪；因为行走，我们才感受到被城市滋养的万千个体有着万千种的生活方式；因为行走，才使得记录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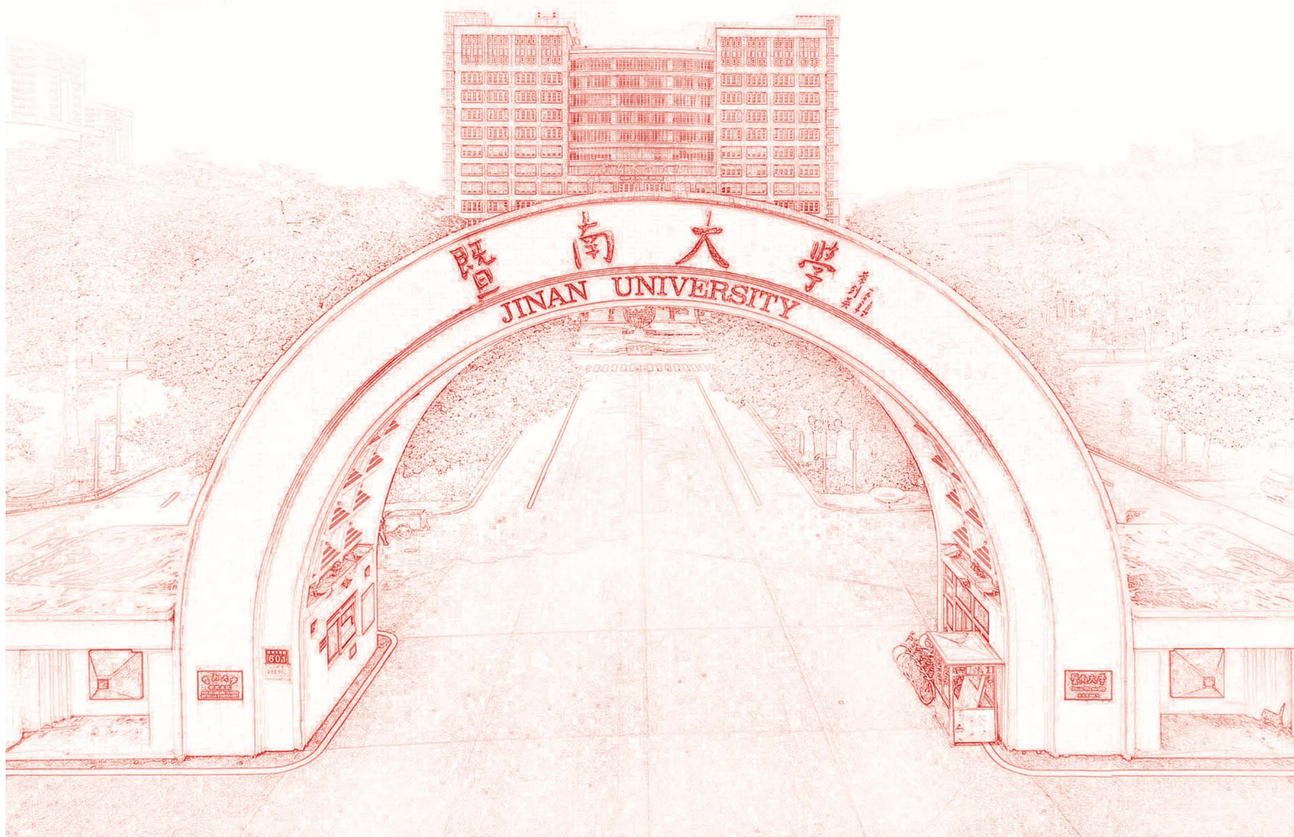
尽管脚下阵阵酸痛，明天太阳升起时，我们仍会继续出发，在行走中绘出广州城最真实的面貌。

绘图员走访社区

人物 专访

名师零距离

IESR人物



名师零距离

扎实做好科研，成果服务社会

——专访 IESER 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特聘中心主任赵金华

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新成立的研究中心。该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金华为特聘中心主任。

赵金华教授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曾入选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经济分委会委员，曾任环境经济学领域世界公认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的主编。赵金华教授长期活跃在北美与国内学术界，具有极为丰富的跨领域合作经验。

IESR 为何要成立该中心？未来规划是怎样的？中心的成立将为推动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研究起到怎样的作用？

为此，我们采访了赵金华教授，为大家详细一一解读。

1、缘起初心——中国的环境经济需要我们来研究

赵金华长期活跃于国际学术圈，但他始终怀着初心——希望研究中国自己的环境经济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其实一直存在，而近几年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越来越强，这也为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赵金华一直希望能在中国有研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的团队，并且与国际接轨。他介绍，目前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发达国家的国情展开的，但实际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无论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法，或是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最终都能够对于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样的想法与 IESR 一拍即合。创新一直是 IESR 的追求，环境经济学的建设正是 IESR 最新的目标。赵金华告诉我们，IESR 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学术氛围上更接近国际名校。它能给予研究人员更大的学术自由与支持信任，让大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这一点也能从 IESR 过去的发展中可见一斑。赵金华说，IESR 三年之间从无到有，发展速度快、特色鲜明，因此对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希望未来能在 IESR 有所作为。

2、以“人”为本——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合作

赵金华认为，未来中心想要谋发展，离不开以“人”为主的三个方面：人才培养、人才合作以及人才引进。

人才培养指的是 IESR 学生的教育。除了基础课程，赵金华设想，在未来 IESR 会把教学和环境经济学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接轨，让学生更及时地了解世界。同时，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特色就在于跨学科，这种兼容并济的思想也应该及早传递给学生。

人才引进、人才合作指的是在研究人员和师资上的引进以及合作。赵金华提出，中心未来除了长期招贤纳士、广纳人才之外，还会考虑引进短期的人才合作。在一些课题上，中心会邀请该领域的高端人才进行短期访问交流，与团队一起做研究。

此外，赵金华认为学术交流也是重要的吸引人才合作的方式。他从过往的经验得出，IESR 多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无论是非正式的跨学科交流会，还是正式的学术会议，都对环境经济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大有裨益。

在交流过程中大家相互了解、思维碰撞产生火花，自然就会展开多方面的合作，未来中心也会多举办此类活动。

3、学科建设——立足IESR，放眼世界

对于未来中心的学科建设，赵金华提出了两个目标。

第一、把科研做好做扎实。中心立足于 IESR，就要致力于成为高质量的高校科研中心。未来中心也会积极探索，无论是学术理论研究还是环境施政实践方面，甚至一些边缘问题，一定要把研究做扎实。

第二、提高中心社会影响力。赵金华希望中心未来不仅把目标放在学术上，还要重视研究成果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他认为，做学术、搞科研的最终目标也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科研成果不仅要做出来，还要进行转化，争取对政策制定和人们的行为有所影响，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心部分成员与宋献中校长合影

赵金华认为，要达成这两点目标，中心就要做到立足 IESR，放眼世界。例如，广东在中国的环境治理上走在前列，就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数据，做一些广东这方面的课题。经济学往往有普遍的适应性，那么研究成果就可能对于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借鉴意义。

前行不忘初心，人才助力发展，扎实做好科研，成果服务社会，这是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前行的道路。

未来，中心蓄势待发，即将从 IESR 出发，努力推动中国的环境经济学建设。

将房地产研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支柱

——专访 IESR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特聘中心主任邓永恒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以下简称“房地产中心”）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新成立的研究中心。该中心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商学院教授邓永恒为海外特聘主任。

邓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房地产金融博士后。现任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未来城市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与房地产金融和城市经济政策相关的各项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住房市场风险及房价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研究、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市场的治理与研究等。他曾在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等著名国际经济、金融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

邓永恒教授为何选择与 IESR 合作？该中心的未来规划和目标是怎样的？在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面又将有什么动作？中心的研究如何与政策研究更好地配合？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邓永恒教授，为大家进行详细解读。

将房地产研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支柱

纵观国际房地产研究领域，房地产研究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从宏观视野出发，把房地产和区域经济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都联系起来；二是关注更细化的市场运作，如应该何时投资、具体某一市场回报率如何等等。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转型，如何配合转型，如何和政府及业界合作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希望“把房地产研究作为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主要支柱，研究房地产对可持续发展、住房市场的长效稳定机制，土地金融与房地产融资模式，房地产资本市场的开发运作与监管，高科技、人工智能、电子支付等对房地产业和智慧城市的发展的冲击影响等问题的影响和贡献。”

同时，邓教授希望房地产中心的研究将紧扣社会现实问题，把提高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作为己任，为政府提供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人才为基，培养高质量年轻学者

想要完成邓永恒对于房地产中心的设想，人才必不可少。说起 IESR 大批优秀的年轻学者，邓永恒赞不绝口。两年前，他和 IESR 因为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并来访 IESR 与学者交流，开始了双方之间的合作，从那时起，他就对 IESR 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冯帅章院长的带领下，学院招募了一些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认为，IESR 拥有大批年轻学者和有生命力的研究，非常适合研究转型期的中国房地产发展。

因此，中心成立后，邓永恒教授首先想在人才培养方面发力。他将招募一批知识面广，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又愿意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人才。中心将引导这些年轻学者们去积极参与政府的重大经济政策课题，解决一些业界和百姓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长租公寓模式，引进风险可控的其他房地产投资模式（如 REITs），评估宏观政策效果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因此通过研究，不仅能够很快提升年轻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也能让学术成果与社会实践更好结合。” 此外，房地产中心也将通过邀请国内外的资深学者、主流杂志的主编来进行交流访问，进一步提升年轻人的专业素养。

独立思考，打造专业高校智库

随着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已经拉开序幕。在邓教授看来，过去的二三十年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填补过去未满足的住房需求上。

他认为，随着近来地缘政治影响下的贸易战，中国整个经济结构都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和商业地产市场的需求变化。因此作为一个研究中心，他希望房地产中心作为一个智库，应科学地为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百姓做出政策建议，保持冷静、理性的头脑，客观地分析，独立地思考，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他表示非常看好 IESR 的前景，尤其看好 IESR 团队的年轻人。他希望中心能够帮助青年学者们进一步提升，帮助他们成为对学术界、国家以及社会都有贡献的人才。

本着这样的希冀，IESR 也必将牢记使命戮力前行。

IESR院长冯帅章为邓永恒教授颁发聘书

中国功夫与计量经济学

——专访 MIT Joshua Angrist 教授

Joshua Angrist，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他曾担任多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劳动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并且是《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功夫计量经济学》的作者。Joshua Angrist 教授被中国经济学界的粉丝们尊称为“安神”。

笔者见到Angrist教授时，他在暨大的短期课程刚结束不久。许多慕名而来的“粉丝”带着自己的《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或是《功夫计量经济学》找他签名，对于等待的每一位，Angrist 教授都耐心地询问名字，并签上专属的祝福。

计量之于劳动经济学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Angrist 教授却因两本计量教材（《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和《功夫计量经济学》）而被熟知。采访伊始，他提及经济学是关于实证问题的学科，它的目标是回答经济体、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等相关问题。它并不像哲学一样抽象，反而是像药学一样的实用学科。Angrist 教授认为随机控制试验在未来十年将会变得更加普遍。不仅限于学界，一些业界的公司如亚马逊、谷歌、网飞等，他们也在低成本、高效率地运用随机试验来了解商业中的关系与原理，并且他们将会为社会科学领域注入新的活力。谈及多数人关心的道德问题，Angrist 教授则表示他并不会过分担心。随机试验以自愿参与为原则，发起者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做任何事，他们所做的只是鼓励某种行为，与此同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分析结果。Angrist 教授的研究有一部分集中于教育系统，目前很多年轻的学者们都关注教育政策、学校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他正在做的一些事在中国也能被重视，且希望看到有关教育的研究被更多人所关心。

Angrist教授为学员签名

安神与功夫

在为期 3 天的计量经济学工作坊上，Angrist 教授展示了许多计量与功夫相结合的照片与视频。当我们问到他与中国功夫的渊源时，他说，儿时住的小镇很少有亚洲移民，大概从他 12 岁起，每天放学回家就会看功夫 (电视剧) 和星际迷航（Start Trek），同时深受剧中功夫的吸引。功夫、熊猫、少林足球这些元素逐渐变得流行起来，李小龙的电影也被观众所喜爱。功夫是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西文化交融中有趣的一部分。Angrist 教授表示，功夫所传递的“人生是一趟旅途，我们需要抉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也有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对计量经济学也同样适用：你有点像一个有着目的地 y0 的旅者，但是你也可以把目的地选择成 y1, 但是只有你真的去了其中一个目的地，你才能观测到那里的风景。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不同的人做决定的方法。

当 Steve Pischke 教授和 Angrist 教授打算着手写他们的第二本书之前（先前完成了《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希望先找到一个主题。“首先，我们希望它和第一本完全不同，且能与书的内容有关联。所以我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并与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编辑讨论，他认为‘功夫计量经济学’正合适。接着我写了一些东西，2012 年的时候我在香港访问，我向身边的人展示并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好玩或受到冒犯，他们的回复都十分正面与积极。”Angrist 教授同时也专门组成小组并展示给他的亚洲学生看，并且受到了喜爱。最终他们找来了能够完成配图的艺术家，并且诞生了《功夫计量经济学》一书。他提到，这本广为流传的教材，灵感始于功夫熊猫，而功夫熊猫则是基于最早期的电视剧《功夫》。

Angrist 教授表示他很享受三天的计量经济学工作坊，他希望各位学生们也都乐在其中、有所收获。他坦言在劳动经济学午餐上对学员论文展示的批评可能有些严厉，并笑称这为“tough love”，有时他也会担心是否会伤及别人的感受，但他希望学员们能理性地对待他给出的评价。Angrist 教授说，其实他从 90 年代后期就开始教授这样的短期课程，一开始是教政府官员一些基本的计量经济学，后来逐渐发展为向非 MIT 的学生来展示他自己版本的计量经济学。直到 Steve 和他开始着手写书时，短期课程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基于《功夫计量经济学》，而各式各样的音乐、视频及有趣的细节则是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加入的。

教学和研究缺一不可

从 Angrist 教授上课的方式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比如在课上他时常会根据学生的名牌直呼名字向学生提问。他表示，这么做是希望学生能集中注意力来思考，保持紧张感而不至于在课堂上太过放松。

Angrist 教授说，尽管只有少数人最终会选择攻读博士学位进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他希望大家能从他做学术研究及教学的方法中有所收获。Angrist 教授直言他现有的模式是从自己本科时代的一位教师那儿学来的，但当时并非所有学生都喜欢那位老师，甚至很多人因为老师的严厉而哭泣，他却很享受上课的氛围。每一堂课当他集中精力思考时，时间飞逝而过。那门课是经济学原理，虽然他最终得到的成绩是 B(并且是本科时代的唯一一个)，但却最终激励了 Angrist 教授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好的老师能够改变人生道路。他说，希望年轻的教授能够明白，他们的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可以和他们的研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有意义，或许更为重要。

“找到你擅长的事、你喜欢做的事和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比如说你是一位中国的劳动经济学家，那就应该去研究一些关于中国的、有趣的话题，运用中国

的数据。”Angrist 教授曾经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供职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完成了许多关于以色列问题的论文，那时较为年长的教授们总说要多用美国数据，否则文章将不会被发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有很多以色列朋友，如 Victor Lavy，他就主要运用以色列数据，并且也有很不错的学术生涯。”他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几年来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许多研究也应该基于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学校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等展开。国外许多年轻的学者会认为他们应当致力于美国问题，但 Angrist 教授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IESR 的教授在努力地为中国研究做出一些贡献，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有趣。如果将来能做出一些独特的东西，他们也会更加成功。仅运用公共数据库来做研究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现今想要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更多地应该利用好这里独有的资源，研究这里独特的问题，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移民及教育政策等。”

“安神”和计量经济学教材的过去与未来

Angrist 教授表示曾在 90 年代就想写一本有关工具变量的书。“Guido W. Imbens 和我先是完成了两篇论文，那时我认为市面上关于工具变量的教学模式十分老旧。当你想写书时，你会先完成一个大纲并发送给出版者。大概在发给两三位出版者后，我先是被拒绝了，接着我想我应该完成一些其他章节，并写了一些关于回归的内容。由于时间的限制，出书的计划暂时被搁置。大约在 2005 年前后，Steve Pischke（Angrist 教授在普林斯顿读博时的朋友）来访 MIT，我提议继续完成剩下的部分，但他以工作量太大拒绝了。几周后，我收到了他写的一些章节，写书的工作就算是正式开始了，Steve 是个愿意投入时间的合作者。《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的成功让我们开始考虑《功夫计量经济学》，一本更适用于本科生教学的书。”谈及是否会有下一本书面世，Angrist 教授坦言他正在思考推出一本《基本无害计量经济学》的新版本，它将更多地包含过去 10-15 年萌芽发展的计量方法。“我在想怎么将它做得好玩有趣，也有了一点基本的想法。但我需要找合作者，我想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新书或许会在 5 年后面世，他笑着说希望大家耐心地等待。

Angrist教授与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郭文殊：IESR 对学术的倾注，超出了我的预期

人物名片

郭文殊，IESR 助理教授，2018 年取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学位，2012 年取得香港大学学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

学院的大多数教师都是看重 IESR 的学术研究氛围而选择就任于此，郭文殊也不例外。

“我有自身家庭的考虑，将范围集中在了粤港澳湾区，而在广州、深圳、甚至香港，IESR 所提供的学术环境都极具竞争力和吸引力”，他如是说。

郭文殊简短地为笔者讲述了他和 IESR 的故事。

IESR对学术的倾注，超出了我的预期

2016 年入职 IESR 的助理教授陈祎是郭文殊在 UCLA 时尊敬的学长，博士在读时这位学长就曾给过他很多帮助。陈祎也曾在国内其他高校就职，但 IESR 成立不久后就毅然选择加入这个新兴的研究机构，这大概是郭文殊对 IESR 的最初印象。

在去年的 AEA(美国经济学会) 年会上，郭文殊作为候选人参加了 IESR 招聘，面试官是 IESR 特聘教授、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徐熠。

“徐熠老师是国际上在产业组织、贸易方面非常有建树、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他作为 IESR 的学术顾问，代表学院来组织面试，我认为这是一个认可 IESR 的强烈信号。”

面试过后，在 information session 上，冯帅章院长和学院的其他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程，以及对老师的学术期望。他感受到，IESR 虽然是一个年轻的机构，但其能为青年学者提供的支持诚意十足。年会结束的隔天，他收到 offer，便决定要加入 IESR。

笔者采访时，郭文殊已入职半年，他表示学院丰富的学术活动堪比 UCLA。定期举办的各类 seminar、邀请 visiting professor 来访时会给出具体的日程安排，IESR 都严格按照北美大学经济系的标准执行。这里氛围自由，行政团队会提供非常出色的支持，且同事们都很年轻，也有不少共同语言。

IESR 成立之初将目标对准应用微观经济学，而后向更多领域扩展。他更期待学院在产业组织这个领域能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希望和其他同事一起努力做出更好的学术成果。

将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产业组织是一个符合我兴趣及关注点的领域

但是郭文殊选择 IO(产业组织) 作为研究领域并不一帆风顺。最开始，他感兴趣的是微观理论，只是纯理论有时过于抽象，而产业组织却是一个将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领域，能够运用数据对 IO 理论做实证分析，其中也不乏使用结构模型的方法。

当时 UCLA 研究 IO 的学者很少，经济系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产业组织课程，郭文殊曾有一段时间的彷徨，不知道是否该坚持这个选择。

幸运的是在他博士二年级结束时，NYU Stern 的 John Asker 教授决定加入 UCLA，而后也成为了郭文殊在博士期间的导师。他正是从那时开始理清自己对 IO 的思路。通过和导师的聊天、互动，逐渐明白应该如何从头开始找一个课题并从事相关的研究。

“产业组织和其他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思路相同。人是理性的、寻求利益最大化等假设依旧成立，区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侧重于雇主和雇员市场，公共经济学侧重政策制定，而产业组织则研究企业的行为与决策。

博弈论所关注的个人间的策略性行为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方面，当然 IO 也涉及个人行为的决策。在一些问题如学习行为、匹配机制的研究上，有时较难界定产业组织与传统应用微观领域的边界。IO 会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应用微观的思路，它们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导师 John Asker 教授对郭文殊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教会他大胆思考、积极尝试。只要他的想法没有太过偏离主流的范式，都会得到导师的鼓励和支持。John Asker 教授提到，研究的问题不应盲从大流，而是应该给自己自由的空间去寻找和思考。

另一方面，导师曾建议他花时间去阅读英语文学、提升自身的写作水平，这让他在后期论文写作上不至于思路受限，对段落之间的布局也能有清晰的想法。郭文殊说，这样中肯的建议，对于 IESR 的学生同样适用。

学术生涯最大的源动力应是对研究本身的兴趣

郭文殊表示，他的导师以及博士期间系里的其他教授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有十足的话语权，但他们的生活却依旧简单纯粹。

他提到，学者学术生涯最大的源动力应是对研究本身的兴趣，其他所获可以用来锦上添花，却不应该成为研究的源动力。同时，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选取几个小范围进行深入的挖掘，或许会更有效率。

“IESR 对老师有明确的期待，我希望能在自己的节奏和外界要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此前，郭文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中的 learning 和 information 方面。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天然气开采公司如何通过政府公开的生产信息来学习并进行选址决策。通过理论可以将公司的行为模型化，并推断天然气在宾州的分布，同时用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关注某些行业中企业的学习行为，通过他们对价值不确定资源的竞争行为，可以看到不同参与者从对方获取的信息，这样的分析框架会有更大的应用空间。”

谈到目前感兴趣的研究话题，郭文殊想尝试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思考长租公寓兴起对房东和租客方价格、福利的影响。目前，中国不少城市都涌现了长租公寓，房屋中介和房东签订长期的合约，由中介方来处理资源，进而出租。

“抽象地来看，这是一个双边市场中部分平台纵向整合的现象。如果有数据，确实可以从实证的角度开展预测与估计，把一个区域、城市定义成市场，来看不同平台的市场份额。”中国城市的机动车车牌拍卖也是郭文殊感兴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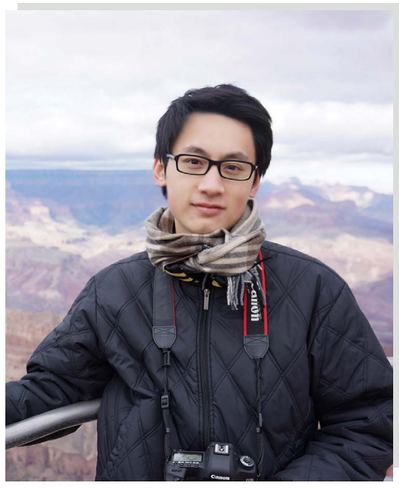
“拍卖是 IO 的经典话题，目前关于车牌拍卖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效性，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在重复拍卖中参与者的策略动态，可能会有新的收获。”

笔者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里，感受到的郭文殊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的耐心与踏实。临近结束时，他微笑着说，现阶段他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IESR 积极正面的气氛，他也希望能够和 IESR 一起，扩大研究院在国外知名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

郭文殊在UCLA的地标建筑Royce Hall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崔潇濛：我对农业经济研究有一种使命感



人物名片

崔潇濛，IESR 助理教授，2018 年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从北京到北美，又从加州来到广州，奔波许久，崔潇濛最终来到 IESR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什么选择读博士？为什么选择做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为什么选择来到 IESR？崔潇濛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是坚持，也是运气

崔潇濛笑言其实自己以前并不是个典型的“好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更是觉得自己不可能搞学术，也曾经很抗拒出国。

在大三那年，一位拥有科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英语老师影响了他之后的选择。这位老师曾说：“出国读博士是去学习最先进的方法论，学会如何科学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句话给了崔潇濛很大的启发。

在那时，相比于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本身，他对“先进的方法论”是什么更感兴趣，这促使他在本科结束前直接申请了美国多所高校的博士项目，并最终进入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

在刚出国的一两年里，尽管在学业上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但他却很迷茫，甚至考虑过放弃学业。他问过自己：我已经对“先进的方法论”有所了解，那我究竟还该不该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我继续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由于当时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方向，崔潇濛开始通过做研究助理来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刚开始，他只是尽力把教授交代的任务做好。慢慢地，他能够基于任务、由点及面地去拓展了解更多的知识与信息，并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品位与判断。

崔潇濛与导师Colin Carter（右）和Dalia Ghanem（左）

做研究助理的过程不仅帮助了崔潇濛在学术上的成长，也因此让他结识了自己的导师。崔潇濛的主导师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Colin Carter 教授。Colin Carter 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去做研究，同时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全力的支持。崔潇濛的另一位导师是研究计量经济学的 Dalia Ghanem 教授。她的指导则帮助崔潇濛在实证研究中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

崔潇濛说：“我的导师给了我极大的学术自由，也很注重训练我独立自主做研究的能力。他们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曾经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我论文中的语言问题。我找工作之前，Colin 还曾经专门开车带着我去 Berkeley 做 presentation，训练我的 job talk。”

导师的帮助让他在学术上快速成长。坚持下来，他的学术之路也越来越清晰。

我对农业经济研究有一种使命感

崔潇濛的父亲出生于农村，1978 年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崔潇濛说：“我父亲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上学时，同学们对带‘农’的专业通常有些排斥，我却没有这种心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崔潇濛便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出国时也选择继续留在农业经济学科。

目前崔潇濛的研究方向是农业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尤其是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农业相关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结果。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业，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并不像一个经济学问题。但崔潇濛认为，环境要素与农业的关系并不是只看环境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其中关于“人”的问题是特别值得研究的，而研究人的行为也是经济学的优势所在。

崔潇濛博士期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回国后，他希望能多“接地气”，用严格的范式和前沿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问题。

虽然人们常说农业和农业经济很重要，但很多人对“农经”这个学科领域具体做些什么研究并不是十分了解。受此影响，崔潇濛在两年前与同学马梅琳开设了一个叫做“农经好文章”的学术公众号，至今仍在稳定运营。

“做这个公众号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崔潇濛这样告诉我们。他的初衷有两点，一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农经到底在研究什么，有什么成果；二是希望能将国外的学科前沿传递给国内学界。

崔潇濛和同学马梅琳参照美国农经系研究方向的设置，将公众号内容分为了“农业与食品”、“环境与资源”、“发展与政经”三大板块，每个板块都在固定的时间推送文章介绍国际顶尖刊物的研究成果。

他们给自己定了硬性标准：用 1000 字左右将一篇论文的重点讲清楚，并利用专题的组织形式强调不同论文之间的联系。从论文挑选，专题组织，再到推文撰写，定期更新公众号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崔潇濛说：“我在农经这个行当十年了，对于农经研究是有使命感的，也希望农经领域的研究能越做越好。”

IESR在国内经济学院中出类拔萃

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崔潇濛在几年前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广州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博士三年级的时候，他在一次 IESR 宣传活动中看到了谷一桢老师的专访，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更深入的了解，崔潇濛认为 IESR 在学术氛围、培养模式等方面在国内的经济学院中出类拔萃，而且整体模式与北美的经济系也非常相近。

实际上，崔潇濛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面试了美国和国内的多所学校。但在多场面试中，他觉得 IESR 的面试体验是最好的。“感觉他们真的看了我的研究，真的知道我在干什么，而且问的都是好问题。”

这次面试给了崔潇濛很大的触动，他对 IESR 也非常认可。在这之后，崔潇濛很快收到了 offer。他的导师们也认为 IESR 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综合考虑之后，他加入了 IESR 大家庭。

从 2018 年 9 月到如今，崔潇濛已经在 IESR 度过了不短的时间。谈及工作的感受，他表示自己没选错地方，IESR 给年轻老师非常大的自由度和充分的支持。

一方面，IESR 创造各种机会让老师们接触国际学术前沿，除了每周多场高水平 seminar，老师们还有机会和 James Heckman 这样的大师聊天。

另一方面，IESR 鼓励老师们深入实际去研究中国问题，持续开展包括“广东千村调查”在内的多个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将学术研究和深入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非常喜欢在 IESR 的工作和生活。同事们都非常优秀，每次去 seminar 听他们提问都能和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不仅是做好研究，崔潇濛还积极投入到学院的发展当中。加入 IESR 后，他与几位老师发起成立了“珠江经济学俱乐部”，旨在和校内外学生分享与经济学有关的知识与讯息，激发更多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也让更多的学生进一步了解 IESR。

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崔潇濛与其他负责人策划了实证编程、排版技巧、留学申请等不同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受到了许多同学的好评。

崔潇濛对待珠江经济学俱乐部的工作十分认真，他认为这是“作为老师的社会责任，要好好做”。教务秘书黎莉回忆起与崔潇濛的合作，不禁感叹：“崔老师的认真能够带动周围的其他人，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说到短期内的打算，崔潇濛直言自己还是要“多学习”：学习如何做好研究，学习如何讲好课，学习如何指导好学生。“毕竟学院发展得太快了，我得努力跟上它的步伐。”

正如崔潇濛对于自己的要求：“当我选择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希望能尽量把它做好。”

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他都有自己想法并努力实施，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对于未来，崔潇濛也有很多设想，相信在 IESR 支持下，他能够不断前行、实现自我。

学生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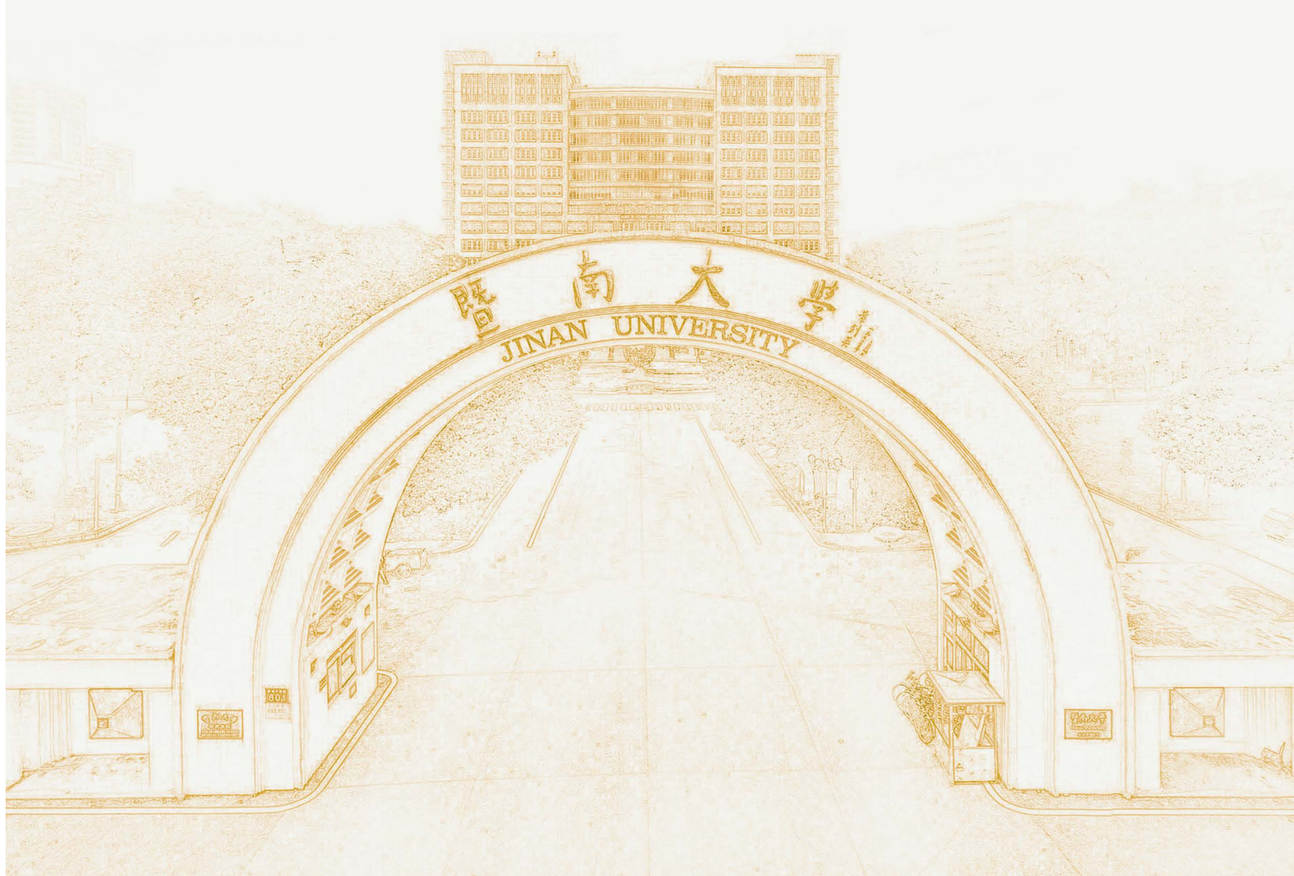
招生要闻

夏令营 & HCEO暑期课堂

学子风采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EDP项目



招生要闻

我院举办多场本科招生宣讲会

招生咨询现场

为进一步落实“阳光招生”政策，搭建院校与考生和家长交流沟通的平台，使广大考生能够全面、直接地了解我院的招生政策、办学特色和专业优势，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我院于 6 月 23 日在本部邵逸夫体育馆参与举办了“走进暨南——暨南大学招生咨询日活动”。

烈日炎炎并没有消减家长和考生们前来咨询的热情，人群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谷一桢副院长、教务老师黎莉驻守现场，向考生们详细介绍了学院招生报考、专业分布和教学模式等问题。

考生和家长的关注点集中在招考分数线、招收专业、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等方面。同时也对我院的全英文教学模式、国际化学术活动、专业调研活动和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广东电视台采访了部分考生和家长，学生家长表现出对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这个新学院的期待和肯定。

去年数据显示，学院在广东省内招收理科生的最低分数线高出本科线 221 分，文科最低高出本科线 166 分，但今年学院仅接受理科生报考。去年招生省份有广东、湖南、福建、山东、安徽，今年新增了四川省的招生名额，计划共招收 20 名本科生。

专业设置上，IESR 实行小班教学，集中于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日常教学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学的各类分支上，如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

师资力量方面，IESR 拥有毕业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海外一流大学的优秀教师，师资力量雄厚。

此外， 6 月 25 日 -29 日，为了进一步加深广大考生和家长对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的了解，我院于广州市铁一中学、广州市执信中学、广州市第六中学、广东省实验中学、广州市培正中学、广州市广雅中学、深圳外国语学校、深圳高考招生咨询会等地举办了多场招生咨询会。咨询会现场人潮攒动。我院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因全英文教学模式、雄厚的师资力量、国际化的学术活动、专业的社会调研活动、以及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等专业特色让不少家长与学子驻足围观。考生及家长们对该专业录取条件、培养计划、师资力量、就业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询问，我院老师都一一耐心地进行了详细解答。

夏令营 & HCEO 暑期课堂

师生合影

7 月 1 日 -5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第四届全国优秀大学生经济学暑期夏令营正式开营。与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 IESR 夏令营与芝加哥大学 HCEO Summer School 同期进行，夏令营学员可以享受 HCEO Summer School 国际化的学术资源。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 68 位优秀同学赶赴 IESR，参与此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盛会。在未来的五天中，他们将在这里接受学术的浸润并充分感受羊城与 IESR 的魅力。

7 月 1 日清晨，IESR 副院长谷一桢老师为学员们主持了开营仪式。在对同学们表示欢迎的同时，谷老师简要介绍了 IESR 的发展历程和学术实力，并真诚地希望同学们能够加入 IESR，在这里开启自己对学术的探索之路。此外，谷一桢副院长还介绍了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与 IESR 的合作渊源，本次 HCEO Summer School 是 Heckman 教授领导的 HCEO 国际工作组（The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与 IESR 的第四次深度合作，也是该课程首次面向本科学生进行授课。

六场学术课程

芝加哥大学教授 Steven Durlauf 以“Social Interactions”为题拉开了课程讲座的帷幕。教授的讲述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结合历史事件阐释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同学们踊跃提问，不断向教授抛出问题。教授巧妙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所有疑问，在活跃的课堂氛围中，所有人都专注于课程内容，听课效率极高。

Steven Durlauf教授

拥有标志性胡须的康奈尔大学教授 Lawrence Blume 开启了新一轮的学术热潮。教授和蔼可亲，与同学们的充分互动中显示出高超的引导力和控制力。在 Lawrence Blume 教授的热情感召下，“Economic Theory”这样看上去略显枯燥的课题也变得生动起来，同学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这个夏日午后便有了别样的风采。

Lawrence Blume教授

Jimmy Chan 教授曾任职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研究、博弈论等，研究成果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此次他的授课主题为“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Jimmy Chan 教授的授课风格平实详致，针对知识点娓娓道来，听课的同学犹如春风拂面。

Jimmy Chan教授

Raji Jayaraman 副教授则有着夏天一般的性格，在丰富的肢体语言中为大家解析了题为“Experiments in Development”的课程，并与同学们不断进行互动。在场同学在不同的授课风格中调整自己的听课节奏，也在与不同教授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术修养。

Raji Jayaraman副教授

Chao Fu 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实证微观经济学，她结合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工具来研究政策相关问题。本次她带来的课题为“Wage Dispersion in the Labor Market”，在 Chao Fu 教授富有激情的讲课中，同学们很快进入了听课状态。

Chao Fu教授

James Kung 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研究、历史以及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体系、文化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次他带来的授课主题为“Long-Term Persistence（Keju）Political Economy”，James Kung 教授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出发，为同学们进行了精彩的理论及数据分析。

James Kung教授

“芝加哥-暨南联合计划最佳论文”

除了学习课程，学员们的论文汇报环节也是一大亮点。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16 位同学向在场师生们展示了他们的研究，并现场接受教授们的评论和指导。几位评委老师在同学们展示过后给出了细致独到的建议，不同观点相互碰撞，多样课题异彩纷呈。同学们在展示之余也看到了同龄人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能力，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最终，由 HCEO 暑期学校授课教授们与 IESR 助理教授 Jinseong Park 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出了 1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与 3 个三等奖，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姓名	院校	论文题目
鄢瑜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二等奖		
罗哲丞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School Choice with Constraint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Parallel Mechanism
三等奖		
梅子威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Understanding China's Monetary Policy Communication: 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李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The Impact of Lineage Networks on Households Schooling Decision in Rural China
周梓洵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Geographic Proximity, Information Flow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High-speed Rail Construction

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穿梭之旅

经历了紧张的讲座、笔试、面试之余，学员们还前往海康威视与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参观，开启一场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的穿梭之旅。

学员参观海康威视合影

海康威视是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能力，提供摄像机 / 智能球机、光端机、DVR/DVS/ 板卡等安防产品，并为金融、电讯、交通、军队等行业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这些产品和方案面向全球推广，在北京奥运会、大运会、亚运会、上海世博会、60 年国庆大阅兵、青藏铁路等重大安保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本次参观海康威视，讲解人员在展示厅为学员们展示了其 AI 智能系统在交通、物流及安保等方面的应用，同学们对这些高科技尤为感兴趣，特别是物流行业的智能分拣系统，得到了在场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海康威视广东业务中心窦彬副总裁为学员们展示了企业的成长历程，讲解了其在 AI 系统上的产品成果。同时，对同学们不断提出的问题，窦彬副总裁也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5 日下午，IESR 学员们赴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参观。这是广东省唯一的省级综合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陈列展览以广东历史文化、艺术、自然为三大主要陈列方向，分为历史馆、自然馆、艺术馆和临展馆四大部分。

学员参观广东省博物馆合影

本次学员们参观时，恰逢“大海道——‘南海 I 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在展。展览的主角——“南海 I 号”沉船，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巨大、保存较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展览文物类别丰富，出水的瓷器、金银器、朱砂、果实、动物骨头、水晶、骨头制品、石质文物等都被涵盖。值得一提的是，粤博参加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二季）的宋金项饰，也在展览中呈现。

学员们在观展过程中对文物啧啧称叹，不时低下头与同伴轻声交流感想。观展过后，相信大家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会有更多了解。

结业仪式与欢送晚宴

5 日晚，IESR 举行了 HCEO 暑期课程结业仪式和欢送晚会。晚会由 IESR 副院长谷一桢主持。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首先发表致辞，他对本次夏令营及暑期课程的参与者、组织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真诚地希望各位优秀的营员加入 IESR。

冯帅章院长

至此，IESR 夏令营 &HCEO 暑期课程已接近尾声，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所有的 HCEO 暑期课程学员一一上台领取他们的结业证书。

在这 5 天中，6 位授课教师授业解惑、诲人不倦，堪称良师益友。学员在这种良好氛围中，也笃实好学，专心致志。在送别晚宴上，回忆起这 5 天的点点滴滴，师生都有感而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星健同学、华南师范大学潘昕彤同学、武汉大学黎天祺同学发表感言时纷纷表示非常感谢教授们的精彩讲座，所有的话题都很有趣。其次他们很开心在这几天内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最后感谢 IESR 提供的学习机会及周到的服务。

HCEO 暑期课堂的几位授课教授也发表了结业寄语：

Steven Durlauf教授

“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学理论及实证研究等前沿学科也在不停地发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是一个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学科，经济学家的知识也常常从与他人的互动交流中获得。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有机会来到中国。而你们现在有广阔的视野，有国际化的平台，你们拥有绝佳的机会。”

Lawrence Blume教授

“我很希望看到中国社会将如何发展、如何应对现在的问题。在座的各位学生在未来会如何发展，你们所掌握知识会如何影响这个社会。最后，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课程。”

Raji Jayaraman教授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以参加本次 HCEO 暑期课程的形式来访中国，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我在这次课程中，看到了很多有想法的学生，你们的想法也将影响和促进经济学科的发展，而中国的未来将掌握在你们些优秀的年轻人手中，这非常令人激动。投身学术不仅是拿到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学术思维，希望你们可以享受学术之旅，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至此，IESR 第四届经济学夏令营 &HCEO 暑期课程圆满结束。IESR 真诚祝愿各位同学鹏程万里，前程似锦！

学子风采

名校路漫漫，我以勤奋求索

——IESR 硕士生陈宇健专访

陈宇健论文开题

“Python 大神”、“数学分析课能应对各种难题的助教”、“老师们眼中高质量助研的代表”……

提起 IESR 研二学生陈宇健，老师和同学们都是赞不绝口。

不久前，他还收到了全美排名 Top10 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全奖博士项目 offer。

然而，这样令人羡慕的好成绩并不是唾手可得。

在 IESR 学习期间，陈宇健为了实现自己的读博梦想，不仅进行了清晰地规划，还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

清晰规划，助研工作加分

对于未来，陈宇健有着清晰的规划，他从研二就提前申请了读博。当谈到自己申请成功的原因时，他认为关键加分因素是助研经历和推荐信。

从大四开始，他就开始了助研工作。他十分感谢学院许多老师为他提供的助研机会。此外，也因为在助研工作中出色表现，他得到学院老师的一致认可，并收获了多封推荐信，其中就包括一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 教授的推荐信。

谈到自己做助研的感悟时，陈宇健说：“对于申请而言，丰富的助研经历能展现出一个学生对学术具有的

兴趣以及研究能力。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助研过程使自己更深入地接触了不同领域的研究。”

因此，他建议本科生和研究生多去争取一些做助研的机会。

明确兴趣，多与老师沟通

陈宇健认为，多与老师沟通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在沟通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计量经济学。

陈宇健同学特别感谢两年来导师徐吉良对自己的指导与帮助，是恩师带他进入学术的大门。

第一次见徐老师，他就被老师的“有趣”所吸引，他发现徐老师常常能把复杂的东西和道理解释得十分通俗幽默。在日常讨论中，徐老师常常带着他一起去了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思考问题的方式。

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想了解更多的思维方式，这也成为了陈宇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强大动力。

拓宽视野，在IESR看到广阔世界

在 IESR 学习与生活的日子，既平凡又特殊。

平凡的是，陈宇健与所有渴望深造的同学一样，勤奋踏实，认真做研究。

特殊的是，IESR 为他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平台，让他看到更广阔的的世界。

IESR 常常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 Seminar 还是各式各样的学术会议，陈宇健都从中汲取养分，丰富自己。

“IESR 邀请的专家学者们为推进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些经历不仅让我的论文水平不断提高，也锻炼了我在学术上交流和表达的能力。”陈宇健如是说道。

如今，陈宇健仍然和往常一样在上课，做研究、学习数学、做助研。

在平凡的生活中成为更好地自己，努力飞向更广阔的世界，他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未来路漫漫，唯以勤奋求索，才能越走越远、心如所愿。

暨南大学第七届“学习之星”

韩亚婕：“人总要逼自己一把”

韩亚婕接受颁奖

2019 年 5 月 9 日，暨南大学“5A 卓越引领计划”颁奖典礼举行。该计划分设 10 个奖项奖励不同领域有卓越表现的学生，每年经过学生申报，学校初评、复评、公开答辩等环节，最终在本科生中评选出 100 名学生。此次，我院 2016 级本科生韩亚婕荣获第七届“学习之星”奖项。

沉下心学习，脚踏实地

韩亚婕来到暨南大学出于一场“失利”，甚至录取到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也不是自己的兴趣。但是，她现在非常庆幸能够在大一下学期通过转专业来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入学以后，她一直怀着一个目标：“大学绝对不能这么平凡下去”。韩亚婕不仅要学习原专业，周末还从华文校区来到本部的 IESR 上课，两个专业的学习使她的大学生活忙碌而充实。在不断奔波与付出汗水之后，她最终通过了 IESR 的考核，也达到了转专业的要求（原专业第一名），来到了经济学专业。

韩亚婕坦言，转专业成功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放松，IESR 的经济学专业十分特殊，由于大家都是转专业而来的优秀学生，所以同辈之间的压力并不小。而 IESR 对学生的要求极高，这让韩亚婕也倍感压力。

例如，大二上学期开设的概率与统计课难度大，老师的要求也高，考试的难度让大家都感觉有些吃不消。为了能够真正学好这门课，韩亚婕找了大量的参考书，积极与老师和助教沟通，天天泡在图书馆，最终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总是要逼自己一把。”在这样的心态下，韩亚婕大学期间脚踏实地、沉下心来学习，每学期的绩点都达到了 4.2 以上，并且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优异学生等称号和奖项，真正成为了“学习之星”。

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

韩亚婕认为“学习之星”不应该只是课程成绩好，而是能够很好地掌控“学习”这件事情，对学习游刃有余。这就意味着需要自己能够在完成其他工作的同时，学习成绩依然比他人突出。

因此，韩亚婕一直在尝试跳出舒适圈，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她参加了许多科研项目和比赛，并且取得了好成绩：进入“挑战杯”广东省决赛、获得“挑战杯”特等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广东省三等奖、毕马威企业文化案例分析大赛暨南大学赛区第二名、港澳台侨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每一个项目和比赛的背后都是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韩亚婕的导师朱宏佳给予她很高的评价：“韩亚婕从整理数据、拓展研究思路、数据分析、结果解释等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进展，并且于近期已经完成了一篇我认为有着优秀质量的工作论文，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同时，韩亚婕还是 2016 级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的班长。尽管学习已经非常忙碌，但她依然认真负责的完成班级工作。不仅班级获得了先进班集体的荣誉称号，韩亚婕也被评为优秀班长。

对于未来，韩亚婕充满信心与斗志。“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学习也只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离我最终的目标还有很远很远。我知道没有一帆风顺的路，但我一定会踏实前行，不忘初心。我知道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也知道他们都对我有着极高的期望，我相信，我一定会走出属于自己的篇章。”

韩亚婕参加暨南大学第七届“5A卓越引领计划”优秀学子奖励计划评审答辩会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第三期】IESR 学陈祎老师带你玩转超便利排版软件 LaTeX

陈祎老师

主讲人陈祎于 2015 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2010 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前不久在国际顶级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发表研究成果。LaTeX 是由 Leslie Lamport 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发的一款科学排版语言，与 WORD 有相像之处，不过 LaTeX 在不少方面都优于 Word。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高清课程视频

慕容英奇老师教你成为 PPT 大神

慕容英奇老师

IESR 社会调查中心商务部主管慕容英奇为大家分享了“PPT 设计之道”，教大家如何高效制作专业、美观的 PPT。慕容英奇从 PPT 的配色、字体、图片与文字的配合、图标制作、简单动画几个方面为大家讲解。

IESR 宋彦老师带你成为 Stata pro

宋彦老师

主讲人宋彦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文章发表于 Health Economics 和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等国际知名期刊。宋彦老师主要从文本编辑器、STATA 自动化以及版本控制三个板块为大家讲解编程技巧。

扫描二维码
可查看高清
课程视频

海外硕士项目

名校 offer 成功到手！ IESR 海外硕士预科项目学员顺利结业

师生合影

6 月 26 日下午，IESR 2019 年海外硕士预科项目结业仪式在暨南大学中惠楼 106 室顺利举行。IESR 副院长谷一桢、助理教授韩昱洁、助理教授李润梁等出席结业仪式并为同学们颁发结业证书。这意味着 IESR 发展与交流中心预科班的学子们顺利结业，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德州 A&M 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三所大学的 offer 收入囊中，8 月他们即将赴这些高校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获得美国德州 A&M 大学 offer 的钟惠巧同学表示，IESR 预科班课程让她对要学的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方便跟美国德州 A&M 的课程对接，同时全英课程也可以帮助她快速融入全英的环境。虽然现在对未来还没有太明确的计划，但之后可能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选择在美国工作。

即将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吴宁华同学说，预科班课程帮助他提前掌握了一些海外学习技巧，夯实了经济学基础，而且 IESR 的授课老师均从海外留学归来，对海外高校的授课方式、上课节奏和作业形式都十分熟悉，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他更快地适应异国的学习生活。他表示对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

IESR 发展与交流中心真诚地祝福这些优秀结业学员，希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梦想成真。中心也会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预科班的相关课程，努力拓展更多合作项目，为学子们提供更多赴世界名校学习的机会。目前，IESR 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合作的海外硕士预科项目还在持续招生中，如果你也有海外留学梦，欢迎加入，IESR 助你圆梦。

EDP 培训项目

2019年6月10-14日，我院顺利主办江门市税务系统集中办案培训班

6月16-23日，我院顺利主办全省税务系统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

6月27日，我院顺利主办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全省税务系统工会主席培训班。培训过程中，学员们听课认真，并与讲课教师积极交流，并加深了对业务知识的了解。学员纷纷表示在培训中受益匪浅。

对外 交流

冯帅章院长随宋献中校长出访新西兰与澳大利亚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一行访问IESR 探讨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一行访问我院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贵霞一行来访我院

冯帅章院长随宋献中校长出访新西兰与澳大利亚

为推进暨南大学国际科研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5月12-19日，宋献中校长应邀率团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访问了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奥克兰大学、奥塔哥大学和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西悉尼大学等6所高等院校，并与奥塔哥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代表团还与新西兰校友会、澳洲校友会的代表进行了座谈。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国际交流合作处、药学院、理工学院、环境与气候研究院的负责人随同出访。

代表团与奥克兰大学莫里斯•威尔金斯国家卓越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合影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一行访问IESR探讨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2019年4月3日，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方茜研究员带领《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课题组来访我院，随行人员包括：四川省社科院管理学所助理研究员里昕，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李景峰、周冬，科研（外事）处副科长袁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冯帅章，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副教授卢晶亮，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李承政、韩昱洁、李书娟共同接待来访一行，双方就IESR新型智库建设的各方面工作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冯帅章首先介绍了IESR智库的价值观在于“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并强调了我院国际化的科研团队、数据为支撑的政策研究、灵活的机制体制、自主的教师招聘考核机制等特点。方茜所长对我院在智库定位、机制建立、数据支持等方面表示欣赏和赞同，对我院未来智库规划、运营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与我院各位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她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关注我院智库的发展尤其是智库国际影响力的打造。

双方合影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一行访问我院

2019年4月12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人发中心”）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贺丹一行访问我院，随行人员包括：人发中心人口研究部研究员刘中一、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张刚、《人口与健康》杂志社副社长王永进、《人口与健康》杂志社新媒体部主任陈伟。我院冯帅章院长、副教授卢晶亮、助理教授陈祎、杨哲、李书娟、韩昱洁与贺丹一行进行了交流。

此次访问，是双方第4次开展深入交流。冯帅章首先介绍了我院在学科发展、科研成果、人才引进、社会调查、政策研究、学生培养等方面的进展。贺丹也向大家介绍了人发中心的各项工作重点。她介绍到，当前人发中心重要的任务是人口战略政策规划，建设人口发展领域的智库。因此，人发中心与研究院具备很多深入合作的潜力与可能性，研究院的机构属性、研究方向、师资力量等各方面优势，都将使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具备前瞻性和独立性。双方表示，未来将在人口负增长以及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会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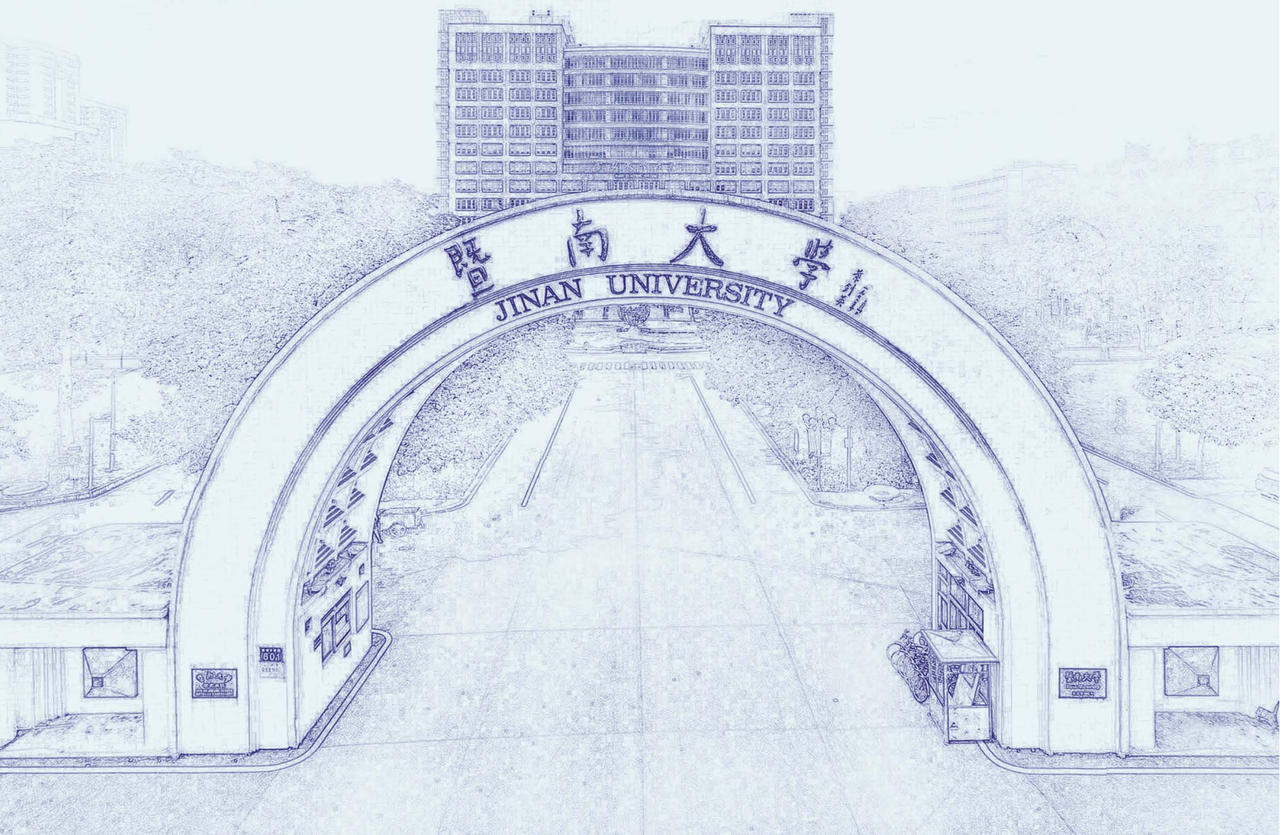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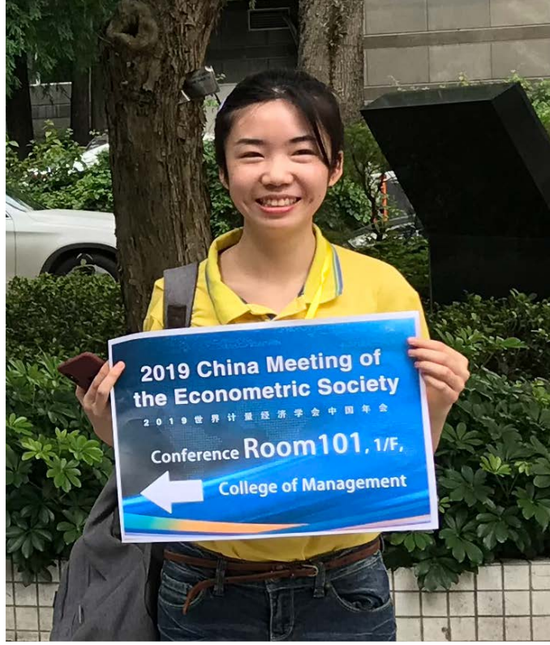
双方交流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贵霞一行来访我院

2019年5月9日上午，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贵霞一行来访我院，随行人员包括：院长助理郭金凤、经济系系主任茶娜、教务主任李欣欣。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副院长谷一桢、副教授卢晶亮、助理教授薄诗雨共同接待来访一行。

冯帅章院长首先对钱贵霞副院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单介绍了我院目前的发展情况，接下来双方就学生培养、人才引进、薪酬激励、绩效考核、智库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钱贵霞副院长表示IESR三年来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分享双方的调查项目和成果，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

双方合影

图 说

2019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志愿者风采